

目 录

引言	1
第一卷 精神分析学	11
第一章 研究的范围	11
第二章 心之构造	15
第三章 梦的解释和分析的过程	26
第四章 常态心理与变态心理	39
第五章 性的发展	51
第二卷 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	70
第六章 原始社会	70
第七章 唯物史观	86
第八章 唯物史观与个人心理	104
第九章 宗 教	130
第十章 辩证唯物论	139
第十一章 辩证唯物论和精神分析学	160
第十二章 实践举例	169
译后记	188
再版题记	201

引 言

轻率地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时常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作比较研究的要求。不过，这些批评家从不曾表示从事这种工作的任何意向；这也没有什么可惜，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对于这两种学说同样缺乏修养。

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则有把精神分析学看作不值得注意的倾向。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会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呢，这就颇可怀疑了。特别是恩格斯，他把检讨当时每一主要科学的发展作为他的职责。假如他能再活二十年，他大概不会不研究弗洛伊德的著作的。这并不是说，恩格斯会全部接受弗洛伊德的学说。正相反，我们可以想象，那一位最伟大的论战家将以何等辛辣的言词来指出这一学说的偏畸性。但我依然相信，恩格斯既不忽略达尔文或摩尔根在生物学或考古学上的发见，也便不会忽略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发见。这老鹰也将猛扑这种新的材料，加以消化、批评和拣选。

我相信，恩格斯也将在弗洛伊德的工作中寻见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上极端重要的论据。因为恩格斯自己所用的概念，便可由弗洛伊德所发见的材料提供必要的科学

证明。例如，关于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作这样叙述的是谁呢？“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嫉妒的消除，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这是不是从弗洛伊德的名著《图腾与禁忌》中引出来的呢？正相反，这句话乃引自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①。还有，用“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这句话来解说一个人的（否则就无法说明的）意见的，是恩格斯，而不是弗洛伊德。继续下去，恩格斯并不把这些使人持一定见解的虚伪的表面的动力解作合理化的东西，而只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采取并非真是无意识的，只是在一种“虚假的意识”下。^②

凡是具有能够达成这样概念的天才的人，当弗洛伊德制造出恰好证明这些概念的用科学方法观察来的论据的时候，当表明“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乃是最早的人类社会之主要问题的确凿证据出现了的时候，或当证明无意识地或在“虚假的意识”下推动人们持一定意见的那些未知的真正动机之揭发确是可能的时候，他会感到深厚的兴趣，还有什么可疑的么？

不过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关系，较之恩格斯所预期的，乃是一个远更重大的问题。并且，毫无疑义，这两种科学是直接对立的。问题是：它们是辩证地对立的么？那就是说，因了它们的对立性，因了它们的尖锐的矛盾性，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 30 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 501 页。

当放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提供那样一种对立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只有那样，现实才能得到适当的描写，它们是否如此的呢？

特别的是，分析学者这种纯实验的发见，是否一方面能证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处所能补充并阐明这些结论呢？

我相信，在这一部书中，奥兹本先生已经开始了第一步工作，表明分析学者的发见是有这样的功用的。例如，他能够说明：精神分析学已经完全不自知地，对于辩证唯物论的主要原则之正确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如过去常见的，分析学者纯实验的发见已经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旧的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之荒谬；依那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论，这种分析学者的发见也是荒谬的。

固然，分析学者永不曾听到过辩证唯物论，^①他们依然接受形而上学的思想范畴。因此，他们对于精神分析学的几乎每一概念所遭受的问难答辩的责难都不能依据他们自己的前提来应付，这一点就为学院派的哲学家宣扬开来了。依据非辩证法的形式逻辑来说，分析学的概念是显然自相矛盾的。作为其他一切之基础的原动的无意识自身这基本概念，从形式逻辑的观点上来看，是荒谬可笑的。因为学院派的哲学家指出，一个人对于一件事，不是知道，便是不知

① 这话对于青年的德国分析学者也许是不对的，不过对于英国分析学者的代表人物却一点也不错，并且对于弗洛伊德本人，在这一点上也是不错的。

道：所以如弗洛伊德所说，一个人对于一件事又知道又不知道，那就是说，他知道它，但并非意识到它，乃是荒谬可笑的。

弗洛伊德大可以把这些责难一律看作奥兹本先生所谓“胡说”。这些责难所以是胡说，因为他们与观察来的真实相矛盾。弗洛伊德曾经观察过并教我们大家观察这种事实：一个人同时对于同一件事常是又知道又不知道的；他无意识地知道一件事；以及，他有某种知识，并且这种知识有力地影响他的思想和行为，但他并不知道他有这种知识。这一切都成百次地为一般的观察所证实。为要说明这些事实，弗洛伊德必得提出原动的无意识的概念。但弗洛伊德不曾观察出，在认定和指名这些事实的时候，他便破坏了形式逻辑的首要原则，如所谓矛盾律（一件事不能又是又不是）的原则。

弗洛伊德对于这种形式逻辑，耸了一下他那富于经验的肩膀，暗示出这东西的不中用。但——弗洛伊德也由此表明他是他那一阶级和时代的模范科学家——他不曾知道，一种逻辑，一种思想方法，一旦在观察来的现实上触了礁，我们的迫切的责任便是用另一种来代替它。因为，假如我们不这样作，我们便得继续使用旧逻辑，而这东西已不再能适合事实，因而把我们自己陷入无法解脱的混乱中。并且，在弗洛伊德开始他的工作以前，已经有一种思想方法存在，这种思想方法对于分析学者在精神的现实之构造中所惯见的那些共存的交贯的矛盾完全加以许可。简而言之，

辩证唯物论对于精神分析学的发见提供了唯一可能的理论；同时精神分析学的这些发见，因为是独立完成的，对于辩证唯物论之正确性更能提供空前的最显著的证明。

奥兹本先生的第十和第十一两章，说明精神分析学的全部发见如何地贯串着辩证法的概念。事实上，分析学者已经遭到茹尔兑先生(M. Jourdain)的不幸：他们多年来谈论辩证唯物论而并不知道它。要他们注意这事实——有一种思想方法能使他们的发见成为有道理的，而不是胡闹的，能为他们那本来怪僻难解的每一结论寻得合理的地位——现在还不正是时候么？

精神分析学的辩证性质，大概要算奥兹本先生最可注意的理论发见了。^①不过他的最重要的意见，却包括在他论唯物史观的那两章之中。他主张把对于我们的环境的性质之研究的注重，移向对于那种环境我们所起的反应的性质之研究，我相信这是大有意义的。奥兹本先生在他的第一章中，加重说明在马克思这伟大发见上——人的意识为他的社会的存在所决定——继续建设的必要。奥兹本先生提出，科学的政治家不能懒惰的停留在那个发见上面。不到他确切地发见我们的社会存在如何地规定我们的意识，他便不应当罢手。例如，马克思预言，当一种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环境已经成熟，它的必然发展将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一

① 奥兹本先生提出：梦形成醒时思想过程的辩证法的对立；他更推论：这便是许多意识的思想成为非辩证法的这事实的唯一说明。他这建议和推论的美妙是大可注意的。

种实行社会主义的需要的意识。这样一种环境现在已经发展了。它曾否产生一种实行社会主义的普遍意识呢？是的，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域，以一定的方式，和到一定的程度，它已经产生了。但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到何等的程度呢？人们的社会存在所由以决定他们的意识的过程之实际机构和详细情形，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生活的可能便依靠这种过程如何进行的适当知识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环境和意识两者间进行交互作用之详细的特殊的重要状态，都从不曾冒认已经考察过。恩格斯在我适才引过的给梅林的信中便谈到这一点。

他写道，“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产生的。”

不过，我们的观念发生的方式现在是极端重要了，因为我们的客观环境之不断的加速度的发展，强迫我们来实行社会改革。因为我们的怪僻的观念，因为我们的不合理的幼稚而顽固的观念，使得社会改革的过程几乎成为不可宽恕的浪费。而人类观念发生的方式，恰是精神分析学的主题。

假如我们不学着了解人们的意识由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发展起来的方式，我们便不能有效地影响或指导社会改革的过程。因为不仅精神分析学，连平常的经验也会警告我

们，我们的意识由我们的社会的存在发出的方式是既不简单也不直接的。正相反，这乃是一种极端纠纷的复杂的并且常是隐瞒的过程。精神分析学者不会以完全了解这种过程自许。不过他们已经向着这样一种了解有了确定的进展；因此凡要从事自觉自愿的社会改革的人，都不可以轻视精神分析学者的工作。

我觉得，从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所能得到的主要的结论是：某一种意识的出现——那就是说某一类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和零杂的意见，某一种意识形态——一定不能设想为某一社会环境之被动的反映。而要把它设想为社会环境与那人自己内中某种原动的主观的要求之间的交互作用。这见解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完全相合的，奥兹本先生可以说明这一点。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大概会把任何别的见解严格地指作机械论的和非辩证法的。但这样一种见解，要使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日常的政治工作中加以充分的评价，并不常是容易的。马克思主义者很难于避免过分注重环境的势力而忽视原动的主观因素。

不过，假如马克思主义者不常能防止那样一种倾向，过于重视一种原素，而排斥它的辩证的对立物，那末精神分析学者连这样一种危险的存在也不曾意识到。他们常是单纯地写作，仿佛环境的影响并不存在，或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仿佛人类全部社会的特别是经济的环境都可以随便写成人类行为的方程式中的定数。并且，我们不仅要平均地注重这两种因素；我们所必须学习的是何时注重这一个，何

时注重其他一个。例如，在前一世纪，如恩格斯所写，马克思不得不“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不过，在现时，对于人们所禀赋的主观的原动的因素，与客观的环境的因素相交贯以造成我们可得而认识的人的这种因素，当然应当增加注意。因为环境的因素都已经有利于我们：它们高声号呼社会的改革。我们的任务是要知道，怎样解说这种不明晰的呼声，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很显然的，这一切等于说，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作实际的政治家，寻出能使他们的听众把握并遵行他们的使命的那样一种正确的心理途径。在象英美这样有高度发展的政治生活的国家中，关于怎样才能有效地影响他人，有着长久而丰富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假如愿作行动的人，他们应当熟习这种传统；他们应当熟习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实行的那种政治活动的传统的技术，这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应当这样作，并非要使他们自己成为奸狡的政客，却正因为不能把这种有力的技术工具让给那些政客们。因为，在这问题上，把一切好的歌曲给魔鬼唱，也是一种很大的错误。

但马克思主义者是科学家。他们拥有可以说明并实行社会改革的基本科学原则。因此，在使全体人民注意他们的科学之重要真理的详细技术问题上，他们也应当是科学的。换一种说法，政治宣传，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仅是一种艺术，也应当是一种科学。当马克思主义者已经通晓有效的政治活动的全部习惯，他不应当自满。非到他已经用

一种由科学地确定的结论中自觉地演绎出来的政治活动的技术，跨过并压倒这种传统的本能的仅只半意识的知识体系，他不应当自满。不过，这样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只能在一种科学的心理学的正确基础上发生。非到我们对于心理过程的原动力有一种知识，我们永不会知道怎样影响人，使他们更完全的了解真理。精神分析学者已经向着这样一种科学的心理学之建立开始了首先的困难步骤。

奥兹本先生在他的最末一章，对于一种精神分析学的知识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工作上可以有的效果，作了一些建议。我想奥兹本先生会同意：我们还应当把这种建议看作一种提倡和说明，不能看作有很大的实际重要。精神分析学还是如此地不完全，要想从它作一定的推论以供实行还是危险的（精神分析学者首先发出这样一种警告，由此表明他们是纯正的认真的科学家）。这当然是真的，并且大概再过许多时候也还是真的，凡愿知道怎样影响他人的人们，从实际政治家的榜样和言论，从观察劳合·乔治或鲍尔温，或在剧烈的社会危机中模仿列宁的方法，远较从精神分析学之最完全的通晓上所得的更多。但我想，有一件事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可以教给我们。熟悉精神分析学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带一定的心情和一定的态度显示给他人，没有这种知识，一种政治主张虽然公正而且真实，也很难得推行。我不能对于这种态度有所阐明，我只能说，我认为在奥兹本先生的书中已有很好的例证。他的文章是激昂的，但也是平正的；论争而无私见；锋利而聪明。大概是这样，他

对于社会主义的宣传的技术所作最好的贡献，不在他已经说过的任何一件事上，却在他叙说一切事的方法上。

他对于政治工作的一定推荐也许可以怀疑。并且，他也许在说明每一种学说时犯过错误，这是我无力发见的。但这种错误并不影响奥兹本先生的重要成就。这成就固然并非已经解答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那样庞大的任务需要许多思想家的持久努力。奥兹本先生已经作了的便是提出那个问题；并且以如此有理解有效果而且有教益的方式提了出来，凡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活的科学来研究的人们，在将来都不能忽略他这方式的。这并非微末的成就。恩格斯说，黑格尔想把“全部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当作一种过程来说明。……黑格尔并没有在这任务上成功这一点，在这儿是无关重要的。他的划时代的贡献乃是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关于奥兹本先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他不曾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的辉煌的贡献便是他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约翰·斯特拉奇

第一卷 精神分析学

第一章 研究的范围

本书的目的，在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一般人对于这两种学说之更精密的研究，提供一个先例。本书试要说明人的主观生活（如弗洛伊德所描写的）与经济过程的客观世界（它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所考察过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为要说明这两种见解是互相补充的，我觉得必须充分引证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使读者可以自行看出两者中间辩证的统一。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一种广泛的错误观念，以为它绝不考虑在每一人类行为中起一部分作用的主观成分。实际上，远在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便已排斥那种错误的信仰，那便是说，人完全是环境的产物，机械的反应变动中的条件。他并且加重说明从能动的主观方面思考人类行为的需要。因此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弗洛伊德曾经企图对于形成这一主观方面的本能，冲动，和一般心理性质提供一种科学的说明，因此对于人和表现在一切人类行动中的外界性质这两者中间的交互作用遂可以作更透彻的了解。为了这缘故，我相信精神分析学应当成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一部分，在以后各章我要说明它的学说怎样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我知道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存在有一种倾向，把弗洛伊德的学说当作资本主义文化一种堕落的表现。密尔兹奇(D. Mirsky)在他所著《英国知识界》一书中，讨论到战后的“上流人”，他说道：“弗洛伊德已经被认作一切愿望和情欲的借口，一切种类的自由或放纵的护符，一切纪律的完全解脱。他已经成为这一知识界的圣经。”^①

必然无疑的，弗洛伊德的学说受过这样的利用。不过，科学的学说常是命定被曲解了来支持堕落的和反动的观念的。举例说，达尔文主义被用了来辩护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被用来解释富与贫的存在。

同样，为要逃避迫切的社会问题的现实，而倾向于病态的反省和心理状况之精密的分析，由此表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文化上的堕落的，乃是对于心理学日渐增加兴趣的一方面。但还存在着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比较健康的另一方面。

^① 《英国知识界》第111页(Gollancz)。

正如牛顿的物理学之发展可以与当时资产阶级世界的机械问题关连起来，天文学与几何学的研究与航海和农业的问题关连起来，心理学兴趣的增长可以看作从主观方面了解人与其环境的交互作用之迫切需要的反映。

客观的经济条件对于社会主义已经成熟。生产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任务是要唤起走上革命道路之需要的一种觉悟。狄兹根(Dietzgen)问道，“关于制鞋工业，除了知道它生产鞋子，我还知道什么呢？”我们也可以问，“关于意识，除了知道它为人的社会存在所决定，我们还知道什么呢？”人的意识是如此决定的这一点，乃是马克思的重大发见；但现在我们需要在那一发见上继续建筑。在发展的这一阶段，关于借助不同的方式与经济环境交互作用的心理学的性质，需要精密的研究；因为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学的，也是心理学的。这问题可以这样提出来：“在一定的环境下，我们怎样才能使工人们以革命行动的用语来感觉和思想呢？”为了这缘故，革命者不得不从事现代心理学的研究。

关于与经济学的世界交互作用的基本的心理学的过程，正需要认真的考察。弗洛伊德作为这一项工作的勇敢的拓荒者，在他所已得到的关于人类的革命的发见上，足以与达尔文和马克思并列。凡愿在观点和行为方面以革命者自任的，不应当仅通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定律，也必得把握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现象的原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一个重要部分。

现在这一片心理学家的研究园地包含有人类的爱和憎，轻信，偏见和忠诚。

政论家和政治家劝导人们买他们所不需要的物品，或打与他们无关的仗。达到更好的社会的手段已经近在手边，人们却被骗来接受那种不舒服不合理的旧社会。为什么？

我们已经看出社会改造之需要的人们，不应当忽视科学地回答这问题的任何尝试。我们觉得，假如我们知道人类生活的内部运动，并知道与环境交互作用以产生不同式样的行为的那些基本要求的性质，我们便可以在我们所愿的方向上指导人的希望和力量。

弗洛伊德至少曾经尝试供给一种科学的解答，即使只为了这理由，也值得我们加以注意。

第二章 心之构造

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是：作为一切意识行为的基础的是一种原动的无意识的心。依这种学说所说，每种意识的思想和行为在无意识的心中深深地伏有其根株，因此要想了解心理的生活，就必得探溯意识行为与其无意识的源头之间的连系。为了这种任务，精神分析学已经发明了它自己的技术，这种技术在证明无意识动机这见解上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可以把精神分析学，第一，看作探求无意识的心的一种技术，第二，看作关于心理生活的一种学说，这学说大部分是由这种技术的结果发生的。

我们不应当把无意识的心看作一种被动的收容所，它接收外界的印象，把它们保持到被一种记忆的行为送入了意识界为止，事实上并不这样。也不应当把它看作凋谢了的记忆之保管库。无意识在性质上是原动的。它那不断的争取意识的表现的内容，乃是意识的生活后面的原动因素。论到同它的关系，意识不过是由深藏的伏流所产生的心理生活之表面上的微波。它是本能生活的源头，也是民族遗产的贮藏所。一般的具有性的性质的并与儿童生活相关联的感情经验，取了与人生之意识的标准相冲突的冲动和愿

望之形式的感情经验，也留在这里。这种感情经验被投入了无意识，因为承认它们的存在会使意识的生活感受痛苦和不安。虽然受了压制，它们却永不停止那取得满足的斗争。精神分析学大部分的任务便是考察这种被压制的东西寻求满足时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虽然无意识与意识生活隔绝，因而无从直接知道，但有一些可靠的理由足以使人承认它的存在，下面便是主要的几种理由：

(一)借助精神分析学的技术，已经把不能用平常的记忆行为得到的儿童时代的记忆恢复过来。病人们可以因这种技术知道在他们的病象后面的无意识的动机，精神分析学因这种技术所已得到的成就可以表明，在这些成就后面的学说不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二)无意识过程的存在由催眠后的现象得到一个明显的证据。大多数心理学家都熟悉这所说的现象，要想在指导意识行为的无意识过程外另想一种解说是很困难的。在催眠的时候，命令受术者，要他在脱离催眠状态后若干时候作一件事。在催眠后若干天有时若干星期，当他作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忘记催眠时的遭遇，但仍忠实地遵守那时的命令。举例说，他会在一种内在的强制下在一定的时间打开一面窗子。这种强制显然是无意识的，假如一定要他说出一种这样作的理由，他将首先显出为难的样子，然后给一种合理的回答，大意是说房中太闷气，等等。

(三)舌头和笔下的滑失以及大量日常的错误，表明了

加于意识的旨趣的一种妨害，其原因只能是无意识的。弗洛伊德在他所著《日常生活的心理学》中举了一个说错话的有趣的例——在那部书中可以寻出许多这类性质的例来：“一个富有但不甚慷慨的主人请他的朋友们来参加一个晚间跳舞会。直到晚十一时半，一切经过都很好，那时有一段休息时间，大家以为会有晚饭吃的。但结果使大多数客人大为失望，因为到时并没有晚饭；他们只得到薄薄的夹心面包和柠檬水的款待。因为那时快到选举的日子，谈话遂集中在不同的候选人身上；当讨论逐渐热烈起来的时候，一位热心称赞进步党的候选人的客人对主人说道：‘关于狄兑，你可以随意说他什么，但有一件事——他总是靠得住的；他总给你一种公道的饭食。’他本来要说公道的待遇（square deal），却说成公道的饭食（square meal）了。在场的客人们哗然大笑，使得说话的人同主人都非常难为情，他们彼此是十分了解的。”

（四）有时一个问题得不到意识的解答，但搁过一些时候，不加以意识的注意，譬如在睡眠的时间，这问题的解答会出现在意识中，表明这种解答问题的工作曾经无意识地进行下去。一个“在舌头尖上”的名字而无论如何记不起来，也是常见的。把注意移向任何一方，这名字便在意识中出现了。

（五）无意识的心也是艺术灵感的泉源，把它内蕴的丰富加给诗的印象上。有的诗是在睡眠中作成的，以一种完成的样式浮现在清醒的意识中。例如寇尔利治（Coleridge）

说，他那首美妙的诗《忽必烈汗》，大部分是在睡时作成，在醒时写下的。

(六)最后，如将在下一章说明的，梦足以证明伏在梦的幻象下的无意识过程的存在。

弗洛伊德把原动的无意识同另一些心理过程分别开来，那些心理过程在无意识时用不多的努力便可以被唤到意识中来。这些心理过程属于前意识，并代表一度是意识的观念和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不再留在意识的园地，但却近在手头。我可以用我写作时的意识的内容来说明这一点。我意识到笔在纸上的压力，纸的白净，同时在我的意识的边缘我知道邻室正有人在弹着一架钢琴。我被走来问一个电话号码的妻所阻断。这号码先前并不在我的意识中，但一种不大用力的记忆行为便把它送到意识中。它存在前意识中。

但这一类的记忆行为并不能把原动的无意识的内容送到意识中来，因为，如弗洛伊德在恢复儿童时代的记忆的尝试中所发见的，那儿有一种保护意识生活不受与它不调和的冲动所侵犯的压制作用，强迫这些冲动留在无意识中，并抵抗任何送它们到意识中的企图。弗洛伊德说：“全部精神分析学实际上建筑在，当我们使一个受术者意识他的无意识时，他所施的抵抗之认识上。这种抵抗的客观征验是，他的联想突然停止作用，或从正在讨论的题目上远离开去。”虽然这种压制力是无意识的，我们因之无从知道它们的存在，不过大量的感情经验不与意识生活相衔接，完全由于它

们的存在这事实。这种能动的压制过程的概念对于遗忘的经验予以一种新的说明。一大部分的儿童生活，依照随时间的消失而萎谢的意义说是“忘记”了，其实是被压制住了，在无意识的心中继续它的存在，对于意识行为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

关于这种压制力，在弗洛伊德所作最早的公式中，把它们比作一个检查员。为要便于了解这种概念起见，我们可以把心看作三层楼的住宅。在最高一层住着意识家庭的高尚可尊敬的份子。在他们下面是前意识的人们——安静而守礼的人们，他们得到随便访问他们上面的邻居的许可。固然，有一个警察站在楼梯上，但他是一个和善的人，很少禁止通行。但住在底层的市民却是一群骚动的未受教化的家伙，吵闹着要通过那个站在他们与前意识人们之间的操劳过度的警察，这警察的任务便是制止他们不要扰及楼上的人们。偶然有一个从他旁边溜过去，总是乔装作善良无害的人，并常在警吏的防范因在夜间而弛缓下来的时候。这些警察是著名的检查员，与上边所说的压制力是相类的。

近年来弗洛伊德觉得需要用别的概念来更适当地说明心理过程之原动的性质。上边所用心理的分类，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当作说明的工具固然是有用的，但会给人一种关于心的静止的图画。关于它们，弗洛伊德说道：“我们曾经说过前意识和无意识的体系……因此‘无意识’这个名词愈来愈被看作一种精神的地域，而不是精神自身所有的

一种性质了。”^①

这些新的概念是“爱德”(id)、自我(ego)和超自我(super-ego)。爱德指因其内容之不合理的性质而仿佛与意识的人格无关的那一部分的心。弗洛伊德从尼采借来爱德这个名字,因为,它是从拉丁文的非人称的代名词生发出来的;因此觉得很适于表明这种与意识生活的矛盾性。虽然爱德是完全无意识的,却不与无意识的心完全符合,因为自我和超自我有一些部分也是无意识的。主要的为了这种事实,弗洛伊德决定采用爱德这概念。他说:“在这一点上,超自我和自我有一些部分在原动的意义上也是无意识的,这发见乍看象是不适当的,却有一种方便的效果,并使我们免除一种纷乱。我们显然没有权利称呼既非自我也非超自我的那一部分的心为无意识体系,因为无意识的性质并不专属于它。很好;我们不再在一种体系的意义上用‘无意识’这个名字,对于以往我们用那个名字来称呼的东西我们要给一个更好的不会引起误会的名词……我们此后将称它为‘爱德’。”^②

在爱德里边的是不断地在要求满足的基本的本能,以及不断地寻求意识的表现的一切被压制的东西。因为爱德不问时机是否合宜,一味为它的内容寻求满足,要求立即的无条件的满足,弗洛伊德说它是由“享乐主义”主宰的。

我们可以把它主要的性质开列如下:

① 《精神分析学新论》第96页(Hogarth Press)。

② 《新论》第97页。

(一)它是无意识的。

(二)它是无理性的,不为现实的考虑所指导,但要求无条件的满足。

(三)它是一切本能冲动后面的基力(libido)、能力或推动力的贮藏库。

(四)它收容一切被压制的东西。

(五)遗传下来的种族的性质保存在它里面。

(六)它是与道德无关的,在它要求满足上没有“是”或“非”的概念。

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一种不受限制的爱德很容易把整个机体陷入困难中。现实并不很慷慨地使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我们最低限度必得学习延宕这些愿望的满足,以待有利的机会出现。在早期儿童时代,爱德的一部分因与外界现实接触的结果得到修改。这种爱德的修改便被称作自我。自我限制并驾驭爱德的要求,在一种现实的原则上为它们寻求满足。所以它为适合外界现实的爱德采取满足的方法,必须时它把这满足延宕到更适当的时间。当自我辨别外部情况时,它是当作服事爱德的一种手段来作的。弗洛伊德说,“就全体来说,自我必须实现爱德的意向;假如它能制造可以实现这些意向的条件,它便完尽了它的责任。我们可以把自我和爱德的关系比作骑马的人与他的马之间的关系。马供给运动的力量,骑马者具有决定方向和向着那方向指导他那有力的坐骑的大权。不过在自我与爱德的关系中间,我们时常看见不大合道理的情形,在那种情形

下，骑马者必得在马自己所要去的方向上来指导他的马。”^①

自我的主要性质如下，

(一)它主要是意识的。

(二)它是合于逻辑的，为一种“现实主义”所控制，与爱德的“享乐主义”相反。

(三)它保有一种梦的检查权，以免被压制的东西扰乱意识。

(四)它把语言的形式赋给它的内容。

但自我出生于人生开始若干年间，那时在儿童与两亲之间存有强固的感情连系。因为还软弱，自我还不能有效地对抗争取满足的爱德冲动，必须借助把自己的一部分与两亲视为一体以加强它自己。两亲代表威权，因为他们有力量限制和禁止儿童的愿望，不容许任何反对。由于把自己的一部分与两亲视为一体，于是在心中扮成严峻的两亲的角色，监视着爱德的冲动，并强迫自我压制那些它认为不能许可的冲动。这种威权的内部化，弗洛伊德称为超自我。这乃是最早的道德律形式。它过去被人比作“良心”，但格外来得严峻，这是在早期儿童时代发展起来的，那时两亲的威权是极端尊严的，琐细的错误行为在那时也显出庞大的比例。超自我在意识生活上实施的横暴行为，使得许多人无力摆脱他们那时代的宗教和政治的传统。至于它们怎

^① 《新论》第103页。

样取得统治人类生活的威权，留待后来讨论。在这儿，我可以**说**，弗洛伊德的这种概念是非常可贵的，足以使人了解全部社会现象之繁复及其所依据的威权。

自我依照超自我的命令施行压制，因为这种压制在性质上是无意识的，我们可以知道自我也必定有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因此，意识和自我不是一致的。

自我在与现实接触上，具有在要求满足的爱德和严峻没有理性的超自我中间保持一种平衡的困难任务。这种超自我不仅对于行为就连一种行为的思想也不加以宽容，所以在意识界引起紧张的忧虑。为要免除这个，自我必得采取后面所说的各种计划，一方面慰抚超自我，一方面给爱德的要求以部分的或间接的表现。这些计划有时显示一种从现实的退避，在那种情形下，精神分析者的任务就成为对于爱德、自我和超自我的关系之间的一种调剂，常是参考后来成年人的经验以缓和超自我的苛刻。

自我的困难由弗洛伊德下面的话表明出来：“有一句成语告诉我们，人不能同时事奉两个主人。可怜的自我比这所说的更加困难；它必得事奉三个严厉的主人，并且必得尽力和解这三个人的主张和要求。这些要求总是不一致的，并且仿佛是十分矛盾的；当然自我在它的任务下要常常挫败了。这三个暴君便是外部世界、超自我和爱德。……它觉得它在三方面受包围，为三种危险所威胁，当它被压迫得太厉害的时候，它的忧虑便对着它们发展开来。因为它源起于知觉体系的经验，它命定要代表外部世界的要求，但它

也愿意作爱德的忠仆。……在另一方面，它的每一种动作都为严厉的超自我所监视，这种超自我坚持一定行为的标准，不关心由爱德和外部世界来的任何困难；假如这些标准未被遵守，它用紧张的感情来责罚自我，这种感情化身为一种劣等的和罪过的感觉。照这样子，为爱德所激励，为超自我所包围，并为现实所阻挠，自我努力负起调剂这种内外夹攻的势力的任务；我们大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时常抑制不住这种呼声：‘人生不是容易的。’”^①

弗洛伊德所描摹的关于心的图景乃是精神力量之原动的交互作用的图景，这些精神力量有的要求满足，有的用力阻止它们的满足。他所用的概念帮助我们了解：关于我们自己内在的心理生活，我们所意识到的是多么少，有多少是在无意识的深处进行。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儿童时代的感情经验——已经越出意识所能达到的范围，但只有意识到它们，我们才能了解许多不合理的忧虑的原因，才能了解我们在意识的主张上所经验的阻碍的原因，才能了解我们的迟疑和无法说明的忌讳的原因；并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设法使我们在一种更合理的平面上生活。

一切对于原动的无意识概念的反对都主要地变成了文字的和逻辑的诡辩。

弗洛伊德也同任何别的科学家一样，对于不能用现存的学说来解说的事实只好创立新的学说。在他把无意识的

^① 《新论》第103—104页。

心的考察作成一种科学以前，这种无意识的心的存在不过为人所猜测。正统派的心理学家过去以为心等于意识，并讥笑无意识的心理过程的意见，他们说这意见含有一种字句上的矛盾。精神分析学在它这短短的存在过程中所已收集的事实（前面已经引过几个例子），压倒了诡辩家所提出的胡说的无价值的反对。一种心理学的科学之建立乃是弗洛伊德伟大的劳绩，而这事实却为那些把科学限制在非人的地域并把人类心理生活的园地认为不可侵犯的人们所深深地愤慨。

意识与无意识中间的因果联系在梦的研究上表现得最清楚。从这个题目上我们为许多困难的问题得到一个解答。

第三章 梦的解释和 分析的过程

弗洛伊德已经把梦放入科学考察的园地。先前梦只是占卜者、预言家以及各种江湖术士的领域，对于这一个向来为鱼肉迷信者和无知者的人们的活动场所，科学家并不认为有加以重大注意的价值。假如他们把这个问题想过一下，他们便说，梦的生活乃是疲倦的脑筋之混乱的产物，于是就此罢手。

弗洛伊德在说明梦怎样成为精神分析学的一部分的时候描写出这种态度。“一天我们发见某种神经过敏的病人的病象是有意义的。精神分析法的治疗便建立在这种发见上面。在进行这种治疗时，病人述说他们的病象，有时也提到他们的梦，由是引起这些梦也有意义的猜度。……因此梦就成了精神分析学研究的对象——梦如同过失，是健康人所同有的，也为一般人所忽视的，认为显然没有实际的价值。但在别的方面，工作条件更为不利。过失只为科学所忽视；人们不为这种事烦扰他们的头脑，但若加以研究，至少算不得有失身分。……至若研究梦则不但无益而徒劳，实在是很可耻的；这种研究本身具有不合科学的臭味，

并引起倾向神秘主义的嫌疑。在神经病学和精神治疗学内既然有许多重要的问题，而医学家偏萦心于梦，这是更没有道理的呀！……梦是太无价值，太琐细了，不配作科学研究的对象。”^①

不过，弗洛伊德并不为这种态度所阻挠。他主张，梦是一种确定的心理现象，所以要用科学方法来加以研究。他对于梦的性质的考察非常有成就，于是梦的解释成为他的精神分析术中最重要的过程。借助于这种方法，他已经可以透入无意识的心的深处，并揭发他的病人的苦恼后面许多被压制的材料。

梦的一般目的是在防止惊扰睡眠的一切事物。它的方法是把内外任何惊扰的刺激与一种被压制的愿望联合起来，于是想象这愿望得到满足。例如饥饿这内部的刺激将要搅醒那个腹饿的人，他便梦见去参加一个宴会，于是在想象的满足中保持了他的睡眠。很少的梦分析起来象这样明白简单。据弗洛伊德说，因为每一个梦与一种为现实所阻挠的愿望之实现相结合，由分析学表明，这种满足常采取一种弯曲地间接的途径，需要很大的技巧和耐心来说明它。

梦的显在内容和潜在内容之间有一种分别。潜在内容是梦的真实动机——造成梦的被压制的心理过程。为要在意识中得到表现，这些无意识的过程用别的观念、印象和象征来化装，以便通过在睡眠中警戒稍弛的检查员（或压制

^① 《精神分析学引论》第68页(Allen & Unwin)。

的力量)。“一个梦是一种被压制的愿望之假装的满足；它是被压制的冲动之要求与自我所具的检查力之阻挠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妥协。”

所以梦中的实际表现是所谓显在内容，在那下面的才是具有梦之真实意义的潜在内容。精神分析者的任务便是在作梦者所叙述的梦后面寻求造成这个梦的潜伏的无意识过程。

弗洛伊德把强迫歪曲潜在内容为显在内容之梦的检查比作战时的报纸检查。“拿起任何政治性的报纸，你时时发见原文中有被检去的地方，在原来的地方你的眼睛所接的是纸的空白；你便知道这乃是报纸检查员的工作。在这些空白出现的地方，原先存在有为检查当局所不容许的东西，为了这缘故才被删去了的。你大概觉得可惜，因为那地方一定是最有趣的部分，新闻的‘精华’。

“有时被检去的不是全句；因为著者预料有几段大致为检查员所反对，预先将这些句子化硬为软或略微加以修改，或将他本来要写的东西出以暗示和讽喻。于是新闻中便没有空白，但从所表现的曲折欠明瞭的意味中，你可以领会到著者写作时心中已存有检查这事实。”^①

被压制的材料借以进入意识的心理过程便是所谓梦的工作(dream-work)。借助这种办法，惊扰的刺激被制成了梦，并供给被压制的材料得以表现的形象。梦中使用外界

^① 《引论》第116页。

的景物，惯见的例子，如由于热水壶漏水引起与海有关的和在上海上旅行等梦境，由于闹钟的声音在梦中出现礼拜堂清脆悦耳的钟声。当惊扰的刺激结成一个梦的时候，睡眠遂得保持。

这儿有弗洛伊德引证的一个梦，大可以说明这种过程：

“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正在散步，走过开始发绿的田野，一直走到一个邻村，我看见大队的村民穿着假日的服装，手里拿着赞美诗，到礼拜堂去。当然啦！这是星期日，早礼拜正要开始举行。我决心去参加，但因我觉得非常热，我想先要在礼拜堂周围的墓地乘一下凉。当我正在读那儿的一些墓碑时，我听见鸣钟的人走进了钟楼，我现在才看见那地方高高的有一口乡村的小钟，钟一鸣便是开始礼拜的信号。过了一些时候，那个钟还没有动，随后它开始摇摆，忽然间发出清晰而尖锐的声音——这声音如此清晰而尖锐，我的睡眠遂不得不中止。但那个钟的声音却来自闹钟。”^①

当一个梦采取一个梦魇的形式时，那是因为它已经在保护睡眠的功用上失败了。潜在内容不曾化装成功，使得惊觉的检查员必须阻止这种不受欢迎的冲动透入意识。这可以用譬喻来说明如下：在睡眠中弛缓下来的检查员由防御外寇的哨兵来代替。一个被压迫的冲突，化了装，想要偷过去，为哨兵认出来，他即刻发出警号并招出卫队。这样一个化装不完备的被压制的冲动惊醒所有在睡眠时停止活动

① 《引论》第75页。

的压制力。

我们现在研究一下梦的工作把梦的潜在内容改变为显在内容时所采取的一些方法。

关于凝结作用 (condensation), 弗洛伊德说道, “我们所指的是梦的显在内容比潜在的思想来得简略这事实——仿佛前者是后者的一种节译本。”因了这种凝结的过程, 一些性质多少相同的潜在内容融合起来, 在显在的梦中由一个印象或观念来代表。一个人在梦中可以含有几个人的性格。例如, 我们可以梦见一个人, 样子象布朗先生, 走路象格林先生, 而穿着象槐特先生。或一个叫作南浦的地方, 在我们的梦中, 可以成为两种经验之象征的结合——一种在南尾, 别一种在黑浦。在潜在内容中, 这些人或地之间有一种联想结, 使他们能在显在的梦中结合起来。

这种过程是很复杂的, 因为不仅几个被压制的冲动可以由显在的梦中一种原素来代表, 一个被压制的冲动也可以由几种显在的原素来表示。在显在内容与潜在内容中间有弗洛伊德所谓的“交织作用”, 所以显在的梦中每一原素的意义常须等待全梦的解释。

梦的工作之最重要的过程大概是移置作用 (displacement)了。显在的梦之费解的性质主要的是由于这种作用。

与潜在内容中的重要原素相联系的情趣可以移置在另一种比较不重要的原素上, 于是显在的梦中的重心遂被置在不重要的原素上。因此, 象是梦的主题的东西实际却是一种不重要的因素, 而梦的真意义被蒙在显在的梦之一种不

显著的原素中。在一个描摹一所房子的梦中，门和窗的华美外形会把对于梦中实在要素（例如一个小烟囱帽）的注意转移。弗洛伊德说，“移置作用乃是梦的化装过程中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而这种梦的化装则是梦的思想在检查的势力下必须实行的。”

借助戏剧化(dramatisation)的办法，一个梦中的思想得到可以眼见的形状，抽象的观念由具体的物品代表出来。这是与移置作用密切相连的，因为在选定一种观念来代替一种重要原素的情调时，其所据的理由之一便是这种观念可以作这重要原素之可以眼见的代表。弗洛伊德说，“梦的活动毫不踌躇地把僵硬的思想改变作另一种语言的形式，即使这种形式是比较不常见的，只要这种形式使戏剧化成为可能，被压制的思想所引起的心理痛苦就得以终止。”

梦象演戏一般被表现作行动；空间和时间的考虑在显在观念的表演中是不成问题的。

最后是润饰作用(secondary elaboration)的过程，这过程在睡眠将醒时发生并且继续下去。梦为觉醒的检查员所润饰，赋以联贯和比较合逻辑的形式。有一些原素受到更彻底的化装，因而不会惊扰意识。显在的梦中的各种原素是彼此关连的，所以梦形成一个整体，虽然如此，“概括地说，我们必不可以用显在的梦的他一部分来解释显在的梦的此一部分，一若梦是一个联贯的整体和实在的表现。”^①

^① 《引论》第153页。

润饰作用的效力能给梦一种几乎完全新的形式，格外增添解释的困难。

被压制的心理过程借助象征的使用在梦中得到表演。一种物体因为与别种物体有一点相同的地方遂相代表，虽然它们中间的联系微弱到不能为意识的心所觉察。象征作用主要的是把情趣由这一物体转移到另一物体。这在人类中是一种普通的过程，可以从神话和宗教仪式中看出来。用面包和酒象征耶稣的身体和血；用持天平的蒙目女人代表正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

在一方面，这一类的象征作用是应付比较原始的智能之需要的，把观念表现成具体的形式，但当被看作表现无意识的过程时，这些象征却都是化过装的，选择最疏远的联想中的物体来代表被压制的要求。

有一些在梦中采取的象征出现得如此频繁，已被看作普遍的了。因为象征作用占如此重要的一种地位，弗洛伊德所给的一些用作象征的物体的例证颇值得引述。

“梦中以象征代表的事物为数不多。如人体、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生死、赤裸。代表整个人体的最常用的象征是一所房子。……人们梦在房子的前面攀援而下，有时觉得愉快，有时觉得惶恐。墙壁若是平滑的，那房子便指的是男人；若有可以把持的架棚和阳台，便是一个女人。父母在梦中现身为皇帝和皇后，国王和王后，或别的高贵人物；就这一方面说，这梦的态度是十分孝敬的。儿女、兄弟、姊妹等则受比较不良的待遇，往往象征为小动物或虫子。生产

的象征常不离水；或梦堕水，或梦出水，或梦救人出水，或梦被救出水，这所象征的便是母子间的关系。死亡的象征为出发旅行或乘火车，至于死的状态则用各种暧昧而宛似怯弱的譬喻来表示；衣服和制服用来代表赤裸。……男性的生殖器在梦中有各种不同的象征，就大多数来说，其比拟所依据的共同观念是容易明白的。第一，三这个神圣的数目是整个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其更重要而更为两性所注意的部分——阴茎，被象征作与之形似的长而直竖的物体，如手杖、伞、竹竿、树干等等；也可象征作有穿刺性而足以伤损身体的物品——那就是说，各种锋利的武器，如小刀、匕首、戈矛、军刀等；至如铅笔、笔架、插纸钉、锤子以及他种器具也显然是男性的象征，这意义也是容易明白的。这种器官因有违反地心吸力高举直竖的特性，所以也用气球、飞机和齐柏林飞船来象征。但梦于高举一层尚有另一种更有力的象征；梦使生殖器成为全个人的重要部分，于是梦者自己遂梦飞翔了。你们不应当因为女人也可以作飞翔的梦而反对这一点；要知道梦的目的在满足愿望，而女人则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有作男人的愿望。女性生殖器则以一切有空间性和容纳性的事物为象征；例如地坑、洞穴，又如缸和瓶，以及各种大小的箱子、橱柜、银柜、口袋等等。许多象征是专就子宫说的，与其他生殖器官无关；例如碗柜、火炉，尤其是房间。”^①

这些象征有许多在读者看来仿佛是牵强附会的，但弗

① 《引论》第128—131页。

洛伊德说，梦的象征作用已经由实验证明了。实验的结果是这样的：命令一个受深催眠的人来做梦性的动作，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对于这个梦的叙述，便表明代表那些性的动作的习见的象征如何运用。

用于精神分析的过程中的技术好象是非常简单的，但分析者却要有多年训练来的技巧和忍耐。这种技术以“自由联想”著称，其方法如下：病人仔细述说一个梦，一种经验，或一个观点，或一种得意之论，分析者请病人围绕着他所叙述的内容自由思索。病人不应当用意指导他的思想，只要说出在他的意识中出现的联想。因为一种联想引起别一种联想，于是病人把他的梦或经验等所依据的埋藏的记忆发掘出来。在分析者平静的房间中，病人的心情弛缓下来，随随便便地叙述他自己和他的梦。分析者要十分小心不要对病人作语言或行动的暗示。

分析者格外注意病人叙述时仿佛足以表明受压制的材料的犹豫神情。这种分析进行时要遇到很多抵抗，仿佛病人恐怕把他的无意识的冲动启露出来，完成一次分析常需要许多个月——忍耐而聪明地进行的许多个月。

一种感情的关系在分析者与病人之间发展起来，便是所谓移转作用，把属于未满足的过去关系的感情和冲动移转给分析者。病人于是把使他不满的感情状况复活起来，分析者时而代表这一个与病人有过感情关系的人，时而代表另外一个。例如，他可以代表病人的父亲，于是对他发生爱

和憎的矛盾感情的儿童态度。这种双层的或相反的态度，因为有着互相冲突的动机，遂至对于一种事物又爱又恨，分析者的工作因此成为很困难的。如弗洛伊德所说，“分析者在控制移转的情境上显然遇到极大的困难，但不要忘记，使我们把病人埋藏和遗忘的爱情刺激表明出来的正是这些困难，因为在这最后的场所，没有人能逃避得了的。”

分析者最后的目的是把移转作用的关系弄明白，于是病人认出分析者的身分以及所感到的对他的矛盾感情的性质。这样他便可以脱离分析者而认出他的病源。

下面一个梦的分析可以算作精神分析术一个颇有趣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巴拔拉·罗(Barbara Low)提出的，梦是由一个女病人述说的。

“‘我是一个九岁左右的孩子，同家人住在我的老家中。那是在日中的时候；我刚从晨校回家午餐，站在门前台阶上等我母亲开门。我满怀惶恐，仿佛是因为门没有开，虽然没有明显的害怕的理由。随后我母亲来开门，不过她穿着一件蓝衣服，颜色与你昨天所穿的一样〔这是指分析者〕。她高大而有威风，她的头发完全变黑了〔实际上，她是矮小的，并且那时她的头发是淡棕色的〕。我记得我狂暴地冲过她去，我所知道的不过如此。还有一些别的事——我记不清楚是什么了；我想仿佛在一间房中有一池水，但我跑了过去。’

“一种完备的分析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表明凝结作用、移置作用、戏剧化、润饰作用等都在这儿起了作用。

“在未敞开的门前的惶恐是从两次童年经验中引用出

来的原素：其一是她在晨校放学后慌张地站在她自己的前门外，因为她要撒尿，并担心她不再能忍下去（她的母亲把尿裤看作一种很大的羞辱）；其二是在一两年后一个暗黑的晚间在家门附近遇见一个醉汉，他想要调戏她（或者说她这样相信），她猛烈地避开他，跑向她自己的家，站住想敲门进去——但家中没有人，她于是藏在花园的小舍中。凝结作用采取了这两种记忆，都有性的意味，并把它们融合成一种与身体官能有关的惶恐和羞辱的记忆，与她自己的家门联想起来。凝结作用也在她母亲的形貌中显出来，她母亲也具有（或实在或想象）她的分析者的特征。由分析术表明，病人在许多方面赋予分析者以母亲的脚色，并想以分析者代替她自己的母亲。这样借助观念和原素的融合，真的母亲部分地变成她所愿有的对象，并穿戴上她的衣服和头发。移置作用在这个梦中也容易看出来。与她不能继续忍尿和为醉汉侵犯相联的羞惧之情，从那些经验移转给在门外等待和开门，用以部分地遮掩实情所在。‘室中的水池’乃是一件童年事故的记忆，这件事发生在她的学校中一个门口外的游廊中。

“戏剧化彻头彻尾都是显著的，特别是在‘狂暴地冲过她的母亲’那一段，表明门终于打开她可以满足她身体上的需要了那一刹那紧张到顶点的感情。润饰作用在她醒时的评判中表现出来：‘还有一些别的事——我不记得是什么了。’一种更深的分析知道开门时她已经遗尿（使她母亲大为愤恨），这一记忆为检查者扣留了，意识方面只留下有一些

‘别的事’——不值得记忆的。最后，由分析术表明在这个梦中表现一种愿望的满足——那便是，再在家中作小孩子的愿望（此外，要有自己选择的母亲），并且尽情享受那时期被禁止的身体上的快乐，这种原始的快乐，早先具有趣味和兴奋，但在她这成年的‘受过教化的’生活中已经成为禁忌，被遗忘在无意识中，但依然保有原动力，因为从未充分的满足过。”^①

谈到精神分析术的应用，弗洛伊德是极端小心的。他坦白地承认在治疗上的成就并不足夸。他说：“我不希望我们的成就能胜过卢尔德镇(Lourdes)的成就^②。相信童贞女的神通的人比相信无意识的存在的人多得多。”^③

不管这句话的讽刺意味，似已暗中承认暗示作用在治疗上的功用，因此难得说他的技术上的成就有多少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而不由于病人对于分析者所有的信心。在目前的情况下，精神分析术的应用还不很广。它同现存宗教的和道德的信仰冲突得太强烈，因此它的应用只好限于少数思想开通又能供给必需的高费用的人。

弗洛伊德不明白这一点，因为他在考虑教育问题时说道：“我们大多数的儿童在他们发展的过程中要经过一种神

① 《精神分析学》第62—64页(Allen & Unwin)。

② 卢尔德镇在法国庇里尼斯山下，传说童贞女曾在那里显现，附近有泉水，病者多去那里求疗，所以弗洛伊德引来作比。——译者注

③ 《精神分析学》第62—64页。

经的变化，由这见解自然引起一个卫生的问题。即使没有发病的现象，也要用精神分析学来帮助他们，作为对于他们的健康的预防办法，正如现在我们为健康的儿童作预防白喉的注射，不等他们发病时再治疗，这样办不是很有益的么？但我们当代大多数人以为连这样想都是一种罪过……这样一种大致很有效的神经病的预防，要想作得成功，应当先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①

如此看来，精神分析学，正如一般的科学，在应用上受到现存社会结构的妨害，不能充分地发展，所以精神分析者既然深信他的技术之普遍应用的好处，就必须对于社会改造问题加以考虑。这样的考虑，要想作得适当，就要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因为他们的学说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给了一种科学的阐明。

^① 《新论》第125页，着重号为本书著者所加。

第四章 常态心理与变态心理

有一种反对精神分析学的意见，便是说，这种学说的根据是由变态的或病理的症状观察得来的。事实是这样，变态与常态不过程度之差，这一方面的一些倾向不过是另一方面的同一倾向之扩大了的形式。病理的症状所呈现的心理倾向之扩大的性质，研究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对日常行为作为一种亲切的观察，便知道在每一个人身上有同一倾向在活动，不过比较不显著罢了。因为在本章我要说明含有无意识动机的意识行为，所以最好先从变态的症状说起。

例如，在神经系方面发生了一种变化，互相冲突的冲动掀起一种不堪忍受的紧张状况。压制是太薄弱了，不足以对付这些冲动，于是感到一种焦躁心情的威胁。为要免除这种威胁，自我便造成神经病象，用以加紧压制，或给无意识的冲动留一部分的出路。这种病象供给一种逃避的方法，使自我脱离引起极端忧虑的互相冲突的无意识冲动。所以在战争时期许多兵士们陷入矛盾的感情和冲动中。他们一方面愿意离开战地越远越好，一方面却又为那种动机所引起的羞耻之感压制住。逃走是可耻的。留下呢，又有丧命的危险。于是我们看出两种互相冲突的心理倾向。自我一

方面要应付爱德脱离危险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应付超自我的严肃的道德，这种道德坚持一种行为的规律，使得逃走成为不可能的。要逃脱这样一种窘境，自我必得想办法满足爱德，同时又要慰抚超自我。一种偶然的伤创会供给一条出路。这个可怜的人可以造成一种盲病或瘫痪，这样一来，他当然不能再从事战争的工作了。他因此可以满足脱离战争的动机，同时不致引起痛苦的罪恶之感。有一些意识的痛苦总与作为安慰超自我之手段的神经病象相伴而来。这种盲病或瘫痪症是源于心理的，因为在受催眠时，他的视觉或瘫痪的部分都可以复元，一离开催眠状况便又不成了。采取这种病象的全部过程是无意识的，并没有居心欺骗。借助一种身体的病态，使不幸的自我脱出一种无意识的冲突，这种方法弗洛伊德称为变形的神经病。好象心理的冲突转变为身体的病象。

另一种逃避的方式来自强制神经病。受窘迫的人常有这种情形，他觉得他必须作出本身毫无意义的行为，只在象征那被压制的过程。这种行为如安置、计算、抚摸东西，都有一种保护的价值，因为这样可以免去他作别的足以引起不愿有的感情联想的行为。这种逃避价值便在于这些强制行动在意识中是没有感情的意味的，因此发动它们的那感情冲动被隔离了，不再去扰乱意识。同样强制的行动还有如时时洗手（好象要除去一种有罪的污点），避开铺路的石头的接缝处，抚摸栏杆，计算楼梯，等等。假如从事这些行为的人被问到的时候，他给不出意识的理由来。他只能回答他

觉得必须这样作。

这些例子表明神经病人的病象是有目的的。神经病人需要他的病象以逃避忧虑。如一个精神分析者所作的解说，这人宁愿害病，因为这是他唯一免除心理冲突的路径。

有时神经病取一种极端的形式，病人只有把他同外界的关系完全加以歪曲，才能逃避他的无意识的冲突。人于是说他患了疯狂症或精神病。

以迫害狂著称的精神病人从意识上相信全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他。他相信他在被迫害，把最平常的行为和说话都看作危害他的幸福的。实际上他是在受迫害，因为他要用最大的猜疑来看最小的行为和说话，不过这迫害是在他的内心，他所不信任的行为和说话乃是他自己的，这些行为和说话会成为他所怕的压制下的无意识冲动的媒介物。换一种说法，他是在努力逃避内在的冲动，把它们投到外界去，作为脱离它们的一种方法。然后他把外界看作危害他的幸福的所在。一旦把他所不欢迎的冲动投到外界以后，这全部过程便十分合于逻辑了。事实上，迫害狂者精心结撰一种十分有条理的合理的体系，用以辩护他们的猜疑。我曾亲自见过这样一种例子，病人用一种复杂的方法证明大多数近时的杀人犯都曾想害他。近年每一凶杀案都有一种情节为他捉住，并确定地与他自己联系起来。他或曾到过那附近，或他的简名与被害者相同——他用一串新的证据来应付每一反驳，极其错综地罗织成一种最坚强的论据。

精神病的另一种形式是所谓幻想狂。患者脱离实在的

世界而退入一种幻想的生活，心理的冲突在其中得到解决。一种转向内部用幻想来满足的病名为“内向症”。病人丝毫不注意他周围的一切，机械地回答问题，并总要做一些与他的心理冲突有关的攻击行为。因为受过一种感情的打击，自我不能应付现实，就要在它自己的世界中寻求慰藉。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白日梦的癖好，在这里边解决当前的实际上的难题。我们或许有一件事应付得不适当；我们便在白日梦中加以补救，把全部情形重演一过，使自己处在较妥当的地位。例如，在实际上以怯弱的态度请上司加薪，但在白日梦中却出以强横的要求。但白日梦必定会得到清算，一旦这个小职员感觉到身下的凳子，看见面前的帐簿，他便恢复了他的怯弱态度。患幻想狂的人不肯也不能放弃他的白日梦。实际上这不再是白日梦，因为他的全部生活都卷到里边去了。

神经病和精神病患者不过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明我们大家同具的一些倾向。研究这种病症的重要，在于它们能表明反应那充满着危险和苦恼的情境的一切方法，虽然这种方法也许一点也触不到危险的原因。假如人类可以用心理学的计策逃避由外界引起的苦恼，对于那些想要除去这些外界的困难的人们，这些计策的研究该是何等的重要？例如，宗教便是逃避现实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因为它的重要性，随后我要加以比较仔细的研究。目前，我要考察自我用以对抗无意识的冲突的一些普通的计策。我们然后由神经病和精神病谈到日常行为的特殊现象。一种日常的特殊现

象在什么阶段上变成一种神经病或精神病，这是很难说的。社会把日常行为的特殊现象看作无害的，把神经病现象看作只于患者有害的，把精神病现象看作对社会和对患者同样危险的。所以，一种病象，由日常的特殊现象经过神经病的中间阶段变为一种十足的精神病，由量的改变引起一种对待它的质的不同的社会态度，可以作为量质互变的例子记住，这道理是将在论辩证唯物论的那一章中叙述。

下面是一些普通的心理计策：

借助反动形成 (reaction formation) 的方法，意识生活中那种作为被压制的冲动之反题的态度或兴趣发展了起来。于是注意力从这种冲动上分散，而压制因以加强。一种普通的反动形成是强梁的同时也是温驯的。借助对任何与性有关的事物——裸体画的信片，跳舞，情侣，现代艺术，小说——作有力的斥责，使无意识的性要求在对于性问题的偏执中得到部分的发泄，同时由于那种偏执的对立形态，这种性要求也受到更有效的压制。另一种惯见的例是关于家庭主妇的，她那种不断的扫除、擦磨和洗刷，使她周围的人把她当作可怕的。这种过度的讲求清洁乃是对于一种强烈冲动的反动形成，在这种冲动中污秽有一种性的意义。

投射作用 (projection) 是躲避苦恼着意识的无意识的愿望和意念的一种方法。把这些愿望和意念投射到外界去，于是把内部的威胁看作外界的。攻击和逃避于是成为可能的，犹如对待一种真实的外界威胁。上面已经说过，照这样子以极端形式显露出来的便是疯狂的症状。

借助投射的方法，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出我们同具的但不肯承认的那些冲动，并加以斥责。一个锐利的观察者常可以从一个人极端排斥的事情上把握到那人的无意识的倾向。在政治生活中，那些把“叛徒”喊得最响亮的人们，大概是借助投射作用来斥责他们自己的无意识的奸诈冲动。“不要判断别人，免得你们自己被判断”，这一句成语具有一种心理学的意义。

关于投射作用，还有一些普通的例子，如：不断查考别人的不诚实的最不诚实的人；使人对别人的过失作锋利批评的罪恶之感；以及那怀疑自己的爱人的人，他的猜疑来自他自己的无意识的不忠实倾向之投射。

使性本能得到表现的一种重要方法是升华作用 (sublimation)。把不复直接属于性的目的和兴趣加给那种性的冲动。于是那种冲动便没有性的意味，并以一种为社会所许可的态度表现出来。例如，同性恋的冲动被升华作友谊，他虐狂的冲动被转变作外科的手术，肛门恋爱狂转变作音乐和绘画的兴趣。这过程是无意识的，是自我之无意识部分的工作。性冲动可以说是受了“目的抑制”(aim-inhibited)。

这种表现方法的好处是它含有最少的压制，因为它并非自我对爱德的要求之一种抵抗，乃是自我和爱德间的一种合作办法。在这一方面，它是反动形成的逆转。所以宙恩斯 (Ernest Jones) 说：“在升华作用中，能力不仅来自被压制的冲动，并且也流向与之相同的方向，至于反动形成则

正相反，其能力来自相反的自我力，并趋向恰恰相反的方向。反动形成颇可用这呆板的比方来说明，它好似建筑了来抵抗被压制的冲动之防堤。这种作用与升华作用的对照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其一，(身体的)自炫之原始倾向，一方面可以升华作体力或演说等显才的嗜好，或更间接如各种名誉的追求，在另一方面，它可以造成谦让和羞愧等反动。其二，儿童对于粪溺的原始爱好，一方面可以升华作绘画、雕塑或煮饭，在另一方面，则造成清洁、整齐和类似性质的反动。”^①

升华作用表明自我的力量足以把本能的冲动的用在社会的目的上。当现实要限制爱德冲动的满足时，自我不肯在它面前退缩，于是在外界的现实中寻求表现的方式，既可以予爱德冲动以适当的出路，又不至与社会的标准相冲突。人可以说，升华作用是社会革命者过分的希望。这儿不便讨论“社会的必要”这个名词的意义，但社会改造者的任务，沿着升华作用的途径，成为爱德冲动的方向，这种升华作用使现社会的解放工作得到实行的便利。

所有方法中最普遍最易识者是合理化作用 (rationalization)。这作用使那种不完成则引起精神的不安的行为得以完成，它所用的方法是使这种行为与意识的标准妥协。这是以代替行为寻找理由的过程来完成的。既经寻得一种理由，可以在意识的标准下替行为辩护，于是这行为便可以

^① 《精神分析论》(Benz)。

没有悔恨和罪恶之感地完成。因此，一个军火制造者对于他那利润是由无辜的人民的鲜血和死亡得来的这事实，用以下的办法来对自己辩解，那便是：“证明”人类的天性要求战争，并且战争是进化上所需要的，因为它能刺激发明。

这种合理化的倾向乃是对于强迫改变我们行为方式的逻辑的一种防御。当一个观点既经采取，借助与意识的标准妥协来便利无意识冲动的表现，这时任何逻辑的反对都会引起大的愤慨，因为它威胁到爱德与自我间的调整。由此可知，不拘在政治、宗教或别的问题上，人们时常先由感情的见地决定一种主张，然后去寻求理由。两人间的讨论时常变为依据感情和个人私图的两种合理化的冲突。每一个人都不大肯听对方说话，只想加强他自己的防御“理由”。所谓“不存偏见”的一方，假如他常用这意思提醒对方，大致比那谦逊的不作此主张的对方更为倾向合理化。任何人以公正或宽大自命，这事实足以表明他感到调整一种特殊强烈的感情化的意念之需要。倘能记住这一点，许多没有结果的讨论可以避免，特别是同宗教的或政治的狂想家的讨论，这些人的观点来自感情的源头，不象是可以逻辑的论据来使之折服的。为要保守他们所持的信念，足使一些人容许一切加诸他的对手的过分行为。最仁慈的和最富于同情的性格，假如它的内心平静感到别种主张的威胁，而这主张为了感情的理由是他所不能容许的，它会一变而为一种渴血的恶魔型。

以上所举的心理计策都见于日常生活中，人可以毫不

费力地发见它们在相识者中间起作用，但若要从自己身上发见它们，便困难得多了。不过表现在谈话和写作上的思想的错误更为常见，弗洛伊德称之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他说明日常遗忘的例子并非偶然，乃是由意识生活中无意识过程的参与来决定的。

当一个平时记忆力很好的人忘记一个约会，那是因为他本来有一个无意识的难以履约的理由存在。例如一个青年女子忘记会晤她的青年男子，显然她那女性的热情正在消失下去。

弗洛伊德引用斯提克尔 (Dr. W. Stekel) 医生所举关于舌尖的错误的例子，表明一种不合意识标准的潜伏的愿望。

“我那不愉快的思想中一个不愉快的诡计为下面的事实揭露出来：先须声明，以我作医生的身分，我可以说我从不计较我的报酬，只关心病人的利益——这是不消说的了。我去看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我们曾经度过许多困苦的日夜。我高兴地见到她有了进步，于是我对她描摹在阿巴西亚小住的乐趣，结尾说：‘假如，依我的希望，你不会很快地离开你的病床。’这句话显然来自一种无意识的自私的动机，那便是希望继续诊治这个有钱的病人，这一种愿望在我清醒的意识中一点也觉不出，并且我会加以愤怒地否认的。”

借助对于这种错误的注意，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和别人的行为后面的无意识倾向形成一种观念。在大多数日

常错误中，都可以寻出一种意义，虽然有一些也许是由于生理的原因。弗洛伊德并不否认这一点，不过他坚持，在那些遗忘的例子中似乎没有照这样解释的可能。

例如，忘记写一封信，既经提醒写这信的需要，又忘记去付邮，似乎可以表明这种遗忘是出于无意识的主使。

弗洛伊德举了一个连续忘记的例。宙恩斯医生有好几天忘记寄一封信。当他去寄的时候，又忘记了写通信处，由于无法投递从邮局退回了。既经写好通信处，又拿去邮局，他发觉又忘记了贴邮票。

弗洛伊德更举出以下一个有趣的错误：

“我们国会的主席有一次致开会词道：‘先生们，我宣布本会已足法定人数，因此宣布闭会。……’这错误的意义和动机是他想要闭会。……他不希望从会议中得到良好的结果，所以心愿能够即刻散会。……又如当一个女人恭维别人的时候，说道，‘我相信这帽子是你碰起来 (Aufgepatzt) 的’，她本来要说‘拼起来 (Aufgeputzt) 的’；没有什么科学的理由可以阻止我们在她的错误中发见这种思想：这帽子是一个外行的作品。当一个以专断著称的女人说，‘我的丈夫问医生应当用什么饮食；但那医生说，他不需要特殊的饮食，他可以吃喝我所选定的任何什么’，这错误显然象是一个一贯的计划之正确的表示。”^①

^① 《引论》第27页。

作为最后一个例，我可以举一个在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周刊中出现的印刷上的错误。这是不用注解的。“首相在丹狄举行的统一党的示威中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对于工党的一些批评是不值得注意（worth nothing）的”（原文是值得注意的——worth noting）。①

这种心理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有什么意义呢？我要在后面一章中对这问题详作解答。不过我们即刻可以看出，由它们表明，人不仅反应外部现实的要求，也反应他自己内在的本能的生活。它们也表明，人是怎样容易地逃出严酷的现实世界，而躲入由他的愿望作主的幻想世界。在另一方面，他怎样把自己的无意识的冲动投向外界以否认它们。列宁不能容忍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宁可关心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人类材料，而不肯留意那实在的远更复杂的人类本体。列宁说，“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材，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材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事情，不过，任何其他解决这种任务的办法都是极不认真的，简直不值一提。”②

借助对于精神活动的性质之无畏的科学研究，弗洛伊德对于人类本来面目的知识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贡献。假如马克思主义者愿使工人把握现实，教他用自己的力量来改

① 《新领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

②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06页。

变它，他必须反对使工人逃避现实的那些心理的倾向。不过，假如他不了解那些倾向的性质，他便将在黑暗中作战了。

第五章 性的发展

自我有修正本能的冲动以适合现实的要求之困难任务。依这意义来讲，意识的行为乃是本能的冲动与加以限制和禁锢的外界现实之间的交互作用的产物。

这时我不要考察形成人类环境的现实性质，而要撮述精神分析学所供给的本能生活的一般原理。所以，假如这叙述太注重本能冲动所起作用的部分，这也是必然的，那末到我们考察本能的冲动所在以表现的环境时，我们将不要小估它的重要。

关于本能的定义是纷歧的。概括地说，本能是与个人和种族之存续有关的根本的固有冲动。弗洛伊德说，“我们可以把一种本能形容作有一个本源，一个意向和一个目的。这本源是体内一种紧张的情况，而它的目的便是除去这种紧张；在从本源至其目的的达成途中，本能在心理上变成发动的。我们把它描写成向一定方向冲出的一定数量的力。”^①

心理学家曾经尝试把本能开列出来，弗洛伊德觉得这

^① 《新论》第125页。

办法会失去本能生活的真正性质。所以他写道：“你们知道普通思想怎样处理本能。它依照大致的需要假定出若干不同的本能——判断的本能，模仿和游戏的本能，社会的本能，以及许多别的本能。普通思想宛若把这些本能取过来，让每一种作它特殊的工作，然后再把它们放下。我们从来便疑心，在这许多小的偶然的本能后面，有一种远更严肃和有力的东西存在，这是应当加以缜密地研究的。”^①

在透过许多本能的反应而直达其本源的尝试上，弗洛伊德把本能分成主要的两组——伊洛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的本能，或生命的本能，以及死的本能或破坏的本能。

我们要把这分类留待本章的后半来讨论，但目前我们却要叙述包含在伊洛斯组的性冲动，从生物学的见地来说，这种冲动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适合生殖的需要。

弗洛伊德关于性本能的见解刚发表时便引起剧烈的反对。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认定，无意识中被压制的材料，在性质上，大部分是幼稚的，性欲的，与意识的标准不调和的，他的这一主张刚好侵犯了那些标准，并引起维护那些标准的形形色色的责难。

弗洛伊德所谓性是指“一切与‘爱’字有关的那些本能的力。一方面是自我爱，另一方面是父母爱，子女爱，和一般的人类爱，以及对于具体对象和抽象观念的忠诚。”

他加给这个词的意义较之普通的用法是大大的扩展

^① 《新论》第124页。

了，普通的用法把它限制在导向性行为的成年人的关系，至如弗洛伊德所描写的别种现象，则归之于另外一种本能的活动。例如麦克道尔博士(Dr. McDougal)，便把双亲对于子女的爱归于“仁慈的本能”的作用。

弗洛伊德更加冒犯了传统的信仰，因为他指出儿童从最早的年岁便有一种性的生活。他所指的是：对于异性双亲的占有欲，被爱抚的愿望，被抱持时的幸福表情，拇指之惬意的吮吸，被放下时的怒哭，儿童在身体受到抓搔时所表示的快乐，以及他们对于他们的性器官所表示的兴趣，这些都是早期性生活的证据。

在早期性生活中，所谓部分性本能(component sexual instinct)占主要地位。它们彼此间多少是独立的，各自具有寻求满足的态度。在性发展的过程中，它们都是完整的，但有时一种部分本能会控制成年人的性生活，强迫他寻求儿童性质的性满足。所以弗洛伊德把性的错乱症看作幼稚的性行为在成年生活中的持续。

在弗洛伊德所著的《对于性原理的三种贡献》中，他对于部分本能作了一个报告，以下便是最重要的部分本能中的两种：

(一) 口部的部分本能。口和相连的部分形成所谓口部恋爱区的性兴奋地带。与这地带相关的部分本能由口部寻求满足，它们便因此得名。儿童以吮他的拇指，咬，吞等动作寻求快乐。

当这种部分本能在成人生活中占控制地位的时候，各

种形式的以吮和咬来获得性满足的错乱症便存在了。在接吻和其他各种与口部相关的亲昵行为方面，这种本能也在常态性生活中起着一部分作用，不过仅附属于性行为的最后目的。它只有在独立地寻求满足时才是一种错乱症。从吸烟和咀嚼方面我们得到比较轻微的错乱症的例子。

(二) 肛门的部分本能。肛门附近地带或肛门恋爱地带的刺激乃是另一组部分本能寻求满足的方式。这种部分本能是与排粪行为相连的，它们发展的方式与将来性格的构成大有关系。儿童知道他的双亲称许这种功用的完尽，并且在他那随意收放的能力上生出一种权力的意识。儿童的粪便是他所有的第一种给世界的东西，他后来对待金钱、他人、工作、艺术和一般生活的态度大受他在婴儿时期对于排粪的过程和粪便本身所取的态度影响。这说法也许显得非常牵强，但应当记住，两岁的婴儿实际有一全年为双亲用来训练排粪的控制。儿童受到训诫、称赞和恐吓，所以他对于排粪功用的早期反应在他后来的性格构成上必然有一种重要的影响。他学习用忍大便来对他的母亲表示轻蔑，也学着由这种延迟增加后来的快乐。在后来的生活中，这种忍便的倾向对于积钱、固执和吝啬的形成会成为一个主观的因素，同时把完尽排粪作用的意愿作为对于双亲表示爱情的方法，并且因为由这种行为所得到的官觉的快乐，这种意愿会转变为慷慨、奢侈，或如写作、绘画和演说等生产活动的形式。如本章开头所说，我们这儿所叙述的是影响意识行为的主观冲动。不同的外界环境将更影响这些冲动表

现它们自己的方式。它们的能力会沿着不直接与它们的性目的有关的途径被代替或被升华，这种代替作用和升华作用的发生情形，我们已在前一章中交代过。

这些以及别的一部分本能，在常态的成年人中，在与生殖器相关的冲动之控制下，起着结合的作用。正常的成年人也常显示由部分本能发出的冲动，不过这些冲动只辅助性行为的目的是。要达到这一阶段，性冲动须经历一种发展的过程，我们现在便要加以研究。

在性的发展中两个主要的时期，由一个潜伏期在中间分开来。在这个潜伏期中，各种本能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第一个时期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安置下后来性冲动恢复时沿以进行的路线。这一个时期是从婴儿期到五岁，并有三个主要的阶段。在每一阶段中有一个部分本能成为其重要的部分。

第一阶段是所谓自恋期。这阶段发现在儿童降生后最早的几个星期，当时儿童还没有把自己当作单个人的意识。不同的部分本能多少独立地寻求它们的满足，儿童的性生活限于由刺激身体得来的感觉上的快乐。因为吮吸在这一阶段上的重要，口部的部分本能是最显著的了。将近两岁时，儿童的自我意识生长了。性本能开始向着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爱的对象。为了这缘故，弗洛伊德称这一阶段为拿西斯期（或自身恋爱期）。拿西梭斯（Narcissus）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恋爱他自己的影子。

由自恋期向这第二阶段的过渡，大致由于母亲的力量，

她们先前宽容儿童无力控制便溺，这时便坚持应教儿童以清洁了。这阶段给儿童一种权力的意识，用残暴和喧闹的行为和裸体奔走以炫示身体的嗜好表示出来。

发展中最危险的时期是第三阶段，我们要加以详细的说明。

儿童向外界寻求他的爱的对象，不可避免地，他用以满足其性冲动的首先的对象是与他最接近的那些——他自己家庭中的份子。于是引起了伊谛普斯错综 (Oedipus complex)，这名称导源于索甫克利支 (Sophocles) 的戏剧，在那个剧本中，伊谛普斯不自觉地杀死他自己的父亲并娶了他的母亲，从而应验了一种预言。儿童的性要求要由异性双亲来满足，于是对于同性双亲便怀着反对和死的愿望。这种错综对于精神分析学是非常重要的，我要比较详细地引证两个著名精神分析学者的话以期免除误会。

宙恩斯医生说：“儿童不仅向外界寻求其爱情的对象，也寻求其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性的幻想的对象。不可避免地，他首先接触的是那些与他最接近的人——他自己家庭中的份子。不过，当对于同辈人的幻想开始移向长辈时——主要的是父亲和母亲，困难便发生了。这样便形成著名的伊谛普斯错综，那便是说，在儿童方面对于异性双亲有一种性的态度，对于同性双亲有一种敌视的态度；但与这情形相反的颠倒的伊谛普斯错综也是常见的。弗洛伊德把这种错综当作全部无意识的中心，儿童将来的性格和气质，以及任何时发生的任何神经病，主要的由他应付这种错综的态度来

决定。这乃是全部精神分析学中最特出最重要的发见，全部个人的抵制力以及外界对于精神分析学的批评都集中在这上面。若说不拘这种抵制取什么形式，不拘精神分析学的哪一方面受批评，最后责任的乃是这伊谛普斯错综，这说法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所有精神分析学的其他结论都环绕着这种错综，精神分析学的成功或失败都由这发见来决定。”^①

弗洛伊德在他的《引论》中说道：

“女儿偏向父亲，或儿子偏向母亲，这种早期的清楚的迹象，大概可以在大多数人中寻得出来；但对于那些具有神经病体质的儿童，这倾向应当更为强烈，他们是早熟的并有一种爱的要求”；又说，“我们见到一种同性相拒的倾向，女儿疏远母亲，父亲疏远儿子。女儿把母亲看作限制她的意志的威权，母亲的义务便是使她遵守社会所主张的性自由之禁制；在某种情形下，母亲也是一个敌手，她反对被抛开。同样的情形在父亲和儿子中间演得更为激烈。在儿子看来，父亲是他所不甘服的社会压力的化身，他阻挠他的意志的实行，妨碍他的早期的性快乐，并且，当有家庭财产时，他更干涉他对于财产的享用。父亲与女儿或母亲与儿子的关系便没有那么多不幸；母亲与儿子的关系算是不变的慈爱之最纯洁的例子，不为任何自私的意念所扰害。……所以，假如大多数人作意欲除去同性双亲的梦，那是一点也不足

^① 《精神分析学——引言》(Benn)。

奇的。……那种敌意很少是单独存在的——它时常屈服于终于抑制它的那更深厚的爱情，它必须停止下来等待在一个梦中表现，到那时它便好象是独立的了。……这种杀人的愿望虽然在实生活中没有存在的余地，成年人永不会承认在他清醒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愿望，但我们也能发见。理由是：最深邃最平常的疏远的动机，特别是存在于同性的双亲与儿童中间的，总表现在儿童最早的年岁。

“我所指的是那以性的成分为主的感情的敌对。男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已经对于他的母亲开始发展一种特殊的爱情，把她看作他自己的私产，把父亲看作与他争夺这份私产的敌人；小女儿同样把她的母亲看作妨害她与她的父亲恋爱关系的人，并占据了她们自以为应占的地位。”

当然应当记住，这种要求都是无意识的。在意识中，伊谛普斯错综表现作各种形式的亲昵和爱抚的愿望，以及当同性的父亲或母亲不在时的快乐表情。

为了儿童将来对家庭以及对社会的适应，与伊谛普斯错综有关的儿童对双亲的感情之压制是必要的。在我们研究人类家庭的发展时，我们便知道，这种倾向的压制，特别是那些敌视父亲的倾向的压制，对于大而安定的社会集团之形成是必要的。儿童为要补偿在双亲方面的爱的对象的损失，便把他的自我的一部分视为与双亲一体的，于是形成了超自我。这种过程前边已经叙述过，但伊谛普斯错综在它的形成上所演的脚色需要加以注重。弗洛伊德描写这过程如下：“当伊谛普斯错综衰退的时候，儿童必须放弃过去

对于双亲的恋著,为要补偿这种损失,早经存在的与父母的
同体观(identification)便大大地加强。”强迫破坏伊谛普
斯错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于阉割的恐惧。由是引起一种
阉割错综(castration complex)。关于它发端时的形状,
弗洛伊德有如下的描写:

“对于一个开始玩弄他的生殖器而尚不知道他应当隐
藏这种行为的小男孩,他的父母或保姆总要用割掉他的生
殖器或那加以玩弄的手来恐吓。父母在被问到的时候,时
常承认这事实……对于这一种恐吓,许多人有一种清楚的
意识的记忆。……假如母亲或别的女人施行恐吓,她常把这
事的执行委之于别人,指说父亲或医生将从事这行为。……
不过,若说这种阉割的恐吓是由分析神经病时加进去的却
很少可能。据我们所了解的,儿童依据由暗示和讽示得来
的禁止自恋的知识构成这样一种恐吓。……这种幻想的必
要和造成这种幻想的材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相信这
种原始的幻想是一种系统史的所有物(phylogenetic pos-
session)。我觉得,在人类家庭的史前期,阉割的本身很可
能是一种事实。至于小女孩,我们知道,她们觉得自己大受
妨害……因此便生出作男人的愿望,这愿望在后来的神经
病中再度出现。……对于大多数女人,因了特殊的女性功
能,直接由于生小孩,间接由于养小孩,料理家务,或一种类
似的活动,才多多少少地把这种阉割的意识消失掉。照这样
子她变得与男人平等并且得到辩解。”

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出阉割错综对于两性的作用是不同

的，弗洛伊德以这一点为十分重要。在男孩子方面，阉割错综是为伊谛普斯错综的解体开路的，至于女孩子，则情形几乎相反。在她这方面，阉割错综却先于伊谛普斯错综的形成。理由是这样：女孩子同男孩子一样把母亲当作首先的爱对象，因为母亲照顾她的身体的需要，奶养她，等等。但当一旦觉悟她与男孩子是不同的，因为她缺少一个男性生殖器，她觉得自己处在不利的地位，于是开始为了缺少男性生殖器而责备她的母亲。她终于对她的母亲发展出反对的感情，而以伊谛普斯错综为归宿。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说道：“女孩子无限期地留在伊谛普斯的境界；她只有在晚年才放弃它，但也并非完全地放弃。在这种境况下，超自我的形成一定感觉困难；它不能得到给它以文化的重要性的力量和独立，假如有人指出这种因素如何地影响一般女性品格的发展，女性主义者是要不高兴的。”

我们已经按次探求过性的发展，从最早的最重要的性发展时期，到儿童在外界寻求其爱的对象的阶段。从五岁到十二岁有一个潜伏期，特征是粗糙的性的兴趣之失去和适应环境的自我之发展，这时自我开始与爱德分离而成为一种限制和管辖的力量，使从爱德来的冲动适合现实的要求。

在性重要的第二个时期——从十二岁到十八岁——幼年的冲动复活了，性生活的新流沿着早期发展的途径进行。所以，假如不知道首期的决定性质，要医治这时期的变态症是极端困难的。

性本能的正常的发展可以因以下几种理由而中止。一

种部分冲动会越过其他的部分冲动,于是变得过于强烈,阻挠了向前的发展。在一个阶段上的失望会造成一种退却,所谓回归(regression),回到较早的较满意的阶段。一个失望的爱人会回到他幼年的母爱,或纵情于自恋的行为(那就是手淫)。用来形容性发展在一个特殊阶段之停顿的名词便是执着(fixation)。

双亲和儿童间的执着,在将来爱的对象之选择上,按照它的力量,起着决定的作用。

在过去执着不甚强烈的情形下,成年人有选择一个与父亲(或母亲)相似的人作丈夫(或妻)的倾向——那就是说,把两者视为一体。在过去执着十分强烈的情形下,这倾向便相反,因为与类似所爱的双亲的人性交的冥想,引起了与乱伦关系相联的憎恶。

强烈的执着会在丈夫或妻方面造成性的枯萎,因为一方面既被看作与异性双亲一体的,性交的思想便引起社会标准所加于乱伦的憎恶。

同样地,乱伦的惧怕会使一个人难于同任何异性发生性的关系,于是他在他同性中寻找性的对象。这种关系会取同性恋的意识的形态,或被升华作与别的同性者的坚固的友谊。

有一种同性恋,仿佛在女人中间比在男人中间更为普遍,大概是社会加于她们的性的限制更为严厉的缘故。女人们喜欢彼此接吻和抚摩,探视彼此的卧室,查看彼此的衣服,等等。

下面两个例子，取自布利尔(Brill)的《精神分析学：其理论和实施》，表明与同性双亲视同一体的影响。

一个二十四岁的高尚的少妇患了精神的性萎症，但她任何时候看见一个跛足的人便感到性的兴奋。这是因为她把自己与她的母亲视为一体，她的母亲当这女儿三四岁大的时候曾同一个男人有过一种非法的恋爱。这人跌断了一条腿，于是这位母亲借此去看了他几次。她带了她的女儿同去，用以免除议论，虽然那时对于这孩子没有留下意识的印象，她却在跛足和性中间造成一种无意识的联想。

另一个例子，一个年轻的结了婚的女人显出一种强烈的娼妓错综(prostitution complex)。当她与丈夫同居的时候，她同别的男人们结了许多私通的关系。她是一个独生女，不大见到她的父亲，因为她的父亲常因事务出外。她尽可能地回忆，她记起她见过她的母亲同别的男人们私通。她自己嫁了一个与她的父亲同一类型并从事同样职业的男人。她把自己与她的母亲完全视为一体。

由这一类的同体观作用决定的爱的对象名为“依赖的”(anaclitic)，因为它们常对父亲的保护或母亲的养育表示依赖。

另有一种以自我恋爱著称的爱的对象，依存于下列的同体观作用：

- (一)与现在的自己视为一体。
- (二)与过去的自己视为一体。
- (三)与自己的一部分视为一体。

(四)与自己所愿作的人视为一体。

在第一种情形下,人只寻求那些在某一方面(或在身体方面,或在心理方面)与自己相似的人作爱的对象。因此一个高的男人只注目高的女人。

在第二种情形下,人的性本能已经执着在一个过去的生活阶段上,也许那时这人是可爱和漂亮的,于是便有从保有那种形态的人们中选取一个爱的对象的倾向。年龄悬殊的结婚大致由于配偶中有一方具有这种倾向。第三类代表父母把儿童当作他们自己的一部分的爱;第四类是与超自我相连的基力或能力的移置作用,借助寻求这人所愿作的人为爱的对象,以补偿超自我所引起的不足之感,所谓这人所愿作的人,便是具有这人所感到欠缺的品质的人。爱的对象被理想化并被认为可崇拜的。

弗洛伊德的性发展的学说于是形成一个合于逻辑的完整体系。从初生到春情发动期,我们可以看出各种发展的倾向,并看出性本能各种可能的表现方式。儿童表现出一切错乱症的一切幼芽,有无实际的发展,大部分由他的性生活所在以发展的境遇来定。经过这一发展的阶段,部分的本能结合了起来,并且,在生殖器的支配下,转向外界寻求爱的对象,一个危险时期便随着来了。伊谛普斯错综发生作用,有时也对同性的双亲作爱的追求,加异性的双亲以反对。阉割错综成为这种敌对的中心。伊谛普斯错综并非时常如此简单地表现它自己。精神分析术常揭露一种爱与恨的两歧态度。父亲作为母爱的敌手是可恨的,但作为保护人

又是可爱的。将来的爱的对象大部分由处理这些中心的错综的态度来定，并且，在实际上一个人的全部精神生活都与他的伊谛普斯错综连系在一起。性本能的无数错乱症都是幼稚性的，并且起因于性本能的发展中的某一种执着。这些错乱症也是儿童有性生活的证据，因为它们含有儿童中间习见的行为，虽然并非一般地认为它们是性的。

对于以上性发展的叙述非难最多之处，都是依据道德的和宗教的见地而来的。特别困难的是人们对于伊谛普斯错综的承认。这一点仿佛侵犯了人类所有的一切自尊心。但我们已经习惯于承认人是由下级的种原经过若干万年的进化过程高度发展起来的产物。同样，有一天，我们也将习惯于承认伊谛普斯错综作为成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并且，当我们既经承认，我们将发见一种方法，它能借助社会的和教育的力量，遵照社会的最大利益，给予那些粗糙的幼稚的要求一种指导。

我们现在从性冲动的发展之考察，转向弗洛伊德对于本能所作的重要分类。

弗洛伊德首先把本能分作主要的两组：上面所说的保持种族的性本能，和与保持个人有关的自我本能。这样的两组在作用上仿佛是各不相关的，不能并入一个共同的源头。它们是互相冲突的，自我冲动执行一种压制作用，而性本能乃是被压制的材料。

这一种分类后来为另一种所代替，新的分类是：生的本

能(有时称为伊罗斯的)和破坏的(或死的)本能。弗洛伊德建立这样两组的假设,是由他虐狂和自虐狂的研究引起的。他虐狂的意思是从加给性的对象以痛苦而得到性的满足,自虐狂则是借助受痛苦以得到性的满足。这样的两种倾向在两种本能——性的和破坏的——之结合的假设上仿佛最易解释。弗洛伊德现在相信一切本能的冲动都是这两种本能不同比例的融合。

自虐狂(假如我们抽出其性的部分)证明一种自我破坏倾向的存在。因为全部本能原先都包括在人格以内,后来才对外界对象发生兴趣,所以自虐狂、自我破坏的冲动,比起他虐狂来应当是较早的、较根本的。在他虐狂的情形下,这种破坏的冲动不再内向自己,而转向外方。这种冲动于是变成侵略。一旦这侵略在外界遇到它不能克服的障碍,它便再度转向内方。为要免除这一点,就必得在外界寻求它可以破坏的对象。“我们必须毁掉别的东西和人们,免得毁掉我们自己,使我们可以避免那种自我破坏的倾向。”^①

我们不能不佩服弗洛伊德宣布这种最不得人心的学说的勇气。顺便提一句,我们也许可以在弗洛伊德对于我们最珍视的幻想加以如此无情的摆布上,寻出他向外转移他的自虐狂的冲动的方法。举例说,我们可以在他对于他的性生活的学说的辩护上寻出这种侵略性质来。他说:“于是精神分析学给这些爱的本能以性本能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本源

① 《新论》第137页。

如此。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把这个术语看作一种侮辱，于是把‘泛性主义’(pan-sexualism)这个坏名词加给精神分析学，作为他们的报复。凡把性看作伤损和侮辱人类天性的东西的人们都可以随使用那比较高雅的说法，‘伊罗斯的’和‘爱情的’。我自己从一开始也可以这样办，便可免去许多对我的攻击。但我不肯，因为我不愿对怯懦让步。”^①他不肯对同时代的人们的“脆弱”感情让步，当然是对的，不过他那不顾惜那种感情之冷酷却仿佛指明潜伏着的感情因素。这因素究竟如何，有待于精神分析来揭露，显然现时“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意见对于他有一种感情的意义。这是是否表示对于他的童年的威权（那时他的双亲和教师们借口识多见广来阻挠他的愿望）的一种反抗呢，这乃是一个推测中的问题。无论如何，它在弗洛伊德内部组成一种反抗的原动力，我相信这种原动力只有在革命斗争的途径上才能得到适当的满足。

他在给爱因斯坦的信^②中，提出这意见：“战争是破坏冲动向外界的转移”，并在其中寻见一种“生物学的根据”。他写道，“我们只能承认它们〔战争的倾向〕较之我们反对它们的主张实际上更接近于自然，事实上我们的反对的主张尚待加以解说。”伦敦精神分析学院科学研究指导员葛劳佛博士(Dr. Glover)最近发表了一种著作，把战争与和平运动看作相关的。他主张，“一大部分推动和平组织的力量实

① 《群众心理》第39页(Hogarth Press)。

② 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合著《为什么战争?》(Allen & Unwin)。

际是与推动战争的力量同源的”，所以和平主义者的政策是不固定的，因为“在紧张的情况下”它们便现身为侵略的冲动。^①

在后面一章中，我们将比较详细地再来讨论战争问题。在这儿我可以说，当考虑精神分析学者必须说的道理时，我们不应当为道德的矛盾感情所迷惑。假如精神分析学者所指出的精神的冲动确乎存在，那末他便有揭露它们的应得的劳绩。总之，人类的历史中充满了宗教的迫害、刑罚和残忍，所以容易使人相信他虐狂与自虐狂这两种冲动的存在。

弗洛伊德相信自我破坏的本能是与企图恢复早期状况的一切本能的倾向相结合的。在一种状况颠覆的时候，便有一种本能想使这机体恢复原状。这种过程，他称之为反复强制 (repetition-compulsion)，本能中一种保守的性质。

我们现在知道弗洛伊德为什么把本能分为生与死的两组，因为死的本能总要回到早期存在的形式，一种无生气的状况，而爱的本能，与那种倾向相反，却要把这机体保存和建设起来。

这些概念引起许多精神分析学还不能解答的问题。弗洛伊德提出这样一个似非而是的性质的问题：“是否一切本能没有例外的都不具有一种保守的性质，是否当爱的本能趋向生存实体的综合而归于较大整体的时候，这种本能也

^① 《战争，淫虐狂与和平主义》(Allen & Unwin)。

并不要恢复早期的状况。”^①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问题格外感觉兴趣，他们相信生命的现象包括矛盾的过程，所以不难了解生的本能所具的建设过程同时是一种早期状况的恢复，虽然是在一个不同的平面上。关于这一点，我要在论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之无意识的辩证法的性质那一章加以重述。

关于隐在意识和日常行为后面的（如精神分析学所说）本能的力，我们的考察算告一段落。在许多人看来，弗洛伊德的学说也许似乎近于幻想。我只能这样说，从唯理的观点来看，这学说所要加以解释的许多人类行为也显得是幻想的。有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刊物不断地在慨叹现代一般的疯狂状况。为要加重说明这种状况的不合理，该刊物的负责人偶尔借助于一个由火星来的陌生人，这个陌生人驯顺地对于他在地球上所见的愚蠢和矛盾目瞪口呆。他问道，“为什么人们替别人建筑华丽的宅邸，而自己却住在可怜于茅棚中？为什么他们情愿为那些把他们的妻儿饿死的人们炸为粉碎？为什么他们在一个富足的国家挨饿？”为什么——无尽的为什么从这位困惑的火星来宾口中发出来。

显然，在火星上，人们不会为使人陷入不合理的行为的超自我或被压制的冲动所累。不过在这儿事情便不同了，一个正确的社会主义者，不要慨叹工人们的不合理，应当谨

^① 《新论》第139页。

记已经引用过的列宁的话，要以人类实际存在的用语来看社会主义的问题。

忽视弗洛伊德关于人类行为之无意识的本源的发现，便表明对于“我们的想象所创造的幻想的人类材料”的偏好。认真的社会主义者要尽可能地知道有关于决定这么大部分的人类行为的无意识过程的一切；因为他希望用以制造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人类材料，需要他加以充分的最同情的了解。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地把弗洛伊德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性的学说，当作幻想的东西来加以排斥。这学说表明了按照一个特定的方向指导工人们思想和感情的任何企图所具有的困难和复杂性，即使这方向对于工人们也许是唯一无二地既自然又合理的。

第二卷 精神分析与 马克思主义

第六章 原始社会

研究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最好以原始社会的研究为分界点，因为两者在这一点上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关于原始人类团体的性质，弗洛伊德采取了达尔文的一种意见，作为他的原始游牧部落的理论的基础。达尔文曾经推测，人类“最初度小团体的生活，每一个男人有一个妻，假如他有势力，也可以有几个妻，对于这一个或几个妻，他满怀妒嫉地防御一切别的男人。”^①弗洛伊德由他这推测发展出以下的理论：原始的游牧部落由一个有势力的男子统治，这人把所有的女子都归自己占有，并用阉割的恐吓来强迫青年男子限制他们的性要求。由这学说，弗洛伊德得以解释原始社会防止杂交的精密的禁忌制度，以及图腾制度的起源。在《图腾与禁忌》这一部很有兴味的书中，弗洛伊德研究那尊崇一种动物或植物作祖先的图腾制度与禁律的关

^① 《人类的起源》第二卷第 603 页。

系，他认定这种禁律是自课于杂交之愿望上的限制的反映，原始人类以这种限制表示对于原始父亲的记忆之尊敬。

关于图腾，弗莱泽(J. G. Frazer)曾作如下的界说：一个图腾是“一类有形的东西，一个野蛮人对之作迷信的崇拜，相信在他和这一类东西的每一份子中间有一种亲密而全然特殊的关系。一个人与他的图腾间的连系是交互有利的。图腾保护那个人，那个人以各种方法表示对图腾的尊敬，假如这图腾是一种动物，他便不杀害它，假如是一种植物，他便不采伐它。图腾是与偶像不同的，图腾永远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总是一类东西，平常是一类动物或一类植物，比较少见的是一类无生气的天然物体，最少见的是一类人造的物体。”^① 一个图腾团体的份子都以他们的图腾为姓，相信他们是由它遗传下来的。在一个部落中可以有几个图腾团体，并有一种彼此联婚的制度存在，按照这种制度，同一图腾中的份子不得结婚或有性的关系。这乃是图腾制度的一种基本法律。一个图腾中的份子必须到他们自己的图腾团体以外去结婚，如有违犯，便得受全部落严厉的处罚。违反了吃或杀图腾动物或植物的禁律也要受严厉的处罚，不过这种处罚是自动的施行。例如一个人无意中吃了一种图腾动物便要患病或死亡。加于违犯结婚禁律者的处罚之严厉，弗洛伊德引证有下面的例子：“在新南威尔斯的达达提部落中，在这样希有的事件中，男人被杀掉，女人则挨打或

^① 《图腾制与外婚制》(Hogarth Press)。

被枪刺，或并受两样刑罚，直到她将死时为止；据说所以不杀掉她，因为她大致是被迫出此的。即使偶然的私通，也要受到氏族禁忌的极端憎恶并处以死刑。”^①

反对杀和吃图腾的禁律按期在所谓图腾宴中开放。每个人都来参加并吃一块神兽的肉，于是在每个人和图腾中间建立起一种关系。然后大大地号哭一场，以哀悼这图腾兽，随着是一个不顾一切图腾禁忌的节期。一切被禁制的愿望都得到解放。“假日精神”的原始形式流行开来，一切过度的行为都受到宽容。弗洛伊德以为这对于现代的假日的性质给了一种透视，因为这日子仿佛公认作可以抛开日常生活的限制，并可以有他时要严受责备的放纵行为。

这里有三种主要的性质，弗洛伊德要用他的原始游牧部落说来加以说明。第一，一个图腾的份子把自己看作从一个共同的祖先遗传下来的；第二，在一个图腾内性的关系是严加禁止的；第三，定期的图腾宴准许这些禁例的开放，并伴以哀乐两种矛盾的情况。他的解释如下：“精神分析学已经证明，图腾兽实际上是父亲的代替物，这样便足以说明这种矛盾：平时禁止宰杀图腾兽，图腾兽的宰杀成为一个假日，兽是杀掉了但加以哀悼。这种两歧的感情态度——在现代的儿童中出现为父亲的错综，并且继续存留以入于成人生活中——也推及于作为父亲的代替物的图腾兽。假如我们把精神分析学对于图腾的解释与图腾宴以及达尔文关于

^① 《图腾与禁忌》第7页(Kegan Paul)。

原始人类社会状况的理论连系起来，便可以得到更深一层的了解，并提供一种假设，虽然象是牵强，却能在一些一向不相连属的现象中间建立一种意想不到的统一。……依据图腾的庆祝，我们可以作如下的解答：有一天被逐出的兄弟们联合起来，把父亲杀死并吃掉，于是结束了父亲的部落。他们联合起来才敢于并能够成就他们单个所不能作的事。或许某一种文化上的进步，如一种新武器的使用，给了他们那种优越之感，这些食人的野人当然要吃掉他们的战败者的。这个强暴的原始的父亲必然是各个兄弟们畏嫉的典型。他们现在用吃掉他的办法完成他们的同体观，于是每一个得到他的力量的一部分。这种图腾宴（大概是人类最早的庆祝）是这种可纪念的犯罪行为的重演和褒扬，许多事情——社会组织，道德禁律和宗教——都随这种犯罪行为开始。”^①但当他们杀掉他们的父亲以后，除去他们性的满足上的障碍，他们对于他的两歧态度便抬头了。他们也曾爱过他，称赞过他，于是这种感情与因为他死而得到的仇恨心的满足同时当令。“这心情以悔恨的形态出现，一种罪恶的意识形成了，这种罪恶的意识在这儿是与一般人感觉到的悔恨相同的。死者现在比生时更强大了，以至如我们今日在人们的命运中所见的那么强大。父亲在时所禁止的，他们现在也加以禁止。……他们宣布禁止杀害父亲的代替物以抵消他们的行为，又拒不享有解放了的女人以否认他们这

① 《图腾与禁忌》第235—236页。

行为的结果。”^①

但据弗洛伊德说杂交的堤防之建立并非容易，因为各个兄弟是彼此敌对的，大概有一个时期杂交关系出现了，充分地利用从父亲处取得的自由。于是我们达到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阐明的意见相衔接的一点。一个图腾中所有的女人在性的意义上属于另一图腾中的男人，恩格斯称之为群婚制(group marriage)，弗洛伊德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对于这名词加以赞许地引用。摩尔根在易洛魁的印第安人中间度过大半生，并加入他们一个名叫塞讷卡的部落。他那题名《古代社会》的主要著作，研究人类社会由野蛮期经过半开化期到文明期的发展。他在印第安人中间的研究，以及世界各处材料之研究的结果证明：许多人类学家所有外婚制(exogamy)的概念乃是建立在错误的了解上的。外婚制是指一个部落的份子被迫向本部落以外去寻求配偶的一种婚姻形式，而在本部落以内娶妻的便是所谓内婚制(endogamy)。大家相信有两种极端不同的婚姻关系存在，外婚制和内婚制，由这种制度的施行分别不同的部落。但摩尔根指明，外婚制和内婚制的部落的前提事实上并不存在，在野蛮社会中，每一部落分成若干团体或“氏族”。一定氏族的男人要在部落以内本族以外选择他们的妻。所以就全体部落来说是内婚的，就氏族来说是外婚的。这些氏族在禁止族内结婚这一点上显然是与我

^① 《图腾与禁忌》第238页。

们已经讨论过的图腾团体相合的。

在这种婚姻关系的最早的形式中，一个团体的男人对于另一团体的女人操有性交的权利。那就是说，这一团体中的个人对于相当团体的任何女人都可以有性的关系，并不限于一个女人。这样便形成了“群婚制”。这种婚姻下的小孩称凡有权与他们的母亲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为“父亲”，称他们的母亲团体中所有的女人为“母亲”。同时，他们彼此称为兄弟姊妹。不过这种办法，对于性生活还有多少限制，据恩格斯说，这并不是性关系的最早的形式。他说：“我们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的复杂情况，以致必然使我们追溯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交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结蒂使我们追溯到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交关系的时期”。由这些条件指明一种性关系更早的形式，终于指明与从兽到人的过渡时期相当的无限制的性关系时期。^①他问道：“所谓杂乱的性交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例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②

后来在群婚制中造成的限制是什么呢？显然这便是禁止在团体内婚配的杂交的堤防。假如弗洛伊德关于图腾制和外婚制之起源的理论——这些都是由原始父亲的杀害而起的——是对的，我们便可以想象，在杀父和遵守杂交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30页。

② 同上。

禁忌之间必有一个时期，在那时期，胜利的儿子们一定无限制地放纵他们的性欲。如弗洛伊德所说，进行这种限制不是没有一定困难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恩格斯的“无限制的性关系”的时期说与弗洛伊德关于原始父亲之杀害的主张关连起来。

不过，关于形成防止男性争竞的大社会团体之必须的条件，恩格斯和弗洛伊德的意见之相同，大概是更可令人注意的。弗洛伊德说：“虽然兄弟们为要战胜父亲而联合了起来，在女人问题上却是互相敌对的，每一个都要象父亲那样占有所有的女人，于是在互相敌对的战争中，这新组织便要消灭了。……所以他们若要共同生活下去，这兄弟们就必得实施杂交的禁止——也许要在许多困苦经验之后——由是他们同等地拒绝了他们所喜欢的女人们。”^①

因为弗洛伊德生得较后，他可以依据较充分的人类学研究来建立他的学说，恩格斯则只能作推测的暗示，虽然如此，恩格斯也已赫然地预言，弗洛伊德的压制说是安定社会生活的一个条件。所以他说：“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妒嫉的消除，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他往下说明，那种群婚制（我们已经明了这是外婚制首先的形式）显著的特征便是不再有妒嫉，因为它使得性要求可以从一个适当的团体中的任何女人得到满足。“我们发现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

^① 《图腾与禁忌》第 238—239 页。

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个一群男子与整个一群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嫉妒余地的婚姻形式”。^①

因此我们很容易地把恩格斯和弗洛伊德的意见联系起来。恩格斯所说的“杂乱的性交关系”期是与杀死原始父亲以后的时期平行的，在那个时期无限制的性冲动的满足才成为可能的。恩格斯既然说，“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是安定社会的必需的条件，弗洛伊德也说，兄弟们要共同生活下去，必须建立杂交的堤防。最后，群婚是与最早的图腾团体相当的，相互的敌对和妒嫉在其中受到压制，性的要求要到图腾团体或氏族以外去满足。

我们回到原始父亲的学说吧。

这学说的主要好处是它能综合许多矛盾的材料。弗洛伊德鉴于它的臆测性质，遂在一个脚注中说道：“因为我惯被误解，所以说得明白一点大概不算多余，我作这些演绎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忘记造成这意见的条件之复杂性；唯一足称的是，对于精神分析的经验所提供的已知的或仍然未被承认的、宗教的道德的和社会的起源，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②

弗洛伊德在上面所举的书中讨论过的一种责难，我觉得已经为他自己后来的发见所克服，那发见便是他列在“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 30 页。

② 《图腾与禁忌》第 261 页。

自我”的项目下的那些心理的倾向。他把这责难陈述如下，“我们使一种行为的罪恶意识存留几千年，在一点也不能知道这种行为的世代中依然发生作用。我们允许那在受父亲虐待的若干儿子世代中发生的感情过程，到已经把父亲除掉而免去那种虐待的新世代中依然继续下去。”^①弗洛伊德仿佛承认“这种罪恶意识”有遗传的可能，因为他说：“这任务的一部分大概是由精神性质的遗传来完成，不过这种遗传需要在个人生活中有一定的诱因才能发生作用。”他的意思是说，个人的父子关系供给这种诱因，引起与杀掉原始父亲的罪恶意识相连的遗传的精神状况。不过，从著作《图腾与禁忌》的时候起，弗洛伊德已经在父子关系的见解上有了进步，所以他的超自我的概念使这问题更为清楚。超自我是建立在与父亲的同体观上的，是存在童年时代的严厉的好干涉的父亲的心中的傲慢态度。但父亲对待儿子的严厉态度大部分是由他自己的超自我主使的，这超自我是由于与他的父亲的同体观形成的。照这样子，超自我作为遗传的媒介来活动（这事实我要在后面讨论政治文化组织时一并说明），因此，借了一连串的同体观，这种杀死原始父亲的罪恶意识便要在发生这行为的许多世代以后再现了。例如，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这种违背父亲（上帝）的行为的罪恶意识占一个中心地位。这罪恶由儿子的牺牲来偿赎，于是儿子因了罪过的偿赎，遂变成了与父亲同体的上帝。在举行圣

^① 《图腾与禁忌》第 261 页。

餐时——基督徒的图腾宴——儿子的身体被吃掉，于是那些参加的人便借了儿子与父亲同体化，分有他们的圣德。

但因为超自我是“伊谛普斯错综的后裔”，它的活动仿佛与原始社会的母系性质相矛盾。恩格斯说，“只要存在着群婚，那末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际上都是这样。”这种说法仿佛不容有伊谛普斯错综的活动，因为要恨或爱一个人的父亲，那人必须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这难题一考虑引起伊谛普斯错综的一般状况便得到很好的解答。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在发展中的性冲动便是在这种状况中转向外界寻求客体的满足的。在现代社会中，家庭的一夫一妻制盛行，使得最直接有关的人们——父亲和母亲——成为组成伊谛普斯错综之一部分的爱与恨的对象。不过，实际上，类似的状况也存在于原始社会中，虽然是在群婚的情形下。因此恩格斯说：“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由此决不能说，在这种关系的日常实践中也必然是乱得毫无秩序的。短时期的成对配偶，象现在甚至在群婚制中在大多数场合也有的那样，决不是不可能的。”^①又说，“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度下，就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31页。

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他的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① 我们可以正确的断定，在那种情形下，儿童在配偶的关系中间寻出那引起与伊谛普斯错综相联的态度的亲密连系。

即使我们排除任何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相似之点，这事实依然存在，那便是幼稚的性生活经过修正，向前发展，终于转向外界去寻求满足的对象。所以，不拘在任何环境下，因为儿童必须得到喂养，照顾和爱护，由这些需要所表示的软弱会使一个儿童的性生活向着与他接近的和满足这些需要的人们发展。那些满足他的需要和限制他的要求的人们显然可以减少到代表与他有父母关系的几个成年人。即使孩子为一个团体所有男人和女人共同照顾，那不过是说，他的爱的对象不限定任何特殊的个人，而发展到这一团体罢了。

我们已经知道，弗洛伊德的见解格外注重社会组织中之性的因素。从恩格斯加于摩尔根的赞词中，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也承认社会之性的基础，他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了和恢复了我们的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②中找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41页。

② “血族团体”在董译本中原作“性组织”。——三联书店编辑部

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①

但是恩格斯虽然承认历史之性的基础，他却坚持，“在这依据性连系的组织下面，劳动生产力愈来愈发展”，所以经济的关系逐渐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性质。这说法并不妨害性的因素的重要地位，因为这些因素中的本能的力是可以接受移置作用、升华作用以及其他间接的发表形式的，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见的。这种由性的兴趣向劳动过程的转变，弗洛伊德在研究语言时加以说明，语言是以招集性的伴侣的手段开始的，后来发展为对于工作的一种有韵律的刺激。他说（引证一个语言学家的话，这人不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而达到这样的结论）：“初次的发声是交通的手段，也是招集性的伴侣的手段，在后来的发展中，语言的原素遂被用作原人从事各种工作时伴发的声音。按照这种有韵律的重复发出的声音，工作由联合的力量完成，结果遂把性的意味转移到工作上。仿佛原人就借了把工作看作性行为的对等和代替，使其工作较为适意。在共同工作时发出的字音遂有两种意义，一种有关于性的行为，另一种有关于代替性行为的劳动。等到字音与性的意义分离，它的用法遂限于工作上了。”^②因此恩格斯的见解，在承认劳动过程为被移置了的性的力开辟了一条出路这一点上，可以与弗洛伊德的见解关联起来。这时讨论一下压制作用，也许能使这一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

② 《引论》第141页。

点更为明了。

在社会史上，压制是具有根本的重要的。它是安定社会的一种必需的手段，恩格斯和弗洛伊德都承认这一点。弗洛伊德说，“我们相信，文明是在生存竞争的压迫下牺牲了原始冲动的满足而建设起来的。”^①但一种冲动的压制便引起这样一种需要：要有一种意识的行动方式，使这种冲动可以表现它自己，而不扰害社会的组织。社会愈为性的联系所主宰，性冲动之移置的或间接的表现便愈少需要，因为这种性冲动从意识的标准看来并不十分可厌。但恩格斯把劳动过程的发展与性连系的重要的消失结合起来。恩格斯说到“性连系”的时候，自然是指性生活之意识的明显的形式，并非指隐在那后面的无意识的冲动。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连系，婚姻习惯等等，都是意识的社会化的形式，使被压制的杂交愿望在其中得到多少满足。例如，群婚不过是一种意识的形式，使被压制的性冲动在其中得到表现。于是恩格斯看作最早的人类社会之形式的特征的“杂乱的性交关系”受了限制，“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建立了，群婚的性连系得到明显的意识的形式。但假如社会从性连系占优势的组织形式过渡到劳动过程占优势的组织形式，这便是从一种表现被压制的性冲动的意识的形式过渡到另一种意识的形式，在那一种形式中，被压制的冲动在劳动过程的途径找到移置的出路。所以，恩格斯的结合性连系和劳动过程，

^① 《引论》第 17 页。

是指无意识的性冲动由意识的较直接的性连系向意识的但较间接的劳动过程的活动之过渡。换一种说法，人借助他个人的性要求的压制变成了一个劳动的动物，因为含有社会合作的工作没有那种压制便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压制在安定人们在社会中的关系上成为必要的，不过关于这种压制，重要点却是，它是因了外界的压力发生的。所以傅吕格(J. C. Flugel)说，“这种压制倾向的特殊表现主要地是由环境的暗示力来决定的。”^①弗洛伊德在考虑压制的起源的时候，也以为它大致是由于冰河时代的强迫，这一时代把人类赶入更受限制的区域，使得部落内部冲突的压制成为必要的了，因为这样才可以对争夺地盘的敌对部落作更有效的斗争。因此，纯然由于经济的需要，团体内部的冲突转向别的团体了。

那末，假如外部世界在妒嫉和冲突的压制上占决定的地位，凡不研究人类环境而去考察人类行为就不会是适当的。诚然，因为精神分析学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研究，对于外部环境只加以不经意的考察，它便有作出有害的和反动的结论的可能。在考察过人类环境中的经济因素以后，我要举一个这样的例子，精神分析者不注重这些因素的严重性便可以明了了。

所以，精神分析学关于人类内部精神生活的性质的贡献固然是足以称道的，但对于推动和限制人类内部生活的

^① 《家族之精神分析的研究》第24页(Hogarth Press)。

表现的——一言以蔽之，造成压制的——外部势力的性质，却还须加以考虑。例如，精神分析学实施于个人生活上，颇足以揭露造成他的病患的特殊情境或经验。它可以把这些病患归咎于一个早期儿童时代的情境，那情境的记忆已经被压制，但依然扰害意识的生活。但据弗洛伊德说，这种个人的本能生活的压制是必要的，否则“这本能便要破坏一切范围，而辛勤建设的文化结构也将被扫荡以尽了。”^①

弗洛伊德更明显地指出这事实：压制是对于社会的和经济的需要之一种反应。他说：“社会〔限制本能生活〕的动机根本是经济的，因为它没有充分的资产维持其不作工的份子，它必得限制那些份子的数目，并把他们的能力从性的活动上引向他们的工作上——永久的亘古以来的生存斗争，因此一直继续到今天。”^②

假如人类的行为是内在的本能的冲动与经济的社会的需要之世界交互作用的产物，要了解这种交互作用，便需要研究这其中的两种因素。我们对于精神分析学说所作简短的叙述，大致说明了人类的主观生活，使人类感到求生存求向外界发展的冲动的要求和本能，以及反应着内部需要来改变外界的要求和本能。但那种内部需要同时是一种障碍它的满足的客观因素的反映。我们已经知道，弗洛伊德承认压制是存在于外界的困难之一部的反撞，这种困难用机体绝灭的痛苦强迫本能生活放弃它的若干冲动的直接

^① 《引论》第262页。

^② 同上。

满足。

外部世界的真实是不需要讨论的了，因为弗洛伊德是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唯物论者。他说，“科学思想在本质上是与常态的思想过程没有分别的，这种常态思想便是我们大家，相信的人和不相信的人都一样，用来处理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务的。它只在某几方面采取特殊的形式。……它的目的是要切合实际——那就是说，切合那存在我们以外的不受我们影响的东西，如经验所教训我们的，那东西对于我们的愿望之实现或阻挠具有决定的作用。这种与真实的外部世界之切合，我们便称为真理。”^①

外部世界“对于我们的愿望之实现或阻挠具有决定的作用！”在这一句话中弗洛伊德说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念。不过马克思主义者不以承认外部现实的决定重要为满足。他格外仔细地研究那现实，以发见人类环境中立即决定他的愿望之实现和阻挠的性质与限度的因素是什么。

一般的说来，精神分析学可以说是研究人类愿望和要求之性质的科学，所以，依同样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研究实现或阻挠那些愿望的外部条件的科学。在叙述精神分析学的时候，必须连带叙述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在这两种相反的研究之统一中，才能对于人类得到充分的了解。

^① 《新论》第 218 页。

第七章 唯物史观

假如真如弗洛伊德所说，外部世界“对于我们的愿望之实现或阻挠具有决定的作用”，那末，对于那为人类组成外部世界的特殊环境，自然应当加以详细的研究。我所指的非仅对于人类赖以生活的各种地理的或气候的状况之研究。这些固然都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它们对于人类用以满足身体需要的物品之种类有着很大的决定作用。以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著称的普列汉诺夫，用下面的说法表明地理环境的重要：

“无论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自然物品的性质，或者是人们自己为着同样的目的而生产的物品的性质，都是受着地理环境的特性来决定的。没有金属的地方，土著部落就不能用他们自己所有的力量越过我们称做石器时代的那个界限。同样，原始的渔猎部落要转变到畜牧业和农业，就必须要有相当的地理环境的特性，换句话说，在上面这个场合下，就须要有相当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摩尔根说，西半球缺乏适于畜养的动物和东西两半球植物区系的特殊差异，使两个半球居民的社会发展行程也有了很大的区别。”^①

但人类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上并不永远是被动的。为要从这环境取得他们的生活资料，他们联合起来工作，如我们所知道的，把那足以危及合作力量之存在的个人的互相抵触的倾向压制下来。他从他的经验和发见中学习组织他的力量之新的更有效的方法；他学习制造工具，灌溉土壤，从自然获得的多过自然自动供给的。他的环境不再单独的为土壤和气候等自然条件所限制。他已经发展出一种经济环境，这种经济环境是建立在原来的天然环境上面的，同时反映出他在那上面工作的方式。换一种说法，这种经济环境是人类提高自己到自然条件所许可的水平以上的不断努力的结果。

在很原始的状况下，大自然对于人类的统治几乎是万能的。人类依存在她每一种癖性上面。他只能空手接受她所愿意给的。假如她不愿意给了，他便灭亡了。

但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永不曾生活在这种完全无力的状况下。他是这样一种动物，在他的体质所能供给的办法之外，还能用一些别的取得生活资料的办法来武装他自己。总而言之，他是一种使用工具的动物。天然物体如树枝和石头在原人间的使用固曾为大家所注意，不过人类的特点是他能越过这种使用的偶然性质，他能修改天然的物体以适合他的目的。例如， he 可以把一条树枝作成弓，把另一条树枝作成箭，照这样把天然物体改变成工具，于是提高他取得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 164 页。

生活资料的希望。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①

照这样子，一种特殊的关系在人与其原始的自然的地理的环境中间发展起来，这种关系表明人类用“生产过程”的手段来从事生存竞争这事实。生产过程这名词，马克思用来指人类用以取得生活资料——工具和器械——的方法；简而言之，便是生产财富的技术。借助这种手段，人类对于他所在的自然环境采取一种主动的态度。“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种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②

在与外部世界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彼此间发生适合斗争需要的关系。这种斗争方法便是人类从大自然争取财富的生产过程。在那种方法上的任何改变都要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之需要。所以，一种社会的研究包含有对于社会关系之物质的基础（生产过程）之发展的研究。

关于这一点，在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课本中有一个简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 24—25 页。

② 同上。

的解释，这一部课本在沙皇时代的工人研究团体中应用甚广，并且对于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俄国的传播上也具有重要作用。

“在生产的过程中，由于自然的需要，人们彼此结成一定的关系。人类历史上永不曾有过一个时期，人们彼此间完全孤立的生活并且独自获取谋生的手段。即使在最远的年代，野兽的猎取，沉重物品的转运等等，都需要简单的合作；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人与人间的分工发展起来了。分工的意思便是：在社会工作中，一个人作大家所需要的工作之一部分，另一个人作另一部分，以此类推。简单的合作和分工这两种办法使人们在彼此间造成一定的联络，并建立起最早的初步的生产关系。……这意思是说，人们在与外部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必须彼此结成与那种斗争方法相当的关系；例如，打猎便需要与缺水区域建筑大规模灌溉工程不同的合作方法；现代的机器生产使工人们结成与手工业时代不同的相互关系。”^①

生产方法在决定人类社会关系上的重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中得到理论的说明。它的基本思想是这样：人们在任何时候取得生活的方式都足以决定他们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决定他们的心理的观念。因为经验和发见改变了生产方法，人们便进入不同的生产关系，在他们的意识中便有一个与之相当的改变发生了。

^① 波格丹诺夫著《经济科学短论》。

因此马克思说道：“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几页以后，他又说道：“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十一世纪或者十八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十一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十八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①

马克思主义者把意识当作生产关系的反映，弗洛伊德学派以为无意识在意识生活中寻求适合社会标准的表现，这两种见解是十分相合的。我们要在后面一章研究弗洛伊德学说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不过在这儿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意识的自我是与现实相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 108—109, 113 页。

那一部分的心，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它必须注意外部世界并保存外部世界之一幅写真的图画。”精神分析学者必须承认，自我所反应的现实，以及自我在意识中反映出来的现实，乃是人类所在的全部社会关系，这社会关系乃是建立在人类用以取得生活的技术过程上的。没有人能否认，从古英国人的时代以来，现实已经大大地改变，随着这些改变来的是宗教、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改变。也没有人能否认，生存的自然条件（气候的和地理的）比较地没有改变。那末，这所谓现实（其改变被反映在个人的意识生活中）应当是不变的自然环境以外的一种东西。所以，意识的自我所反应的主要地是变动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这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是由人自己加于大自然的改变而产生的。

我在上面对于社会之经济的基础作了一个概括的叙述，意在表明，人类为生存竞争的需要所迫，不得不压制他们相互的敌对，并且在生活必需的食物、衣服和住处的生产上联合起来。这一点对于本书的目的是极关重要的。

社会生活植根于生产过程的需要中——那就是说，社会生活的样式是由社会所具有的生产力之种类和程度来决定的。但历史指示我们，社会组织的样式是变动不居的，所以这种变动的根本因素问题便发生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用下面一段著名的话描画出社会变革的原动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

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这见解是把社会的进化看作努力扩张的生产力与有时限制这种扩张的生产状况两者互相冲突的结果。生产状况包括那存在于人们与反映这种状况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一切关系。生产状况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它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上面所说的冲突中所占的地位——便是社会中的阶级划分。阶级反映个人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所以它们植根于在一定阶段出现于社会发展中的分工制度。当生产在起码的生活需要之外造成一种剩余的时候,这阶段便出现了。原始社会在构造上是没有阶级的,因为它的生产水平是太低了,所有生产的东西不过勉强够用。因此大家必须在取得生活需要的任务上平均分配,在共同努力的结果上也要平均分配。没有特权阶级存在,因为没有一种剩余来供养它。在那种环境之下,要有那样一个阶级,必得使团体遭受人力的损失,因为必得有若干份子挨饿。贫乏迫成了平等。但在继续增加的社会单位和不断增加的需要之刺激下的经验,发明和发见,造成一种安全的办

法和一种剩余的可能。关于这一点如何引起阶级的形成，恩格斯曾加以描写。

“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性的、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象动物一样贫乏，而且在生产上也未必比动物高明。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平等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新的机构来保护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社会职位的世袭……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而使得建立这种机构的必要性增加了。……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样，都是由

来已久的。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情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一定的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情况，而是相反地暴力被迫为经济情况服务。奴隶制被发现了。这种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①

所以社会分成阶级是有其历史的理由的。这种划分适合生产过程之发展上的一定的阶段，但因为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不平等，以生产出来的财富之分配不均和特权上的不一致表明出来，于是它引起矛盾的倾向。只要阶级的划分适合生产过程的需要，那就是说，只要生产过程扩张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三卷 218—219 页。

去，这种矛盾便不取显露的形式。诚如恩格斯所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①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社会的发展起因于生产力（社会所拥有的建立在地理环境上的技术设备）与生产力所在的生产状况之冲突。

生产状况反映社会以内的分工性质，统治阶级与被治阶级的划分。由这种根本的阶级划分所造成的社会结构之全貌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它的目的便是在延续这给统治阶级以特权地位的社会制度。“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说，“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188—189页。

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①因此马克思把阶级出现后的社会历史描写作一部阶级斗争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因此，阶级斗争提供社会进化的原动力。现代资产阶级在与土地资本的斗争中打落封建组织加于生产力上的桎梏。“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使用的新的生产力——首先是分工和许多局部工人在一个综合性手工工场里的联合——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其他的个人特权和地方特权（这些特权对于非特权等级来说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国是逐渐被打碎的，在法国是一下子被打碎的，在德国还没有被打碎。”^②

在现代社会中，主要的阶级划分存在于资本家和劳动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在聚集和集中先前分散的生产工具上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70—2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46页。

生产是小规模性质的。生产工具属于生产者，生产者用他自己的原料和自己的力量生产他的货物。制成的产品因这缘故是属于他的。他拥有他的劳动的生产品。到十五世纪的末尾，这种小型的工业便觉不够用了，那时因为美洲的发现，好望角的绕行，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开放，贸易和交通受到一种有力的刺激，需要一种较大规模的生产形式了。这情形需要把分散的个人的生产手段转变作由多数工人在一种生产过程中合作来运用的生产形式了。“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①

因为把这样一种社会性质赋给生产，资本主义完成了一种很重要的历史任务，不过它这样作时便把社会中一大部分人的生产手段剥夺。手工业工人的工具在与资本家的工厂组织的竞争上变得毫无价值，小的制造者不久便被挤出去了。在工业革命时期，在十八世纪的后半，因了蒸汽机，纺纱机和织布机等发明，这过程最为显著。结果一个没有任何生产手段的阶级，一个无产阶级，便出现了。“以前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309 页。

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①

但当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为生产造成一个社会基础的时候，当它在工厂中组织和计划生产的时候，它依然保持它所代替的小生产的个人私有性质。

在中世纪初，生产的目的是生产者及其家人的需要之满足。他消费他自己的产品。后来在城市的工匠和乡村的农民之间举行一种交换，前者把产品卖给后者并购买农业物产。这种交换是以一种自发的样式由分工上发生的，并没有指导它的生产计划。各个生产者独立工作，所以无法准确地计算他的生产的需要量。

这种无计划的生产性质，连同生产手段的个人私有，以大量加强的形式遗传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因为在工厂以内的计划生产使得各个生产机关可以生产（互不相关地）大量的商品，投到市场上来。“社会的生产和资本家的专有再现为个人工厂中生产有组织与整个社会中生产无组织的矛盾。”^②

这种整个生产的无计划，说明资本家个人不知道他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59页。

② 恩格斯语。

在生产的商品有多少将被别的生产者送到市场上来。结果他不敢让他的技术设备落在他的竞争者的标准下面，因为这样会妨碍他象他的竞争者那样廉价地有效能地并且同样大量地生产，结果他们的产品便要把他的逐出市场了。因此一种疯狂的竞争便开始了，争取产额上的利益和生产费的低廉，凡站不住脚的便要被逐碰壁了。因为有这些新加入者——过去的资本家，资本主义无组织的生产之牺牲者——无产者的队伍就增加了。

愈来愈有效能的机器之采用，不仅扫荡了成千的较软弱的资本家的组织，也逐出成千的工人们，造成一种“产业后备军”，使得资本家可以把受雇者的工资减到最低的需要水平。马克思写到机器的采用增加失业的“后备军”这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规律的时候，说道，这一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①

因为资本家们不得不改良他们的技术，于是他们投在市场上的商品数量增加了。但生产的扩张比市场的扩张迅速得多。恩格斯以生动的文字形容这事实的周期性：“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708页。

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①

这些危机把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之有限性质显露出来，表明资本家并没有能力管理他们所造成的广大社会生产力。

社会生产力与其个人占有性质的矛盾，只有把生产手段变为社会公有，才能得到解决。这转变便是使生产力的占有与其社会性质相适合。

这转变要怎样来实现呢？

生产状况与生产力的矛盾，从资产阶级逐渐不能维持工人阶级最低限度的生存上表现出来。资产阶级表明它“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②

在资本主义适应生产力之扩张的时候被压制下去的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3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63页。

级矛盾，这时便开始出现了。起初工人的斗争采取孤立的无组织的形式，但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迫使他们采取有组织的斗争形式。资本主义把他们聚集在工厂里边——常有成千的人在一个屋顶下，并且借助机器的采用，破除了他们中间的行业界限。他们处于一种奴隶式的平等地位，并且这种工厂内的组织——把他们分成复杂的大量生产方法的单位——教给他们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来同这种奴役制度进行斗争。

工人的斗争之指导——这种斗争由资本主义的状况下自动发生，即以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为目的——乃是具有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之意识的政党的任务。这一政党必须具有对资本主义性质（其起源和归宿）的了解，因此它应当对于一般的社会发展——资本主义是其中一个特殊的阶段——有了解。

唯物史观供给这样一种理论的观点。它指出社会进化的一般方向，并把历史赋予工人们的任务告诉已经把握这理论的工人们。

不过，对于组织成百万工人来从事打倒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困难的任务，单是这种知识便够用了么？

唯物史观实际上是对于一群矛盾的意愿（由之出现非任何人所意愿的东西）之“总的合力”（用恩格斯的说法）的阐述。恩格斯把这一点说明如下：“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以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

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

现在重要的历史的结果正在形成；这社会主义的“总的合力”尚未全现，因此历史的舞台呈现一种意志冲突的混乱。唯物史观给了这样的保证：从这些矛盾的意志中，一种实行社会主义的共同决定终于要出现的。但马克思主义者不可以因为这保证而停止工作，以待它自动地实现。他必须在发展这共同的意愿上演一个主动的引导的角色。所以他应当研究有助于此的一切因素。目前，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具有相关的经济因素的知识，但他们会忽略那在个人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478—479页。

志的决定上,亦即在历史的造成上占重要地位的心理构造。恩格斯说,每一因素都对于最后的结果有所贡献。心理因素在目前的重要,我要在下一章中说明。

第八章 唯物史观与个人心理

马克思主义虽然格外注重经济因素在决定历史上的作用，但并非认为别的因素都不相干。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 477 页。

他更往下解说为什么“青年作家”有时过分注重经济的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之需要，在现时比在恩格斯写这几个字时是加大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扩展的日子，那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正在安置中。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还没有开始。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趋向资本之聚集和集中，趋向代替过去资本主义用以自豪的那自由竞争之托辣斯和资本联合的形成。

经济的因素是占优势的，因为社会的改革主要地是以量的经济特征为特征。于是一种成极作用（polarisation）发生了，把不断增加的无产者聚在一端，把增长着的生产力的控治集中在另一端，集中在愈来愈少的人的手上。

马克思以预言者的气概把这过程在《资本论》中加以描写：“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排挤。……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

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际，社会主义还只是在他们眼前进行的那过程之必然的结果，而并无立即实行的可能。斯大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革命（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帝国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期，准备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为不可避免的 direct 实践问题的时期。”^②

在那样的环境下，必需注重社会主义之经济的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 266—267 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 64 页。

件——那就是：资本主义内所有现存的经济趋势都按着一个一定的方向归于生产手段的集中化和劳动的社会化，这两种变化终于“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现在资本主义内的矛盾，正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相合，已经变得如此剧烈，它的外壳已经在一点上（那就是俄国）炸碎了。不过这些矛盾虽然剧烈，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虽然横暴——这横暴对于资本统治的维持是必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经济条件虽然正在成熟，这一切在人们心理上的反响——使人们用革命的名词来思想和感觉的反响——还只及于极少数的人。

我们可以照这样说。马克思说，人创造他自己的历史，但要用现成的物质条件来创造。历史的创造固然需要革命的行动，不到物质的条件存在时，革命便不能发生。当这些条件尚在变化过程中的时候，它们的发展便已显出人在历史之创造中的作用。但，当这些条件已经成熟到使革命行动成为必要的时际，人的体态便在创造历史的任务上显得大了起来。这便是注重点的交换。历史——从来是主观的与客观的性质之间或个人机构与经济状况之间（如恩格斯所说）的交换过程——按照历史过程的需要移转它的注重点。这种注重点的更换在性质上是辩证的。

关于辩证唯物论，我要留待后来讨论，不过在这儿我可以这样说，它包含有存在于任何过程中的互易关系之研究。历史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在人与其经济环境之间有一种交互

作用，在这作用中人供给主动的斗争的一面；他并不被动地在他的思想中反映外部世界的改变，因为他把由外部世界跃出的观念转变作征服那世界的武器。马克思充分认识这在人类内部出现的主动的、积极的、斗争的原素。他在论及那些不承认人是历史发展中一个积极的革命的因素的唯物论时说道：“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解释为革命的实践。”^①

在马克思的时代，历史的过程遵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的道路。现在人被投入历史舞台的中心来表演他那一部分。而人，这可怜的狼狈的家伙，面对着历史已经派给他的这大脚色，结结巴巴地念他的台词，束手无策地四处找寻指导。

假如历史在经济发展之绵长的过程的基础上前进，而这过程有时需要人的积极干涉才能向前发展；那便是说，假如采取人类经济环境之继续发展的形式的进化过程，有时为革命的改变所遮断，以便利经济力的发展，假如这情形是真的，那末，知道人类内部心理生活的法则与知道他的经济状况的法则是同样重要的。

讨论一下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罢。恩格斯把这一种创造形容作由强迫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之飞跃。这样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17页。

飞跃要求(从来的社会改革都不曾要求过的)用尽人类的所有力量来完成它。其中包含有废止人类对经济力和社会力的屈服,解放人类的精神,使之能飞达梦想不到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来,这种前途才是人类历史之正当的开始,到这时人类才把连结人与动物界的史前最后的阶段抛在后面。在这样一个时候,区别人类与其他自然存在的那些官能或性质变得格外重要,还有什么奇怪么?人类精神的研究应当作为解放人类精神的社会之创造的一个不可分离的条件,还有什么奇怪么?过去的社会改革只在那些完尽历史使命的作者心中保有些微的意识。他们把他们的任务与人类一般的利益视为一体。不过,马克思说,“正如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对他自己所抱意见来判断他,一个革命的时期也不能从它自己的意识上来判断。”这话在我们的时代也同样是真的么?不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以我们的目的之革命意识武装了我们,这种革命意识是建立在对全部历史过程的了解上的。于是意识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它不再是人们部分的直接的利益之反映,这些人们在追逐上项利益时无意识地实现了一种历史的目的。革命阶级所追逐的利益终于与社会全体的真正利益相符合。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制度的横暴,但把社会的大部分置在它自己的横暴之下。社会主义借助于工人阶级专政的建立,废除了加于社会全体的横暴,并且是在它所要达到的历史的目的之意识的实现下来完成的。

恩格斯把这过程用生动的字句来加以描写: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卷第 323 页。

对于那些主观作用的研究之需要，这是多么有力的一种证明！假如人要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那种主观的作用是他所必须起到的。恩格斯说，过去主宰人的生存条件，现在转入他的统治和管理之下了。我们过去主张，现在就要达到那样一个时期，历史中的重要因素不再是一直到现在主宰人类以至历史的经济的生存条件，乃是人类自己了，不正是这样的意思么？我们由人类主观生活与他的经济环境交互作用之方式的研究，进而研究精神分析学所供给的知识如何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类似的研究已经预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

对人类心理的研究，据弗洛伊德说，主要的是对无意识的心的研究。这种“无意识”的概念并不一定使马克思主义者难为情。马克思和恩格斯明了在人们的意识的表示后面存在有别的动机，它们是无意识的，但却是真正的心理的根本因素。恩格斯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①

诚然，恩格斯把意识形态的过程与外部经济事实联系起来，不过，他承认，“这样作时，我们为了内容的缘故，忽略了形式的方面——这些观念发生的方式。这一点已经给我们的敌人一个可欢迎的误解机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 501 页。

“观念发生的方式”，我们相信，最好用人类原来的本能的性质与他的经济环境交互作用这说法来解释。研究一下弗洛伊德用来说明心理过程之原动的性质的概念，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解释得更为清楚。

这些概念便是在本书他处解释过的爱德，自我和超自我。弗洛伊德把这些概念当作形容心理活动的最明显的工作方法。正如一切概念，它们也有它们的短处；特别是它们具有这样的倾向：对于那本来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心理活动给了一个呆板的分离的形式。象这一类的概念乃是每个科学家都要用来工作的工具，并且都不免于不切合那实际的具体的现实之责难。例如，马克思用下面的态度辩护他在他的经济理论中所用的概念：“你对于价值的法则所作的非难，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可以施于一切概念。思想与存在的一致，用黑格尔学派的说法，总是与你那圆圈与多边形的例相合的。也可以说，一件东西的概念与其实实际，好象两条平行的渐近线，虽然彼此相接近，但永远不能遇合。这两者间的不同便是使概念非直接的现实以及现实非即其概念的不同。不过，虽然一个概念具有一个概念的重要性质，所以表面上不能与现实直接相合，必得先从现实上抽象出来，但它依然不完全是一种虚构，除非你要宣布一切思想的结果都是虚构，因为现实必须走一段长路才能与它们相合，而且也只是多边形的近似的相合。”^①

① 《马一恩通信集》英文版第 527—528 页。

弗洛伊德也深知道他的概念的限度。他在对“心理的人格之解剖”作了一番颇为复杂的说明之后，说了下面一番话，“我应当附加一个警告。当你们想到人格之自我，超自我和爱德的划分时，你们不应当把它想象作政治地理上那种画的一清二楚的分界线。我们要说明心的性质，不能用线条画的方法，如在一幅图画或一幅原人画上所见的，却需要用彼此交映的颜色的面积，如在现代画中所见的。当我们既经作了我们的区分，我们必须让我们已经区分开来的再混合起来。对于象人类的心这样不可捉摸的一种东西之描摹的初步尝试，不要责备得太严罢。”①

关于弗洛伊德学说之基本的概念的辩护已如上述；现在让我们来使用这些概念罢。

如我们所知道的，爱德是极端重要的。它在性质上是无意识的，并包含有要求立即无条件满足的本能冲动。它的要求主要是性的，所以在一个较少压制的原始社会，那社会之性的基础是十分明显的。顽强的现实，经济的必要，如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强要对这些冲动加以压制。结果爱德的一部分被修改了，以一种间接的样式为它的冲动寻求满足。爱德与现实相接时的洗炼作用，弗洛伊德称之为自我。自我主要的是意识的，给予爱德的冲动一种不惊扰意识的观念作用的形式。恩格斯称为意识形态过程之“虚假意识”的东西要由它来负责。我们可以把自我看作向外界寻求

① 《新论》第104页。着重号为本书著者所加。

满足的本能生活与限制那种满足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现。好象它常在爱德与现实之间考虑，想要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

自我不仅修改爱德冲动，使之不要在意识的表现上与现实冲突得太强烈。它也在为爱德冲动寻求满足的时候修改现实。因为它主要地是意识的，它是直接以观念和概念等来反映外部世界的那一部分的心。它把外部世界呈现给爱德，假如不这样，由于爱德忽略现实的考虑，它不久便把机体毁灭了。不过因为它一方面与外部世界有关系，另一方面与爱德的本能冲动有关系，所以它若专从外部现实方面或专从本能冲动方面对于人类生活作任何考虑都是偏颇的。自我，意识的生活，是内在的本能力与外在的顽强的现实世界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表现。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一点爱德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人们只有在压制那由不合理的爱德冲动发出的相互妒嫉和敌视的条件上，才能形成大的稳固的社会单位。

我们所说明的这见解乃是恩格斯主张过的，他以成年人的相互容忍为形成大社会团体的先决条件。爱德冲动的压制只能说明它们的满足是与现实冲突的。这压制是由自我来完成的，自我对爱德代表现实，并依照现实来修改爱德。关于自我对爱德冲动的强行的压制，我们注重现实的作用，这意见是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极端相合的。“如把自我看作爱德为外部世界所修改的那一部分，大致是不会错

的。……自我对于爱德已经负起代表外部世界的任务，因而负起拯救它的任务，因为倘非如此，则爱德盲目地要求它的本能的满足，完全不顾外界力量的强大，一定不免于灭亡。”^①

我们对于社会之经济基础的叙述，表明由财富生产的过程所供给的生活基础，因而表明面对人类的现实主要地是社会的和经济的。显然，假如自我的功用是阻止爱德冲动，免致机体归于毁灭，假如它必须一方面尊重客观的因素，一方面又要为爱德冲动取得满足，那末，既然现实是重要的了，则经济的和社会的构造所据以建立的生产过程之条件也必然更显得重要了。

假如爱德冲动能干涉生活必需的基础之供给，假如互相矛盾的感情和爱德冲动之无条件的满足的要求不受压制，则财富生产上所需要的合作便成为不可能的了。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经济生活的条件，为要使财富生产过程不受妨害地运用，遂形成推动自我来对爱德施行压制的现实。

但我们已经说过，爱德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非片面的。正如经济现实强迫自我来压制爱德冲动，不断寻求满足的爱德冲动也强迫自我去征服经济生活中对于它的满足的障碍。上层建筑的因素，政治的，宗教的，美术的，以及其他的观念，恩格斯说，不仅被动地反映它们所依以建立的经济基础，但也积极地要求改变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说

^① 《新论》第101页。

法。若说那在政治上和宗教上接受意识的社会化的表现的被压制的爱德冲动并不常是被动的，也不断地推动自我去改造那强要对它们加以压制的外部现实，也是一样的。它们好象不断地要求把世界改造得“更切近它们的心愿”。在各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一定要求改变他们的环境，此外我们还能有别的解释么？在人类内部必有一种借助于意识来与外部世界交互作用的主动原则，所以意识生活不仅表现外部世界的印象，也表现那为了它自己的缘故而捉住这些印象的能动的原则。实际上，恩格斯确定地接受这意见。他写道：“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①

所以，我们可以说，意识表现经济世界与本能生活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只有研究那相关的两种因素才能够了解。恩格斯在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问题上使用的是这一种研究法。“我们分析这种关系。既然是一种关系，便已暗示它有彼此相关的两面。这两面的每一面都为它自己所重视，它要我们知道它们彼此相对待的方法，它们交互作用的方法。”

“上层建筑”表现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与客观的现实之间的一种关系，关于这一点，当我们联系马克思同弗洛伊德对于宗教的意见时，我们就要看得更清楚了。但我们先须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 243 页。

论别的重要的心理因素——超自我。

我们已经把爱德与自我以及自我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以便把它们翻译成经济条件的说法。不过不幸的是，实际上这幅图画并不如此清楚。要说明超自我怎样与具有经济重要性的事实关联起来，我们先要注意它的一些重要性质。儿童对于现实最初的嗜好，最初的挫折和满足，都来自与他最密切相关的人——他的父母、亲眷等等。长时期的软弱是人类一个重要的生物学的性质，这性质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不但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我不关心儿童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所受的待遇如何，所在以生长的传统如何，我只关心这事实：一切儿童对于这种软弱的心理的反应具有某种与软弱自身一样不可少的共同的因素。

儿童逐渐认识具有阻挠他的本能之满足的势力的一种外界的威权。小孩以无数的方式觉出他与成人之间的重要差异，觉出成人具有满足或不满足他的需要之能力。父母或别种威权的作用在强使儿童适应外部现实的要求上把它的印迹留在儿童身上。当自我还软弱的时候，不能控制爱德强有力的要求，于是自我的一部分与父母视为一体，以超自我的形式，继续监督爱德冲动，强迫自我压制那些它认为不可允许的爱德冲动。使人类与宗教运动发生感情连系的便是这超自我，在这种运动中，上帝和教会和其他威权的力量代表父亲；使人类服从存在于任何社会的威权之力量的也是这超自我。超自我在它的强迫行为上是不合理性的；它的道德是严厉的，因为这道德的根源是在儿童时代，那时

两亲的威权要求没有疑问的服从。它的势力可以在〔乔治五世即位〕五十年庆典中间看出来，那时连本来不关心皇室的举动的许多人们都感情兴奋起来，用悬旗和饮酒宣示他们对于王—父的“爱”。英王在圣诞日对全帝国的周年演说也是切合他同成百万人民的感情关系的。他把帝国人民说成一个以他为父亲的家庭。不能否认，对于成百万的人民，这话并没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因为在最早的儿童时期，前于超自我之形成的爱与保护之需要，在成年生活中也发生作用。这种爱的需要是儿童早年环境的一个决定因素。他对于后来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环境所作的反应，大受儿童时代他那爱与保护之需要所得的回答之方式的影响。大多数人以为他们的儿童时代是一个比较快乐没有忧虑的时期，那时他们的父母的爱和保护把他们与现实的严酷隔开。自然也有人作为父母所愤恨，把他们当作加于父母的额外的担负。这种愤恨大致是由经济的原因发生的，例如贫穷使得多养一口人成为一个大问题。儿童之爱的需要，在以上两种可能的情形下，受到或适当或不大适当的应付，或多多少少的被忽略掉，大致就从这两种可能的情形中发出后来的两种态度。第一种，这成年人，在形成超自我的同体观的时候，会以信托和爱的感情，而不以敌对的感情，来看待那他曾以对父母的感情态度来看待的威权。另一种，反抗和仇恨占优势。在爱的下面有一种潜伏的敌意，在后面将要讨论的环境下，这种敌意会被扰动起来并且代替了爱。

从上面所说，我们可以多少了解人类中不合理地保守

的倾向，对于一切不合传统的人生态度的东西所表示的不合理的反对。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一些社会组织久已不与社会需要相合而还能继续存在下去。超自我不仅说明强要保持一种过了时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保守主义，也说明了形成革命者一部分感情生活的不合理的强制因素。这些不合理的因素在一种革命运动中有多么危险，用来防备它们的一种精神分析的知识有多么重要，我们将在最末一章中看出来。

社会改革者和革命家都知道他们最顽强的对抗来自死气沉沉的传统——加于现存组织上的感情束缚。但若对超自我在那些组织的生存中所起作用缺乏了解，便不能了解那些组织。因为，这些组织的性质虽或由于先前的经济的需要，不过它们在人类的行为上取得的威权，当它存在的理由消失许久后依然能够保持，这却是由于超自我的强制。

关于把人们束缚在衰老的经济组织上的不计其数的结子，列宁说道：“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知道它是这样的。但我们现在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的。

超自我是传递传统的行为态度的工具，因为，“概括地说，父母和类似的威权，在教育他们的儿童的时候，顺从他们自己的超自我的制裁。不拘他们的自我和超自我的交谊如何，在教育儿童时，他们总是严厉而苛刻的。他们已经忘记他们儿童时代的困难，他们却高兴他们终于能够与他们自己的父母——那时使他们受那样严厉的限制的父母——视为一体。结果是，儿童的超自我并非真的建立在

他们的父母的模范上，乃是建立在父母的超自我的模范上；它取得同样的内容；它变成传统的媒介，也变成照这样子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有古老价值的媒介。”^① 弗洛伊德往下说道：“你们也许容易猜测，超自我的认识，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之了解上有多么大的帮助。所谓唯物史观，在轻视这因素上，大概是错了。唯物史观用下面的说法把这因素扫过一边，它说，人类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它们的经济状况在任何时候的结果，或建于经济状况上的上层建筑。这固然是真理，但很可能并非全部的真理。人类从来不完全生活在现在以内；超自我的意识形态把过去保存下来，把种族和人民的习惯保存下来，这种东西只能缓缓地屈服于现在的势力，屈服于经济条件的新的发展。”^②

马克思主义当然并非除了经济的因素之外把其他一切别的因素都扫开，不过弗洛伊德已经唤起对于超自我的作用的注意，这却是他的功劳。我们主张现在人类应当掌握过去随经济的发展前进的历史过程，假如这主张是对的，那末，这超自我的因素便显得非常的需要。假如没有超自我的强制，社会改革的任务会容易到不可量计。自我会自动地调整社会组织，使之适合经济的现实，一旦觉出有这种需要的时候。

为了这种缘故，那些把注意转向社会问题并看出一种社会改革之需要的精神分析学者，以为主要的任务便是用

① 《新论》第 90 页。

② 同书第 91 页。

“自我的道德”来代替“超自我的道德”。傅吕格教授在他所著的《宣言书》^①中看出，“进步的社会学”之目的便是加强自我，以对抗“超自我之粗暴的比较无意识的控制”，这意思是说，把个人从对于不合理的威权和强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并使他的理性方面对于他的人格得到更大的统治。他说：“我们承认加强个人之意识的自我之精神分析过程是既冗长又费力的。不提其他的困难，单说要想把人类一小部分来加以精神分析也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末，有没有任何代替的过程，使精神分析学的发见，与物理学的发见一样，可供人类一般的用途呢？这是我们在这儿不能回答的问题。诚然，他们心理学者自己不知道这答案，并且在现代大多数精神分析学著作家之无所可否的态度中大概还含有一种悲观。我们只能重复地说，在某几方面，一种心理学的态度已经有了较普遍的发展的迹象，并且进步派自己应当注意这种态度的培养。”

使社会的改革依赖由各色“进步派”对于一种心理的态度“在某几方面”的培养。这是一种不大有希望的观点。而且这观点是与精神分析学之逻辑的发展背道而驰的。

精神分析学认定象国家这样的威权的力量是有一种心理的基础的，那便是说，这力量是与一种具体化的超自我被视同一体的。国家是放大的幼稚的父亲。据“进步的”精神分析学者说，假如要有进步，必须打倒超自我的不合理的

① Manifesto: the Book of the Federation of Progressive Societies and Individuals(Allen & Unwin)。

强制,因而加强自我,它于是可以在社会秩序中作必要的调整。这任务便是摧毁超自我的不合理的强制,但这种强制不正是表现在对于与超自我视同一体的国家威权之继续效忠上面么?

所以要推翻超自我的威权,必须先推翻结集为国家的统治组织。

我们关于唯物史观的叙述溯源于阶级的存在,其中之一的统治阶级以国家的威权来保持它的特权地位。在统治阶级和被治阶级之间存在有一种矛盾,它的客观基础便在于每一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脚色之不同,以及在所生产的财富之分配上的结果之不同。

国家要被治阶级服从,正如父亲要儿童服从。即使这威权中会有剥夺和限制,也得加以尊重。

但在这原始的对待父亲的态度中含有冲突的倾向和死的愿望,我们知道,这种倾向和愿望为了社会团结的需要被压制下去了。我们把这种社会团结与便利生产力活动的需要关连起来。但生产过程继续的扩展,于是终于要求社会团结的新形式。社会关系适合生产过程的这一阶段而阻碍了另一阶段,于是发出调整全部社会构造的要求。旧的社会关系,在它们的需要已经失去许久以后,依然居统治的地位,因为超自我的不合理的强制,使人们服从现存的威权力量。不过防止矛盾倾向的理由却是对外部现实进行斗争
这事实需要如此。但当向爱德呈献现实之图画的自我注意到生产过程改变了的性质,以及社会关系与它的不适合,它

施于爱德冲动的压制不再有保持社会秩序的理由。爱德曾经为了保持社会团结的缘故被迫放弃了它的满足。但现在社会团结之现存的形式、阶级关系、全部经济的和社会的构造不再与生产过程的需要相适合，于是爱德在已经失去客观根据的压制下愈来愈不安静，自我鉴于改变了的经济的需要也感到维持其压制的困难。超自我所以取得威权是因为它对自我所作压制爱德冲动的要求大部分适合于外界经济现实的需要。我们应当记住，压制源起于大社会团体从事更有效的经济斗争的需要，超自我做为加强自我以压制本能冲动的手段而兴起。但，给它借口的经济条件已经改变，它那不断的要求迫使自我来加以反抗。或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统治阶级的威权只有在它是生产力之运用和发展上的必需条件时才有存在的理由。我们知道，恩格斯根据这意思承认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度是人类发展中一个历史的必需的条件。

所以当一统治阶级不再为生产力的发展上所需要，并且开始用强迫服从过时的社会条件以阻碍生产力之发展的时候，它的威权便失去了历史的根据。就超自我来说，它的威权之衰弱便表现在那些因反应经济需要而受压制的矛盾之勃起上面。爱德对于失去了客观理由的超自我之要求的反抗便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出来，这种阶级斗争以小的骚动开始，因了超自我的要求愈来愈不合，遂发展为公开的革命。

回到“进步的”精神分析学者，我要对他们提示，反抗超

自我之不合理的威权的斗争，在阶级斗争中找到最合理的表现。统治阶级代表守旧的势力，并且因为，据精神分析学所说，这势力的威权植根于儿童—父母的情境中，合理的态度便是把我们自己与被压迫的社会阶级视为一体，对于它们的进取性在反对它们的统治者的斗争中给以意识的指导。

这一点部分地为傅吕格教授所认识，他说：“这样一种‘进步的’态度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反抗的态度。为了要求充分运用我们的官能的自由，我们必然尽量站在爱德方面，而不站在超自我方面；并且，在这样作时，我们把我们自己与儿童的志愿视为一体，而不与父母的威权视为一体。因此一个精神分析学的著作家，可以把在许多不同的范围内进行的反抗威权的斗争的情节，放在这样一个总的标题下来叙述：‘父或子？’”

这样一个公式，译成政治的行动，必然是，在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站在工人阶级方面。

但傅吕格怀疑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否在辩护爱德的放纵外有更多的成就。他以为需要的不仅是超自我不合理的强制之破除，乃更是自我的加强。超自我的强制客观地表现为过时的社会组织之威权的延续——这类组织已经不再与它们的经济基础适合了。加强自我的目的，不仅在破除阻碍经济发展因而是合理的不合理的社会组织，乃更在发展与经济需要适合因而是合理的别的组织。马克思主义充分明了，它的任务不限于资本主义社会之破除。这任

务是社会之意识的改造，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使它们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仅看作搬弄于贫富敌对之上的一种阶级战争的理论，如下面弗洛伊德所说，乃是无谓的。目前“这新秩序既然是不完全的并且受外界威胁的，群众用来追随布尔什维克之领导的热情，对于那建设完全的和没有危险的将来并不能给以保证。正如宗教一般，布尔什维主义也只好用将来的更好的生活——那时不再有未满足的需要——之应许，来答报它的信徒们在现生活所受的痛苦和缺乏。固然这个天堂将存在于这个世界，它要被建立在地上，并且将在一定的时间内开始。但让我们记住，犹太人——他们的宗教对于坟墓以外的人生一无所知——也期望弥赛亚降临世界，而基督教的中世纪更不断地相信，上帝的国是临近了。”^①

但弗洛伊德错了，因为他不能把植根于现实所供给的实际可能性上的一个民族的志愿与宗教的虚幻希望分别开来。

不仅应许一种将来的比较好的生活，并且也组织了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来把那较好的生活实现在此时此地，有什么宗教是这样的呢？

不过，稍后，弗洛伊德又说了下面一段话，仿佛与我方才引用的那一段直接矛盾。

“在一个时期，当一些大国都在宣称，它们相信唯有坚

^① 《新论》第231页。

定地信仰基督教才可以使它们得救的时候，而俄国的革命——虽然具有那一切艰难的局面——却似乎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将来的可能。”^①

事实是这样，在苏联，我们得到一个反抗一切不合理的威权的榜样——反抗加于结婚和离婚的阻碍，反抗把女人变成动产之性的法律；这不是与放纵的爱德有关的（傅吕格却以为必定有关）一种反抗，却是与一种比较开明的观点——那便是说，一种自我的加强——有关的反抗。连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如赫胥黎(Huxley)和海尔丹(Haldane)都提到苏联给与科学的鼓励，识字运动的广大发展，和科学著作在出版界的优势，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本质上是合理的，并且大概只有它才能实现进步的精神分析学者的目的。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韦勃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最近用两大册的书来说明苏维埃经济比资本主义的经济的长处。他们说：“在指导工业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和愿望上，以及在使全体劳动大众极端有益地参加生产，苏维埃共产主义实在有胜过营利的资本主义之成就的希望。”^②

社会的历史，在其意识形态方面，曾经是一种进步的启蒙运动的历史，过去这一种启蒙运动时时需要革命行为来推动，以除去愚蔽和退化的威胁。

现在那些威胁以一种过时的经济制度之形式存在。统

① 《新论》第222页。

② 《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化》(Longmans)。

治阶级觉出那种制度的破除便是他们的特权的完结，遂用极端野蛮的手段来压制这些进步的力量。在一种意义上，法西斯主义可以算是残暴的父亲施于反抗的儿子的阉割的威胁。

因为愈来愈明显，资本主义供给进步的思想之发展的机会愈来愈少，精神分析学者就要必须回答这问题：他们将否如傅吕格教授所说，“把他们自己与孩子们的志愿视同一体，而不与父母的威权视同一体？”

我要举一个例来结束这一章，这个例说明，专运用精神分析的学说，而不参考引起阶级斗争的经济因素，会造成何等荒谬以至有害的结论。

在一本题名为《战争，淫虐狂与和平主义》的书中，伦敦精神学分析学院科学研究指导员葛娄佛博士 (Dr. Glover) 想要用精神分析的学说来解决战争问题。他说，把战争当作一个政治的或经济的问题是一种“不加思虑的假定”。因此他要我们考虑“一些比较显明的性的因素”。他的主要的见解是，战争是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淫虐狂的要求之活动，这种要求在战争中寻求外界的满足。如弗洛伊德所说，战争是“破坏的冲动向外界的转移”。现在，由我们研究本能所得，我们知道这种破坏的冲动的确存在，所以不难接受诉于战争的基本本能是侵略的或淫虐狂的这意见。但对于这些破坏的冲动的刺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并且为什么它们单选择那在经济上相敌对的某一国家或若干国家的集团

来进行战争呢？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战中，从讲台上，教坛上，和报纸上倾泻一种为了战争的不断的宣传，巧妙地指导那破坏的冲动沿着指定的途径进行。用征兵的方法强迫不情愿的人们拿起武器，特别是当第一度兴奋的高潮已经低落而真正的事实开始显露的时候。简而言之，我们固然可以承认那形成战争行为之主观内容的性的因素和破坏的冲动，而这些冲动却是由辅助经济的和政治的目的之仇恨的宣传鼓舞起来的。我们知道，在战争“爆发”以前，黩武国家的统治阶级已经预备下计划和盟国，并且甚至用“和平的谈判”来掩蔽他们的准备，不使人民知道。所以，若说战争为破坏的冲动之表现提供一种客观的情境，这固然是不错的，但若对于造成战争诸力量的性质一无所知——那就是说，对于那由商业的敌对进至尖锐的阶段，使战争的决断成为必要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一无所知——这种说明便没有什么价值。

既不参考引起战争的社会条件，甚至把任何这一类的建议嘲笑作“不加思虑的假定”，象这样一种战争的分析当然会使葛姿佛博士作出下面惊人的提议来了：

他以为“最实际的办法应当是冷静地（！）坐下来，订立一个一千年的计划，以从事无意识的矛盾之非战争的解决。”^①

作为一种辅助的预防办法，他提议调查那患精神的性萎的独裁者、外交部长、驻外使节与和平代表的数目。

^① 《战争，淫虐狂与和平主义》第109页。

这一类的建议是无法加以重视的。我们要请葛娄佛博士注意弗洛伊德的这意见：精神分析在教育上普遍的应用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构造”，并且请问他，对于他那计划的目的，这说法是否真实得多。

相反地，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包括在战争中的政治目的。他指出统治阶级在国内和国外用以维持它的政权的凶残手段，使人不能希望有一天那一阶级的分子会自动地为了和平的关系而情愿解决他们那无意识的矛盾。

假如反抗超自我的斗争在客观上便是一种反抗过时的社会组织的斗争，也便是“儿子们”反抗“父亲们”的斗争，假如这是真的，那末，阶级战争乃是把侵略的本能用于进步的目的之唯一的方法。

阶级战争将要扫荡那加于人类的需要之满足上的无理的限制；它将把破坏的冲动转向那代表不合理的超自我的事物和人们。

阶级斗争固然解放了爱德冲动，但在削弱超自我的威权上，并在领导它对于改造社会的任务之意识上，它必然地加强了自我。在阶级战争中，爱德与自我共同反抗超自我。爱德是为了资本主义实际等于人类一切根本需要的限制，而自我则为了横暴的超自我因要遂行那种限制竟采用了自我所反抗的不合理的思想和行为的态度。

假如升华作用能把本能的冲动转向于社会有利的途径，那末阶级战争便是升华作用的最高形式，因为它是把社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更合理的水准上的工具。

第九章 宗 教

精神分析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同一的现象。一方面注重主观的因素，另一方面则注重外部的条件。但双方的观点却是并行不悖的，并且统一起来能使彼此获益。这一点在他们对于宗教的解释上表现得最明白。

格外注意人类的环境(人类存在的经济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为宗教原先是优越的自然力之反映,等到人类开始征服那些自然力,于是宗教便成了优越的经济力和社会力量之反映了。

恩格斯把这一点说明如下:

“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

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象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的反映过程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①

我们当然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者这见解：宗教在客观上是由于外部现实的主宰性质，这种现实，与人们对照起来，使人们觉得自己软弱无力，不过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解释。例如，人为什么用外部力量的人格化，用祷告和仪式来向这样创造出来的神们求助，以反应自己的无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在过分注重宗教的反映性质了，人类必然有一个主动的方面。马克思说，不应当把现实仅看作“客体或直观”，而应当看作“人类感官的活动”，假如人类内部没有主动的因素，假如他只是被动地反映世界，那末他在内部就没有创造神们以补救他在自然力和经济力前的软弱的冲动了。他的心仅只反映现实的可怕，并不发生创造宗教的心理作用。假如那种作用存在，它必有存在的法则；它必定处理外部世界的印象以特殊的样式提供它的材料。因此它是应当加以研究的，不仅把它当作摄取现实的一种内在的照像机，乃要当作分别人与兽类的主要因素。宗教在人类方面也许不是一种很高的成就，但至少它是我们还不能从别种生命的形式中寻见的心理过程之证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卷第 354—355 页。

假如我们转过来研究一下精神分析学的宗教观，我们便知道精神分析学对于宗教的存在是主要地用主观过程的说法来解释的。

弗洛伊德把一切宗教同具的因素区分作三种。第一种，宗教含有关于宇宙起源的一种说明，这种说明是从他自己的创造之图景中得出来的。第二种，它用一种将来的更快乐的生活的保证来慰藉现生活的困苦。第三种，它发表指导人生的教训，以便他们有资格承受死后的酬报。弗洛伊德问道，宗教怎样结合这三种性质呢？他以下面的方式叙述依据个人自己的创造之图景来创造宇宙的理论：

“这理论是说，宇宙是由一种与人相似的东西创造的，不过这东西在各方面，在力量、智慧和感情方面，都比人来得强大，老实说，是由一种理想化的超人创造的。……有趣味的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总是独一的神，即使相信另外有许多神存在。同样有趣味的是，这个创造者差不多总是一个男性，虽然不乏有女神存在的表示，并且许多神话把世界的创造从一个男神降服一个堕落为妖怪的女神开始。……因为这个造物神被人公开地称作父，我们余下的研究也就容易了。精神分析学断定，他实际是穿着曾经小孩见过的盛服的父亲。教徒的宇宙创造之图景与他对于他自己的创造所作的图景是相同的。”^①

在客观上形成宗教的（如马克思主义者所注重的）软弱，引起一种在外部世界前求保护和指导的需要。这种软弱

^① 《新论》第 207—208 页。

恢复了儿童对于父亲的依赖，因为在童年，父亲给予儿童所需要的保护和指导。但成年人不再象他童年时那样看待他自己的父亲了。他已经发见他的父亲也有一般人类所有的缺欠和软弱。因此，他不能向他尘世的父亲求保护了。但在他的无意识中他依然保持童年的父亲（按照他的命令和教训之奉行与否来行赏罚的那全能的父亲）的记忆象。当现实压迫到他时，这人便向这记忆象求保护。这记忆象被投射到外部世界来然后向它求保护。于是把他看作“全能的父”。信宗教的人于是以夸大的言词来表现他幼年时对待他自己尘世的父亲之一切态度。这个天父是全能的，全知的，很严厉的，然而满具爱心的。因此，我们在宗教中看出与控治人类生活的外部力量同体观的超自我的作用。“那些外部力量在人们心中虚幻的反映”使人们生出超自我，然后向它求保护。

弗洛伊德进一步说明宗教教训与童年情境的关系。“这给儿童以生命、使他脱离生命中所含的危险、教他什么可作什么不可作的父亲，也就是使他接受他的本能愿望上一定限制、并教他假如他要被容许作家庭一分子将来作更大团体一分子并为大家所爱好、应以何种态度对待他的父母、兄弟和姊妹的那父亲。借助于一种责罚制度，儿童被教以社会义务，更被教以他在生活中的安全都依靠那爱他并相信他也爱他们的父母的（到后来则依靠在别的人们的）身上。所有这一切情况都为成年人照样移入宗教中。他的父母的训诫和命令作为他的道德的良心在他的胸中生活下去；上帝借

助于同样的赏罚制度统治人们的世界，每一个人所享受的保护和幸福的程度全在于他对于道德条例的奉行；他用来防范外部世界和人类环境之危险的安全之感，建立在他对于上帝的爱和上帝对于他的爱之意识上。最后，他在祈祷中对于神的意志有一种直接的影响，并且照那样子使他能分受神的全能。”^①

假如宗教主要地是对于幼时的父亲之依赖的复活，由自然力和经济力的控制引起的，那末，关于古代宗教的多神性质还需要加以解释。

一个人的超自我主要的是在父母的威权之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次，则是在教师（各种成年人）之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为了说明的便利，我们可以把父亲当作超自我的起源，实际上还有一些别的人在它的源起上操演一部分的作用。其次，超自我对于外部世界的人或物的同体观，可以包括任何数目的人或物，只要他们能在无意识的心中与威权的作用联想得起来。所以国家和雇主们都在宗教之外提供超自我以同体观。因此，在多神宗教中，若干小神仅只反映这事实：在儿童时代常有一些可与那些神同体观的小威权。在原始的团体家庭中，同样，儿童附属在这一整个团体的威权下，或与他发生接触的不只是一个“父亲”，而是许多与他的母亲长期或短期配合的“父亲们”。因此双亲的威权便分散了，宗教的反映遂是一种形成多数超自我的

^① 《新论》第210页。着重号为本书著者所加。

同体观的倾向。但，如弗洛伊德指出来的，一切宗教都有一个最高的神，他常是一个男性，并把世界的创造归功于他。

但在人类历史中有一个宗教并不存在的阶段。据傅莱泽(Frazer)说，相信超自然的物体，借了适当的仪式和祷告从它们得到保护，这情形在很原始的民族中并不存在，换一种说法，引起求神保护的需要的软弱之感还没有被唤醒。他们表面上对于他们自己影响自然的结果的能力具有无上的信任，我们一想到，在客观上，那时大自然必然比在宗教出现以后更为优越，这一点却是可惊的。弗洛伊德加以解说道：“在原始民族中，思想还是高度性欲化的，而这一点足以说明思想万能的信仰，主宰世界的能力之不动摇的信任，以及使人类明了他在世界中的真地位的明显事实之无从觉知。”^①这种民族大致还没有越过恩格斯所说的分别兽与人的野蛮阶段，所以大社会团体所需要的压制还不能存在。他们必定生活在，如恩格斯所说，“无限制的性关系”的状况中，这种状况使他们的爱德冲动得到自由的发展。在那种状况下，强大的超自我是不会形成的，因为引起超自我的形成的禁制并不存在。我们只能这样设想，他们的性冲动的满足，既没有内部的抵制，使他们在现实的面前得到一种无上的信念。他们主要地为爱德冲动所主宰，这些冲动不承认它们的满足上的任何限制，想要扫荡它们前面的一切，绝不关心外部大自然的优越力量。他们想把大自然置在他

^① 《图腾与禁忌》第149页。

们的势力之下的那神秘计划是一些明显的象征，借了象征地表演出它们所要取得的对象以取得那对象。我们对于梦的研究已经表明象征是无意识冲动的一种表现法，所以原始民族对于象征的运用足以表明爱德冲动的优势。

这少许的例证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怎样为弗洛伊德派的理论所补充。使宗教成为反应自然界和后来的经济界之统治力量的方法的内部冲动，为弗洛伊德派的理论解释明白了。一切宗教都建立在人在外部世界前面所感到的不安全上。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人怎样反应那种感觉；它把宗教之一般的心理的内容指示给我们。但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告诉我们，不安全的感觉唤醒了幼年对于成人的依赖，而引起那种感觉的外界因素又是什么呢。它也指示给我们，怎样来克服那种不安全，因而怎样除去那恢复早年对于成人的依赖性的客观因素，因而毁掉宗教的客观基础。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单纯的认识，即使它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统治。为此首先需要有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

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①

弗洛伊德把宗教比作人在他的进化过程中所经验的一种神经病。它是“控治知觉世界的一种尝试,借了愿望世界我们被置入这种知觉世界中。……但它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它的教义具有它发生的时代的印记,那便是人类之愚蠢的儿童时代的印记。它的慰藉是不值得重视的。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并不是一个育儿所呵。”^②

关于宗教在人们的心中唤起的空幻希望,马克思发表了更透彻的意见,他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③

因此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对于宗教的见解是互相补充的。它们表明,相关的两方面——主观生活和外部世界——的研究,对于社会现象之适当的了解,是如何的重要。

不过弗洛伊德派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本质的统一,大概以在两者对现实所作辩证的研究上表现得最为明白。不幸精神分析学者对于辩证法的运用大致是无意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355页。

② 《新论》第2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页。

的。不过，我却想说明弗洛伊德的学说富有心理生活的辩证性质的证据。我确然相信精神分析学说最先提供我们以确定的证据，证明个人心理的过程必然以一种辩证法的样式来进行。

第十章 辩证唯物论

在《精神分析新论》最后一章中，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学在哲学主张上的倾向问题。谈到作为政治的无政府主义（一种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之符合物的不知主义和怀疑主义（它们都否认对于外部世界有获得可靠知识的可能），弗洛伊德斩钉截铁地宣布他对于唯物论的信仰。他说道：“假如在我们的意见中间并没有符合现实的知识，那末我们大可以用纸板当石头来修桥，也可以用十分之一公分而不用百分之一公分的吗啡来注射病人，更可以把催泪瓦斯当醚药来用作麻醉剂了。就连知识界的无政府主义者自己也要强烈地反对他们的学说照这样子来实行。”^①

他用下面的话结束他对于这问题的讨论：“最后，让我把我在精神分析与世界观问题的关系上必须说的话总起来说一说罢。依我的见解，精神分析学并不能创造一个它自己的世界观。它没有这样作的需要，因为它是科学的一个分枝，它可以对于科学的世界观有所贡献。不过，精神分析学却不配有这样一个夸大的名字，因为它并不把一切包

^① 《新论》第226页。

括在它的范围之内，它是不完全的，它并不主张它要成为包容一切的，也并不主张它要建立一个体系。科学思想还在幼稚时期，有很多重大问题它还不能解决。一种建立在科学上的世界观，不管它对于现实世界如何重视，主要地具有消极的性质，例如它拘守事实而排斥幻想。我们同道中，有不满意这种情形的，并且要多有一点什么使他们的心得到片刻的宁静，他们可以到他们能寻到这东西的地方去寻罢，我们不会为这个来责备他们的；不过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也不能为了他们的缘故而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①

我们固然可以同意科学能打击宗教的和唯心论的幻想，并能以现实世界为重，不过由科学家们采用的一般思想方法得出来的关于现实的图画，却具有由那些方法遗传下来的一定的严重缺点。

从一定的复杂环境中，科学家抽出或隔离与他的研究有关的一些因素。他划定一个研究的范围，把一切与他那特殊的问题仿佛不相干的东西都搁开。于是我们有了一些分立的科学，各自在它那特殊的园地来从事它的研究，各自从一般的复杂现实中抽取它认为与这些问题有关的东西。经济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在研究人的时候，只注意他落在他们的领域内的那些行为。照这样子，从人生存于内的不同的诸关系中，有一些被选定，加以特殊的注意，于是那些被抽出来的诸关系之一般性质便在科学理论

^① 《新论》第222—223页。

中发表出来。一个研究种族差异的科学家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凡生有直而黑的头发的民族，不论中国人，欧洲人或美洲人，在种族的意义上都是相关的；他们的国别不同对于这主要的事实只算得偶然的。他们也许是工人，资本家，或罪犯——他把这些性质一概排出他的研究之外。结果有许多不同的东西会因几种相同的性质而被结合起来。所以，科学的理论从一些东西中抽出一些它们共有的性质，并建立一个总的观念，一个概念，它虽不与任何特殊的东西符合，但却表示出它们大家共有的性质。

这种从不同的东西抽取相同的性质的方法，也为马克思应用在他对于价值之性质的研究中。他断定，劳动生产物之一般的共同的性质，便是商品在其交换价值的关系上之重要性质。从不同的商品中，他抽出这个共同的性质，作为它们的价值的量尺，把某一种商品满足某一种人类需要的特殊方式当作不相干的而搁开。同样，心理学家，要把人类的行为解释作无意识的推动，必然从全部复杂情形中，把他特别注意的心理因素分割开来——脑，心，肺，腺，等等的生理过程；与行为之产生有关的外部情况都要被置诸考虑之外了。

照这样子，科学给出一些宇宙的图画，因为它们的抽象性质，这些图画对于那本来交互连结的大东西却给了一幅区别的分立的样式。黎维(Levy)教授用过一个名词，颇善于形容现实之科学的图画。他称之为“隔离物”——“一种由其空间，时间，和物质的环境中被拖出来的东西。”他说，

科学家从宇宙中割下他的隔离物，“当他完工以后，便时常忘记把它放回宇宙中适当的地方，正如他忘记归还他借来的一切工具和书籍。结果便成为一种虚伪的哲学说明。”^①

这说法指出一种结合科学之各种发见的方法之需要，由这方法可以表现那反映交互连结的宇宙的图画。这方法便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在叙述它——特别是它同精神分析学的关系——以前，我们要说明一下，这种事物之相关的性质之注重，对于科学自身也具有重要的功用。

在科学家中间，有这样一种趋势，把科学当作与社会状况或经济状况无关的一种研究形式，把科学的发生当作完全不关心实际问题的科学家头脑中的一个冲动。据他们说，科学的发见所以具有实用的价值，那是由于这发见与实际需要的巧合，并非由于反应那些需要。据鸠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说，“当然，这知识大致可以用在控制自然上，但我想，大多数科学家要说，必然有一种可以唤作纯科学的东西，它有它自己的原动力，不关心它的实用，竟自发长上去。”^②在这儿我们看到纯科学与实用科学这人工的划分，不理睬两者之间的交互连结，这是一种由抽象的方式得出来的划分，科学家们即在这种抽象的方式中处理他们那特殊的问题。科学的理论对于一组一组的現象采取总的说明形式。因此，从具体的环境中作必要抽象的科学家，将忽略

① 《辩证唯物论诸问题》第18页(C. A. Watts)。

② 《科学研究和社会需要》第16页(C. A. Watts)。

他的概念植根于外部现实世界这事实，遂把这些概念当作“纯”独立的存在。

固然他个人可以意识不到他的工作中有任何实用的目的，但他所应付的问题却不是由他自己制造出来的；它们有一个历史和一个背景。轰动一时的世界的伟大科学思想并不仅是天才的闪耀。它们乃是有特殊才能的人们对于客观世界之需要所提出的问题之反应。莫斯科物理学院的黑森(Hessen)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研究，在一九三一年科学史的国际大会中提出来，表明牛顿的学说与他当时的需要是何等密切的相关。他所要解决的机械学的问题都受到机器和军械之技术的发展的影响。航业的发展使得行星和月的研究成为必要，以便解决经度和潮汐变动的问题。这些在“纯”抽象学理上的研究对于天文学、物理学等给予一种推动，但这些抽象学理之刺激却主要地得自当时实际的需要。连一切学理中最抽象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植根于工业革命所引起的实际需要，为要使蒸汽机更有效能。因葛尔诺(Carnot)在寻求汽机活动的一般原理时才引起这定律的建立。

上面提到的鸠利安·赫胥黎的书是一种乡村调查的结果，这调查的目的在发见科学之发展在日常生活上的影响的程度，在已经提过的他的调查的后一阶段，他也必须承认他关于“纯”科学和“实用”科学的见解不合于他在调查中所遇见的事实。于是他说：就全体来看，我已经明了要想划一条线比我原先所想的还要困难。并且在一方面我已经修改

了我先前的观念。我过去想象，重要的新发见总以纯科学开始，经过实用科学，才逐渐渗入实用中。……但我很有兴趣地发见，事情并不常是那样的。”^①

那末，假如科学解决经济的背景和社会的背景所提出的问题，意识到这一点对于科学家有很大的帮助。这就是说，对于与他的问题之解决有关的一切力量，他要准备作意识的合作。假如在目前，有一个阻碍科学发展的过了时的经济制度，那末便有一个主要问题出现，这问题的解决乃是科学向前发展的条件，指明了说，便是除去那种制度的问题。科学家既然知道社会条件使他的研究不易进行，既然知道他必须依赖一个统治阶级的赏赐，而这一阶级除了用科学来毁灭生命和财产之外再不能有别的用处，他就应把他的科学问题与其社会的环境和经济的环境关联起来。要想把这一点作得适当，一种辩证唯物论的研究便是需要的了。它并不是科学的替身，只是接触宇宙事物之交互关系的需要之注重——也便是把森林与树一样看待的需要之注重。

辩证唯物论说明宇宙变革和发展的总规律。实用到社会上，它指出事物必然的趋向，而科学家既然意识到科学与社会需要的关系，借助辩证唯物论给予他的工作的背景，便把他那特殊的问题看作一个总问题的表现，这总问题便是社会的变革。于是他看出一个进步的阶级(工人阶级)的任

^① 《科学研究和社会需要》第 204 页。

务，便是把这个新社会由旧社会的子宫中传送出来。他要把他的科学才力提供那一阶级使用，他明了这样作才是推进科学上的利益。

关于现实之辩证法的见解，在单独的科学中，可以找出许多证明。精神分析学格外能说明心理过程之辩证法的性质。在下一章，我要说明这一点。弗洛伊德的工作之价值，只有在了解了它那主要地辩证法的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

我们现在来到辩证唯物论的本身。

正如我们分别实在的客观世界和反映它的观念，我们把客观的辩证法的过程从那些在心中发动的过程——便是说，主观的辩证法的过程——分别开来。

因为先讨论客观的辩证法，我们将得到现实发展法则的一个总观念，到我们讨论主观的辩证法的时候，我们便看出这些法则怎样与人的心理生活——相关。

辩证唯物论由离开意识独立存在的真实世界之确定开始。它对于把外部世界全部或部分的归之于心的观念论的信仰不作丝毫让步。它清楚地说明，意识是一个物质的脑之功用，并且依靠物质的条件而存在。它说，物质是人类感觉、理智等所接触的现实，不过它是离开人类的感觉、理智等而独立的。有一些人以为近代物理学的研究将驳倒唯物论的见解，实际上它并没有打破一个真实世界独立存在的事实。不拘物质的存在是电子的放射或诸如此类，它

的独立存在是不受损害的。科学只有在这信仰的基础上才成为可能的，这意思曾经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麦克斯·普朗克(Max Plank)加以透辟的说明。他写道：“只有相信在我们外部有一种真实存在，才能够使我们在无目的地摸索中得到必需的支点；并且只有这信仰才能提高因失败而疲乏的精神并使之向前作新的努力。”^①

承认有一个离开意识独立存在的真实世界的并不仅是辩证唯物论，因为依然滞留在各种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十八世纪的旧式唯物论，也以世界的独立存在为其出发点。

把辩证唯物论与机械论的见解清楚地分开是很重要的。机械论把宇宙的品汇还原为原子和电子的机械的活动。思想是一种电子的跳舞，并且有一天可以用物理的说法和化学的说法来加以解释。物体间的不同乃由于物质单位之数目与结合上的不同。不承认特殊的生物学的或心理学的定律；有生命与无生命的物质之不同不过由于电子的数量和排列上的不同。

这种机械唯物论一般地被反对者用作放矢之的，这些人完全不理睬现代的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并不承认机械论者的观点这事实。他们说，“人被降低到机器的水平。他那高级的性质，他那文化的生活，都被唯物论斥作空幻的存在了。”

实际上，这说法不仅歪曲了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并且只

^① 《物理学鸟瞰》(Methuen)。

有辩证唯物论才能适当地解释这些把人从宇宙其他部分区别开来的高级性质是怎样出现的。

恩格斯对于十八世纪的机械论的观点说明道，“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空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极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①

这一种唯物论在当时反映出新兴的中等阶级的革命热情，并且，作为对于宗教和封建道德的批判，它在观念的领域提供一种攻击反动的封建利益的锋利的武器。为要反对教会和贵族的特权，把建立在人类理性上的自由、博爱、平等的主张高举起来，把理性的能力提高到代替上帝的程度。关于法国的唯物论者，恩格斯说道：“清除人们的头脑以便接受将来的革命的那些法国大人物们，他们自己也以极端革命的样式来行动。他们不承认任何外来的威权。宗教，关于自然的观念，社会，政治制度，一切都要受毫不容情的批判；一切都得在理性的法庭上声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否则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24—225页。

被抹杀其存在的权利。理性被用作测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正如黑格尔所说,那是世界首足倒立的时代;这话的意义,起先是说,人类的头及其思想所达到的原则被当作一切人类行动和结合的基础;后来,这话的意义(也是比较宽泛的)是说,与这些原则相矛盾的现实事实上是被上下颠倒过来。从来一切社会形态和政府形态,一切传统的旧观念,全被看作不合理的而束诸高阁;以前的世界完全为偏见所领导;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自此以后,迷信,不公道,特权和压迫,都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公道、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代替。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①

辩证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不同,它认定世界在不断的改变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历时不变的东西。存在和过去继续不断。就连金字塔那样“不变”的东西实际上也在变。若干世纪一过,它们也将变成沙尘了。所以我们应当用过程和运动的说法来思想,不应当用僵硬不变的东西的说法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57页。

思想，这所谓不变的东西在一种无始无终的过程中连结成由简入繁的一种发展。

我们知道现在的地球与许多百万年前的它大不相同。地球从一团火热的汽体经历许多阶段，才可以使生命的简单形态生存其上。有生命的东西又经过无数次的转变，才达到人类意识之高度发展的阶段。

象这种作为自然界之重要性质的发展的见解，在进化之一般理论中有其科学的根据。但辩证唯物论不只是对于进化论的一种信仰。大多数人都熟悉并接受一个进化的宇宙观。辩证法以一种比较有理解力的方式指明这种发展，因为它说明，一种发展的过程不只是一种量的增加，却含有质的改变。是故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不同的阶段来，在每一阶段有质地新的东西出现，因为这种东西是由过去的东西产生的，所以不能从它本身上得到充分的说明。

照这样子，生命已经由无生命的东西中发展出来，虽然它的存在之法则含有化学的和物理的法则，它同无生命的东西之质的不同却在特殊的生物学的法则中表现出来。生命不能完全还原到物理的和化学的用语。它是在分子和电子的结集以外的一种东西，而辩证法唯物论所特别注意的正是这种“东西”，因为对于新质阶段之起原的研究，足以阐明一切的改革和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中进行的那些改革和变化。

假如在一种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有了质的改变，新的东西便出现了，在未达到这阶段以前，这发展在性质上乃是

量的——那就是说，它采取在一定方向上继续改变的形式，并没有新的质加入这过程中。但新质的出现也是这过程之连续上的中断。一种变化在全部过程中发生了。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了，量的改变让位于质的改变了。

自然界满有量的改变突然转为质的改变的例子。我们可以引一个黑格尔给的常见的例子，如下：

“据说自然界没有突然的跳跃，大家相信一切东西都是由逐渐增加或减少造成的。但也有突然由量变为质的这种事。例如，水并非逐渐因冷变硬，并非先变成软的，终于达到冰的硬度，实际上是一下子变硬的。假如温度低到某一度上，水便突然变成冰，那就是说，量（温度的度数）被变成质了——这东西之性质上的改变。”

普列汉诺夫在与一个什么提浩米洛夫 (Tikhomirov) 论战时，对于排斥突变说的渐变说加以讥讽的论列。“现在让我们假设提浩米洛夫把满满的一锅水放在火炉子上。当水的温度从三十二度升高到二百十二度，水依然还是水。他自然不会为任何突变吃惊。但当温度达到一个危险关头，于是忽然一下子（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一种变异发生了；水被变成了汽，宛若它的想象曾经进行过有力的革命。……又如提浩米洛夫在观察一种变形的昆虫。蛹的变化缓缓地进行，不到一种新秩序的时间来临，蛹依然是蛹。观察者欢喜地搓手，说道：‘这儿一切都照应有的情形进行。社会机体和动物机体都不会有在无机世界我不得不承认的那种突变。无论如何，当大自然创造生物时，她已经恢复了她的清

醒。’不过他的高兴不久便被打消了。在一个晴好的日子，蛹也进行了一种‘有力的革命’，在背上裂开了，并且进入一个蝴蝶的世界。”^①

在生物学上，种类的变化起于突变，已是大家早就知道的了；逐渐结集成万万年的变异以产生新种的旧观念不再为人们所接受了。固然，变异的结集进行下去，不过，为辩证唯物论所指出的，新种的出现却起于由量到质的变革。

现代物理学也证实了这见解。是故普朗克写道：“近来的发见已经表明〔大自然不会跳跃〕这命题是与热力学的原则不符合的，除了表面上是感人的之外，这命题的效力就要不能存在了。大自然确乎象是一跳一跳地运动，样子也诚然是很奇怪的。……无论如何，量的假设已经引起这样的观念：在自然界，变化的发生并非继续的，乃是一种爆炸性质的。”^②

社会对于这猛烈的突然变化的事实也并非例外。马克思在社会发展方面已经指出，社会的变革与自然界的变革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在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前，发展是逐渐而继续的。随后一个爆炸发生了，解放了那改变全部社会基础的主要的社会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中，有一种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在进行。生产的聚集和集中化，无产者的队伍的渐增，以及资本家统治者的数目的渐减——

^①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100—101页。

^② 《物理学鸟瞰》第78—81页。

这些都是量的因素。但最后，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以内，“生产手段的集中化和劳动的社会化，终于达到这样一点：它们变得与它们那资本主义的外壳不相适合。这外壳被炸碎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丧钟响了。掠夺者被掠夺了。”这并非马克思一厢情愿的想头，已经由下面的事实证明了：在六分之一的世界上，工人们已经破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的桎梏。

假如发展是现实的一个重要特征，引起发展的冲动之性质的问题便发生了。我们已经知道世界上的物质并非彼此严格地划分的。它们是密切地关连的，并且不断地把我们所知道的它们那新方面和新关系呈现给科学。

矛盾的倾向（它们的斗争促进了发展）在这些过程中统一起来。人类的生长是生的力量与死的力量间的斗争之一种过程。身体的化学作用表明相反的过程。消化和分泌表明矛盾怎样统一起来，它们怎样在一个过程中交互贯通。

没有矛盾便没有发展。发展是自动的，由内在的矛盾的冲突产生的。假如在未成地球以前的火热的汽体中，没有矛盾的凝结过程发展，那末使生命成为可能的条件也就永远不会发展了。

既然矛盾的统一是一切过程的一个重要性质，那就是说，既然过程自身把相反的倾向结合起来，内在的发展的冲动就从这些矛盾的斗争中向前进行。是故相反的因素是动力地相关的；不应当把它们看作呆板地并列着的，却应当看

作交互贯通的，负变正和正变负的，所以发展的路线取一种螺旋的形式，愈旋愈高，由正变负，然后由负变正——不过这是一个新的正，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一个更高的阶段。

恩格斯用下面的例子把这过程解释明白：“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小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它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将第一次使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力学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①

因此原始的公有状况为私有财产所否定——那就是说，由公有制向它的反面（私有财产）的一种转变。但私有财产又变成生产的一种桎梏了，于是它又转向它的反面（公有财产）——那就是说，回到原始的状况，但在一个更高的平面上。私有财产这否定自身又被否定了。这过程便叫作“否定的否定”，它所指的非仅一种状况的废除，乃是一个更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178页。

的发展阶段借了斗争而得到的实现，因为第一个否定便是引起第二个否定的那一个。因此恩格斯申辩道：“现在有人 would 提出反驳，说这里所实现的否定根本不是真正的否定；……如果我把昆虫踩死，我也就否定了昆虫；如果我把正数 a 涂掉，我也就否定了正数 a ，如此等等。或者，我说玫瑰不是玫瑰，我就把玫瑰是玫瑰这句话否定了；如果我又否定这一否定，并且说玫瑰终究是玫瑰，这样能得出什么结果来呢？——这些反驳其实就是形而上学者反对辩证法的主要论据，它们同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完全合拍。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的限制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得使第二个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怎样做呢？这就要依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质而定。……如果我踩死了昆虫，那末我虽然完成了第一动作，却使第二个动作成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①

对于现实之辩证法的了解在十九世纪才受到重视，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181—182页。

界是悠久的进化过程的产物这见解那时正在流行。过去处理僵硬不变的事物之古希腊逻辑，用来处理宇宙之变的节奏，便觉得不合用了。亚理士多德曾经立下三条定律，这三条定律对于一切事物的推理给了一个规模，直到十九世纪的开始，这三条定律几乎完全没有改变。

他的第一条定律规定一切事物的同一性。它把那事物与宇宙其他部分区别开来，指定甲就是甲，具有其清楚而特殊的性质。第二定律，矛盾律，指定甲只是甲，不具有任何别的性质——那就是说，它不是乙。在第三条定律中，指定在甲和乙之间没有中间的说法。于是把矛盾排除，把世界的物体看作僵硬地分立的，并且是在固定的模型中创造的。

但因大家逐渐知道，物体之较高级和较复杂的形式是与较低级和较简单的形式相关连的，过去认为一种神的创造行为的结果，实际上却是进化之悠久过程的产物，因为这种知识，一种能表现这事实的逻辑之需要便发生了。

在十九世纪，黑格尔作出一种逻辑，这逻辑与那时流行的进化观是比较地适合的。

他称他的逻辑方法为辩证法，沿用希腊的说法，意思是辩论的艺术，在这方法中，借了意见之否定和冲突，一种矛盾的综合发生了，这综合是接近真理的。

黑格尔在矛盾因素的斗争中看出发展的原因。一切事物都在转变的过程中，都在流动的状况中，这一点使得亚理士多德的逻辑范畴不适于包容它们。甲是甲，但它也正在

变向非甲。它并不是与宇宙其他部分清楚地划分的，却是密切地相关的，同时具有别种东西，并且，在矛盾过程的发展中(例如地球的变冷)，变成新的存在形式。

矛盾所在以活动的事物，黑格尔称之为正题。那矛盾呢，他称之为反题；矛盾在一种新的综合中的融解呢，他称之为否定的否定。

全部过程被适当地表现作正题，反题和统一，统一指明全部过程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之提高。

不过，黑格尔是一个唯心论者。他把全部进化的过程看作观念或绝对精神的展开，这种观念从无始以来便已存在了。物质的世界是这观念的创造，这世界的进化则表现观念用以显示它自己的阶段。

在真实的世界中的斗争和矛盾之过程，一步一步地把绝对观念表明出来，当每一阶段，因矛盾的成熟而变为陈腐时，指出了一个新阶段的需要，它便变得不真，因而不合理了。因为，黑格尔说，“凡是真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真的。”

在黑格尔的信徒中间，发展出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群人，他们反对黑格尔哲学之守旧的用途。借助黑格尔的真的便是合理的这格言，普鲁士政府的拥护者发现这政府存在的理由。它是真，所以是合理的。所以是当时最好的政府了。

这一点，如恩格斯在他所著的《费尔巴哈论》中所说，乃是对于黑格尔的曲解，因为使一件东西真的并非是它实际

的存在，依黑格尔学派的见解，乃是对于它的需要。假如它已经变得腐旧了，因而变得不需要了，于是它也就变得不真了。

随着德国中等阶级的觉醒，青年黑格尔派开始批评宗教信条了。他们中间最前进的便是费尔巴哈。他的《基督教的本质》对于基督教作了一种锋利的批评。他宣称，并非上帝依照他自己的像貌造人，却是人依照他的像貌造上帝。但费尔巴哈不曾看出人在他的生活过程中是一个能动的参加者。他把人看作环境压力的一种被动的玩物，既不能反应他的存在，也不能改变他的存在的条件。

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间，把辩证法转向历史的研究，却是马克思的功劳。他指出历史对于辩证法的过程也并非例外，社会的发展因矛盾因素的斗争而前进。在不断要求发展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条件——依据生产技术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以及类似的上层构造的因素——的矛盾中，他发现了社会改革的原动力。

但是为了要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了解真实的世界，马克思首先必须剥去它的神秘的外壳，并给它一种唯物论的内容。马克思叙述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不同道：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

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上面关于辩证唯物论的叙述，格外注重心理过程与经济世界过程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不把两者参照起来研究，便要产生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片面见解。我们知道，这一点对于精神分析学的战争论是格外真实的。

辩证地解决问题的精神分析者，会把他那科学的发现与现今的社会问题关连起来。他将看清精神分析学在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之束缚中解放社会的任务上的真价值。他将了解他的病人的特殊病症，在反映那要求意识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217—218页。

表现之无意识的冲动以外，更与一般经济的现实和社会的现实有关。因此，他将愿意认识施行压迫的环境的性质，以便他能帮助新社会制度的创造，弗洛伊德说，这种新社会制度在精神分析之普遍的应用上是必要的。

同时，关于辩证唯物论之真实性的最好证据，可以在精神分析学本身上找出来。

第十一章 辩证唯物论和 精神分析学

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想的运动和发展的总法则的科学。”假如这话是真的，我们应当可以发见，心理过程是以辩证的方式进行的。并且，当我们转过来看精神分析学说时，我们便发见，精神分析学者所意识不到的，其中有许多心理行为的例子，如不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便几乎不能理解。

讨论下一件东西及其对立物的统一罢。形式逻辑者问道，一件东西怎能是它本身又是它的对立物呢？两者之中应当有一个被排除。但辩证逻辑却注重这事实：没有永久不变的东西，就在这东西的内部含有它自己的否定。恩格斯用下面的话说明这一点道：“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61页。

但这样一种主张，对于一个精神分析学者，是（或应当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弗洛伊德用几个有趣的例子指明语文怎样原始地反映对立物的密切统一。他说，“许多语文学家主张，在最古的语文中，相反的字如强、弱——光、暗——大、小——都用同样的语根来表明。在拉丁文中，有这样两歧的字：Altus = 高或深；Sacer = 圣或邪。

“作为语根变化的例子，我举出以下几个：Clamare = 喊；Clam = 静，默，秘；Siccus = 干；Succus = 液；在德文中，Stimme 声；Stumm = 哑。”^①

弗洛伊德用这些例子来说明相反的东西在梦的形成上的运用。往后我们将看出在梦的形成上所包含的心理过程对于辩证法是何等的重要。但让我们先从辩证法的观点上讨论一些别的精神分析学的概念罢。

在大自然的领域，辩证法代替了僵硬的各别的事物观，而注重其原动的交互关系，注重其由此到彼的形式上的变迁，与此相同，精神分析学，在心理的研究上，作为辩证法之一种特殊的实施（虽然是无意识的），攻破了那把心当作印象之被动的容受器的呆板的观点。它提供一个新的观点，把心理生活当作要求着的和压制着的力量之一种交互作用，以冲突为中心。心被看作动力地交贯的相反的因素——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因素——之统一，由这些因素的交

① 《引论》第 150 页。

互作用中产生出丰富的不同的人类思想和感情。我们一考虑爱德，自我，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便可以看出这种交互作用的辩证法的性质。

我们已经知道，爱德冲动由于现实给与其满足的阻挠而起的变化，自我被形成了。换一种说法，现实与爱德起了冲突，把爱德的一部分变成它的对立物，因为自我是有理性的，而爱德是无理性的，自我是合逻辑的，而爱德是不合逻辑的，自我有一种现实的原则，而爱德却依一种快乐的原则来寻求满足。这种借了两个相反的因素(爱德和现实)之冲突而起的变化乃是一种辩证法的过程。

复次，爱德自身又结合两组相反的本能：伊罗斯或生的本能，死或破坏的本能，它们的混合形成每个本能冲动的一部分。死的本能寻求一种无生气的状况之恢复，而生的本能则要求机体的建设和保持。生，当作一种过程，包含有生的力量和死的力量的斗争，死与生共同进入体内，从辩证法的观点上看来，这两点都几乎是很平常的。恩格斯说，“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①

因此弗洛伊德对于本能的分类，应当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得到无所犹豫的接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61—62页。

弗洛伊德另一个重要的辩证法的概念是压制作用。这种作用起于现实要求与爱德要求之冲突，也是无意识的自我的功用。它以一种量的因素引起质的改变，因为它强迫无意识的冲动改变作行为之意识的状态，具有移置，升华，反动形成等形式的意识行为乃是爱德冲动的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当压制已经达到一定的强度时便发生了。这是很显然的，假如压制是轻的，假如本能冲动不与现实的要求十分冲突，那末意识的表现与无意识的冲动自身不会有很大的差异。但当无意识的冲动与社会现实的要求强烈地冲突起来，那末压制便量地加多，而意识的表现就要与被压制的冲突成为质的不同了。弗洛伊德对于造成神经病象的量的因素说明如下：“你们将知道……我已经把一个新的因素引进病原的线索中——这就是量的因素；我们也应当常把这个因素计算在内。对于病原的条件一种纯属质的分析是不够用的。……我们必须知道，两种相反的力量，一定要达到相当的强度，才会发生冲突。……这种量的因素在抵抗神经病的能力上是同等重要的；一个人患不患神经病，全看他能够阻止多少未发泄的基力(libido)，也看他能把多大一部分的基力从性的方向升华到非性的目标上。”^①

为要使这压迫的例子明显，我把超自我与自我混合起来，以代表反对爱德本能要求的客观力量。实际上，被压制的冲动之变化与现实的要求之间的差异，并不如它与现实

^① 《引论》第313页，着重号为弗洛伊德所加。

加超自我的幼稚的道德之间的差异那么大。凡在压制大部分由现实或强大的自我来决定的场合，改变了的冲动将具有一种升华了的社会性质。若在超自我的道德为主的场合呢，我们将在意识的生活中发见对于慰藉的幻想（如宗教）之依赖，以及对于现存社会制度的屈服，这种屈服大部分由于感情地接受它的组织与超自我之间的同体观。

现在我们转向弗洛伊德的梦生活的理论。在梦中，被压制的冲动得到醒时所不能得到的多少的满足。在这意义上，梦生活是醒生活的对立物，黑格尔派所谓“别种”。梦生活的心理表现形式是醒生活的心理表现形式之对立物。在后一形式中，思想是一般的，借了同质的结合形成了观念，观念是由具体的东西抽象出来的。具体的要以抽象的说法来了解，但在梦生活中，抽象的观念却以具体的形式来表现。

这种用抽取一般的质来应付经验的办法，我们已经知道，会把本来活动的东西看作静止的。梦生活却相反的以一种高度戏剧化的动作来表现它的内容。在醒生活中，我们把一切东西看作彼此分离的各别的，因而就大体来说是非辩证法的。奇怪，梦生活却仿佛能把思想过程的辩证法的性质更亲切地反映出来，因为它在一切东西中间看出那样一种密切的交互关系，使它毫不踌躇地运用一种东西来象征另一种东西，自醒生活看来，这两种东西是连半点关系也没有的。它能把最矛盾的因素结合起来。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最惊人的发见之一便是梦的工作处理潜梦中的对立

物的方法。……相反的与相同的受到同样的待遇，具有用同一显在因素来表现的清楚的意愿。在容许有一种对立物的显梦中，一种因素可以仅代表它自己，可以代表它的对立面，也可以同时代表两种。”^①

由上所说，似乎可以断定，借了分析，梦的生活显出意识行为后面的冲动之基本性质，照样它也可以表明思想过程之基本地辩证法的性质。

因此反映现实的意识的自我呈现一幅大体非辩证法的图画，把外部世界的过程表现作僵硬的各别的。这一点已为恩格斯见到，他说道：“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②这对于辩证法的学者们诚然是一种似非而实是之论：辩证法的思想并不反映现实之辩证法的性质。但我们已经知道，非辩证法的思想是含在意识中的，而伏在下面的无意识过程却是辩证法的。只有借了意识行为下的无意识基础之认识，才能解决辩证法的思想流露于外的非辩证法的性质之矛盾。但还有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意识的思想要采取一种非辩证法的形式。要解答这问题，我们应当再说明一下意识的自我与爱德和现实的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爱德冲动的压制，目的在不使它们惊扰

① 《引论》第150页，着重号为弗洛伊德所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卷第54页。

自我之意识的社会化的态度。但这些压制是对于那拒绝无意识的冲动之要求的顽固现实之反应。所以，自我在一方面受要求无条件满足的爱德冲动的攻击，在另一方面它了解在现实上爱德冲动的满足之不可能。我们在研究宗教时已经知道，先是自然力的强大，后是经济力和社会力的强大，在人类心中引起一种软弱之感。他觉得他自己不能控制那些力量。于是去寻求神的保护。在自然力或经济力占优势的时候，现实对自我显现作它无力控制的东西——这东西不承认自我代表爱德所作的要求，却要求对爱德冲动加以压制。

面对着不肯通融的现实，自我必须限制爱德冲动，修改它们在意识生活中的表现。但这压制的任务是并不容易的。有一些时候，它只能在意识生活中用反动形成的办法来发展相反的态度。这种反动形成借了夸大某种心理倾向与意识标准的不相容，来加强施于爱德冲动的压制。在这儿我们对于自我加给现实的非辩证法的外貌得到一个线索。因为现实与爱德冲动之不相容，自我便对爱德夸张现实的顽固性。它把现实表现作僵硬不变的，作为加强它的压制的一种方法。意识的表现之非辩证法的性质，乃是现实歪曲的产物。我们在研究宗教时，熟悉现实在意识的心中歪曲。恩格斯说，“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恩格斯所说，由我们的心输入大自然中的那想象中的

僵硬性和绝对性，不也就是外部力量之一种“幻想的反映”么？我觉得对于人们的思想为什么是非辩证法的这问题，我们既然知道了思想在基础上是辩证法的，便不容有别的答案。并且，我们也可以把现实愈来愈合于辩证法的见解与人类在其自然环境中所作的征服工作关连起来。大自然不再是那么无法控制了，因而自我也将把它表现得没有那么僵硬了。不过这种辩证法的观点之展开还是很有限的，因为，虽然自然界的力量大部分被征服，人们依然生活在经济力的控制之下。在那样的状况下，人们的社会组织表面上“好象是由大自然和历史强制规定的”^①；因而在外部现实中依然存在有那种顽固的性质，使自我发生一种软弱之感，使它把现实反映作固定的和不变的。

但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不仅是自然力的主人，也是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的主人了。外部的现实不再显现作人类之顽强难驯的敌人，而显现作人类之听命的仆人了。因为许多不合理的限制和压迫从此得到解放，人类的心将把现实之一切丰富的变化描摹出来了。

我们(在第八章中)已经知道，主观因素的作用在征服经济状况的任务上是怎样地成为重要的，并且弗洛伊德派用来说明这些主观因素的爱德，自我和超自我的概念是怎样地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十分适合的。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知道，弗洛伊德派的无意识怎样地证明了这以下的见解，

^① 恩格斯语。

思想过程是辩证法的，精神分析学者（虽然完全意识不到这事实）用了辩证法的观念来说明心理生活的现象。第二步是要表明，一个革命者，在他每天传播他的革命观点的工作上，与许多不合理的阻碍和压制相接触，这些阻碍和压制使人们不能接受合理的政策，对于这样的革命者，一种精神分析学说的知识是何等的重要。

第十二章 实践举例

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却并不是宿命论者。一个重要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说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必然性的了解，是与我们的敌人用来诬蔑我们的机械的宿命论全然不同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必然性，是借了一定社会条件下，活着的人类意志，意识地反应那些条件，意识地从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看出的各种可能性中间选择它们的路线，照这样子在实践中完成的。”^①

“活着的人类意志”之重要的注重，特别表现在共产主义者对于一个革命政党之作用的认识上。一个革命的政党所包含的是那些意识到给资本主义以革命的摧毁之历史的必要性的人们，也是那些以各种可能的方法激发工人阶级的斗争，使这斗争终于采取直接向现存制度挑战的途径的人们。给予工人们反对资本家侵夺工时和工资之自发的斗争以意识的指导，并把它们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群众运动。这样一个政党必须精密地组织起来，训练起来，理论地武装起来，以便它能如列宁所说，象工人

^① 杜德(R.P.Dutt),《共产国际》第十二卷第十三期。

运动的脑子一般活动。革命的直接命运主要地由它来决定。在行动应当加快和决定不能延迟的时候，这重大责任便集中在党的重要机关上，所以比较少数的个人方面一种错误的或延迟的决议，会严重地危及革命。例如，在一九二三年，在共产国际的估计中，一种革命的条件已经在德国存在。革命所以不能成熟，共产国际归咎于德国共产党领导方面的软弱。^①直到现在的一九三五年，十二年以后，德国工人阶级还在忍受资产阶级以法西斯的野蛮手段来施行的极端报复行为。

假如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发展的方向之一般分析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便是靠得住的。主观的因素，例如领袖们的优柔寡断，会严重地延迟革命的成熟，但却不能阻止革命之终于成熟。

克服了这些缺点，才能使社会主义成为必然的，不过这种克服工作，仅只知道社会生活的一般现象——阶级关系等——是不够的；仅只知道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以上两种知识对于一种宽泛的历史的透视是必要的）也是不够的。指导“活着的人类意志”来选择到社会主义之路径的迫切任务，避免把领导的责任放在不适当的人们手中的迫切任务，必要研究在一切人类行为中（从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到人民大众最后的革命高潮）活动的内在的心理过程。

事实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只能保有它所代表

^① 参考皮阿特尼兹奇 (O. Piatnitsky) 著《德国的现状》(Modern Books, Ltd.)。

的阶级的一小部分)的存在,乃是主观因素之极端重要的一种反映。因为斯大林说,党“是工人阶级最好的分子的集合点”;所谓最好的是指政治的了解,革命的决心,自我牺牲的能力,等等。换一种说法,党包括那些主观地在上述品德方面特出于工人阶级之上的人们,所以不承认密切地研究主观生活之重要,而安于一个人的心理生活是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之反映的笼统的说明,便是忽略了那使社会发展过程复杂化的主观的差异。这是“机械的宿命论”的一种形式,这种宿命论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使得“活着的人类意志”之研究成为不必要的,而社会主义却是必须借了这意志才能成功的。

我们可以同意,经过若干年后,社会进化的一般规律借助人类的行为会显现出来,将来的历史家将看出因失败和困难而曲曲折折的但在方向上却显然可辨的一般发展的线路。

但在现在的我们看来,这些困难和失败也许便是若干年的退却;它们也许是由于发展过程中偶然的遭遇,总起来看,这种遭遇对于全部发展仿佛是算不了什么的。但历史发展线路上算不了什么的曲折,若用人类的痛苦和忧虑来计算,对于那些直接有关的人们,也许便是极端可怕的了。我们生活在将来历史家称为“革命时代”的人们,却不能象他那样把年限看得不关重要;不拘怎样,只要我们能减少新社会的产痛,我们便应当赶紧去设法减少。

因此马克思对于偶然事件在历史发展中的影响,作了

下面有趣的说明：“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①德国的工人阶级正在用血来偿付站在他们革命运动前头的领袖们那悲惨的意外事件。他们至少禁不住再来一次象这样的意外事件。但“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是不能仅用社会的条件或经济的条件的用语来了解的。对于表现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上的心理过程要加以科学的透视；对于精神处理那由外界接受的官觉印象之态度要有一种知识，对于精神为了使无意识冲动得到表现所采取的主动的手段——代替作用，升华作用，反动形成等——也要有一种知识。假如马克思主义者要意识地加快历史过程并免去不必要的延滞，以上几种知识是应当有的。在他的日常工作中，他要以不同的态度应付不同的人；要运用机警，聪明；要酌量主观的变异。他照这样子运用心理学上的实验的方式，但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会满足于不根据科学的方式，他将要求知道潜伏在意识行为下面的机体。

因为精神分析学主要地是人类行为之无意识的动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在它的理论中，对于因与各个人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 393 页。着重号为本书著者所加。

触而发生的日常问题，得到许多解答。

但因为领导作用是这样的重要，它大概要算革命组织上的主要问题了。因此，让我们把它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考察一下罢。

我们的超自我的研究告诉我们，领袖是幼年的父亲的代替物，含有父亲万能的幼稚概念。在他的保护能力方面，他被与母亲视为一体并受到一样的爱慕；在他的指挥下，谁个敢于威胁这种崇拜，便受到最凶残的攻击。因此把对母亲所怀的淫欲投射到敌党身上，并以之为攻击冲动的标的。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一类人在民众上面操有的感情的势力，一参照精神分析学对于超自我作用的主张，便可以明了了。

作为一种区别的制服的黑衬衫，把穿着的人们结合成分享对领袖的爱和憎的家庭分子。反犹运动及加于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迫害，把攻击的仇恨的冲动从领袖身上转移到别的团体身上，用淫虐狂的行为——时常公然是属于性的——来发泄这些冲动。因为法西斯国家的内部困难愈来愈增加，这种攻击倾向之转移的需要也就愈来愈增加。在德国，一个新的反犹运动开始了；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大声恫吓某一外国的敌人。结果，因为这些领袖们不能给予他们所应许的保护，这种无能就要反撞到他们自己的头上。这种淫虐狂的冲动，不再能用迫害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来满足，就要转向内部而毁掉这些领袖们。

凡要作领袖的人，都要吸引幼稚时代对父亲的感情态度。任何以领导工人阶级为目的的党，都应当了解领导作用

所含的心理因素，因为领导人类达到一个历史的新时代这艰难任务，它不能轻忽任何一丁点的科学发见。

讨论到领导的问题，一个革命政党应当把这问题大致作成下面的样式：“在领导作用所含的心理过程的基础上，我们怎样才能充分发展我们对于劳动大众的领导呢？”

正如一切提出来要求科学解答的问题，它的答案主要地依赖对于一切特殊形式以及存在于任何地方的现象之考查。那就是说，对于各种运动的领袖不拘是法西斯的，宗教的，社会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都应当加以研究，以发见使那领袖为他的信从者所欢迎的共同因素。

我们已经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把领导作用界说作与儿童时代的父亲有感情关系的能力。不拘这个界说得到同意与否，某种感情因素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一种求保护的需，想爱什么人（由他肩起我们的负担并接受我们的责任）的需，乃是领导作用的普通因素。现在且不要谈某一些领袖用欺骗的手段使人民相信，他们能并且将给予这种保护。事实是他们为人所信仰，因而吸引住我已经说过的感情的忠诚。

领导作用的需是普遍的这说法是难以否认的。有时这需也许合理化作对于爱和真理之抽象理想的尽忠，或合理化作对于一个工作优良的人的崇拜，不过这需的感情性质常是很明显的。

各种运动的、各种团体的和各种宗教的领袖也容易被人们认定为具有非常性质的人。有时这种信仰是有意造成的。

法西斯领袖们惯于表演的戏剧性的检阅，环绕着他们的距离和神秘性，至死不疑的服从之要求，都是用来把他们弄成适于充领袖这脚色的超人的手段。有时更围绕着那些人编织传奇的故事，以夸张他们独具的性质。连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要热烈地反对那仿佛要使马克思和列宁蒙受人类普通弱点的玷污的任何建议。

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说：

(一)领导作用的需要是普遍的。

(二)对领袖发展的感情态度证明精神分析学的这种意见：这种感情态度乃是原始的以父母为万能的儿童与两亲间的关系之移置。

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上，参照以上的事实，“我们怎样才能发展对于群众的领导作用呢？”

第一个条件大概是要把领导作用凝结成一个领袖的样子——足以唤醒必需的感情态度的人。换一种说法，我们应当为了群众把某一个人理想化，使他们可以向他寻求帮助，使他们可以爱他并服从他。

我预期有人反对，说这是法西斯的权术之反转的形式，我将回答道，事实是怎样，对于许多人法西斯主义在主观上满足了共产主义所满足的同样的需要。不同处是，一个客观地建立在现实世界上；另一个则建立在幻想的世界上。科学与宗教可以说大致与此相同。季米特洛夫(Dimitrov)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中的报告，对于共产党应付法西斯的权术上的弱点，因共产主义者轻视法西斯主义者在民

众上面操演的心理因素而有的弱点，作了一些有趣的说明。季米特洛夫说道：“我们党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最软弱的地方在于这事实：我们的党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权术反应得不适当而且太迟缓，并且直到现在我们的党依然轻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斗争的问题。……在任何环境下，我们都不应当轻视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传染的可能性。相反的，我们应当在我们方面发展一种深而且广的意识形态斗争，把这斗争的基础建立在明白通俗的论据上，建立在民众种族心理特征之正确的精密的认识上。

“法西斯主义者正在遍查各民族的全部历史，以便摆出过去一切高贵的英武的东西之继承者的姿式，同时把一切堕落的或违反人们民族感情的东西都用来作攻击反法西斯主义的人的武器。国社党的御用历史家想把德国的历史描写成下面的样子：过去两千年来，因了某一种‘历史法则’，有一条发展的路线象一条红线般的穿过全部历史，因此德国人民遂有一个民族的‘救主’，一个‘弥赛亚’，一个奥国产的某‘伍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墨索里尼用尽心机想把伽里波迪(Garibaldi)的英雄姿态加以利用，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者把贞德作为他们的女英雄来加以推尊。美国法西斯主义者夸示美国独立战争的传统，华盛顿和林肯的传统。保加利亚的法西斯主义者则利用七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人民所爱戴的英雄们——瓦西尔·列夫斯奇(Vassil Levsky)、斯提反·加拉伊(Stephan Karaj)等人。共产主义者以为这一切都与工人阶级的使命无关……自觉地

把民族过去历史上的可宝贵的东西放弃给法西斯主义的造谣者，使他们可以欺骗民众。”^①

共产主义者不仅需要把他们现在的斗争与过去斗争中的英雄人物联想起来，还应当把那些受爱戴的传统人物与现在的某一个人视为一体。这乃是法西斯领袖们成功的技术之一部分，他们自承为民族历史中英雄人物之现代的化身。

那末，假如领导作用的问题是重要的，这问题就应当以意识地审慎的态度来解决，要运用现代心理学对于与此有关的主观性质所有的一切贡献。假如心理学告诉我们，任何运动如不能提出一个领袖——他能适当的唤起（如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与儿童和两亲的情境有关的感情态度——便不能争取群众的拥护，那末，一个以其科学的立场自豪的运动便应当加紧提供这样一个领袖。假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借助于审慎的布告和宣传方法，可以被表现作人民的救主，共产党的领袖们也可以这样作。不同处当然是，共产主义的领袖们的声望不会建立在欺骗的应许和诡诈的言词上，乃要建立在领导工人们为革命奋斗的真实决心上。

列宁说，不理睬敌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方法是“犯罪的”。他说，“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

^① 《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Modern Books, Ltd.)。

要。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和有利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极大的失败，有时甚至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①

一个领袖的选定，也许有人反对，认为最好让历史去执行。恩格斯说，历史将在适当的时候提供适当的人。归根结底地说，这话大致是对的，不过我们应当记住，在历史提供适当的人以前，它时常因为不适当的人而遭受痛苦的经验。回忆一下一九二三年共产党在德国方面的领导作用之软弱；那时间是否适当呢？从拥有充分的革命力量的意义上说，是适当的。不幸，历史竟是残忍的，把一个意志薄弱的领导加在革命运动上，所以革命中途失败了。为了这缘故，一个适当的领导之存在对于革命既然是必要的，我们不能等待历史的高兴。我们应当科学地动作，应当作以往由生物学上的偶然性来决定的事。历史究竟是人类逐渐干涉那些形成他的生活史的力量们的故事，所以运用科学的心理学以成就过去听凭偶然的环境来摆布的事，乃是人类控制他自己的命运的一种表示。假如一旦觉悟，领导的选择和训练，普遍热情的唤起和领袖威信的增加，是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在革命策略上便将有一种非常的进步了。为要表明我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49—250页；着重号为本书著者所加。

并非夸大那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上的主观因素，可以引证几句斯大林的话：“这些困难是我们组织工作的困难。……借口所谓客观条件是没有理由的。既然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已经为多年的经验所证实，而工人和农民拥护这条路线的决心又是不容置疑的，那末所谓客观条件的作用就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我们的组织及其领导者的作用就成为决定性的独一无二的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今后我们工作中产生缺陷和缺点的责任十分之九不在“客观”条件，而在我们自己身上，并且仅仅在我们身上。”^①

精神分析学对于尚在准备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如此的重要，其原因便在此。它供给他们选择和训练必需的领袖之技术的开端，这些领袖应当从那妨害重要决定的不合理的倾向和强制中解放出来。正如精神分析学所宣告，一个心理分析者要想胜任愉快，他必须先用精神分析把自己从不合理的倾向中解放出来，领导成百万的工人们的任务也是如此的，应当免除由个人的感情偏好而不由工人的客观利益来决定重要问题的危险。

也许有人回答，共产主义者已经主张实行自我批评，以防范主观因素的影响了。不过，鉴于现代关于心理过程的性质的知识，仅只把意识的心转向内部便够用了么？

我们知道，意识怎样的不肯承认它那大部分内容之无意识的来源。所以那种反省的结果主要地将成为无意识冲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三卷第 323 页。

动之防御反应(defence-reactions)。

那样一种方法终究是粗糙的无益的。我应当重复地说，马克思主义者处理重要问题时不能安于一种非科学的方式，而应当了解那透过意识的行为去把握其无意识的来源之需要。

事实上，我要说，法西斯主义成长前的德国共产党所以软弱的原因之一，便是它缺乏对于有关的心理因素的认识。有一种浅薄的理智万能论，把德国的文化和传统当作反法西斯主义之野蛮行为的证据。假如大家了解意识行为不过是深伏的无意识过程之表面的反映，便不会坚持那样一种观点了。关于这一点，前面所引的季米特洛夫对共产国际所作的杰出的报告，已经加以说明了。那个报告说明了德国已经学习过的痛苦的一课。从那时起，世界各地共产党的策略都有了进步的迹象。那报告表明一个在心理上盲目的领导怎样会使革命退后若干年。它也表明这悲惨的事实：以成百万工人大众为原动力的革命政党之策略和政纲的规划，并不曾参考这些人们所拥有的主观性质。但让我们接受季米特洛夫这明察而使人不安的话罢。

“在这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提到一些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妨碍我们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错误。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些人不可恕地忽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这倾向直到现在还没有到处被克服。过去我们的党中有过这一类的意见，大意是说，‘德国不是意大利’，那就是说，法西斯主义也许在意大利可以成功，但它的成功在德国便不成问题了，因为

德国是一个在工业上和文化上高度发展的国家，具有四十年的工人运动的传统，在这样一个国家内，法西斯主义是不可能的。……我们也可以引一些共产主义者出乎意外地遭受法西斯主义的袭击的例子。例如保加利亚，我们的党在那儿，对于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的政变，采取一种‘中立的’实际是机会主义的立场；又如波兰，共产党的领导在那儿，在一九二六年五月，错估了波兰革命的原动力，没有理会毕尔苏兹奇(Pilsudski)的政变的法西斯性质，于是拖在事变的后边；又如在荷兰，我们的党建立在一种错误的观念上，以为法西斯化的过程是迟缓的渐进的，因而忽视了法西斯主战的突击。……我们在德国的同志们有许久的时间，都不能理会大众对于凡尔塞和约所具的受了伤损的民族感情和愤慨。……”^①

这些错误现在是为大家所认识了。它们耗费了成千工人的鲜血和生命。不过对于一种错误由连续的事件迫成的一种认识，就能防止错误的再犯了么？错误的真实根源需要发掘，法西斯主义所给的打击，主要地是由于革命的理论家在估计中几乎完全忽视了主观的因素。语其究竟，法西斯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一个必要的形态，并非如资本主义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它是世界史上的一种“意外”事件，只是以一种法则之单调的规律性发生的“意外事件”。它是工人阶级因其领导作用之主观的软弱而付的罚金。它是

^① 《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第17—18页。

可以防止的。它在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被防止了。大陆上的经验已经提供一种带过去学习迹象的教训，——这教训说明这事实：实际的经验时常是理论的了解之一种重价的代替物。

到处的革命运动逐渐认识，要想打倒法西斯主义，最要紧的是联合——联合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这些人们虽不免有幻想，对于良善的有益的工作却显示出惊人的能力；甚至联合那些不喜欢社会主义但要保护资产阶级的民治主义之残余的人们；而最要紧的是停止了过去形成“革命”言论之支柱的谩骂式的人身批评。

不过这些都只是唤起社会反抗共同敌人法西斯主义之最直接的最初步的工作。革命者除了在这一方向上发难之外，更应当认识那理论地了解人类心理的性质之需要，过去的失败大部分由于这种心理的性质在作祟。假如统一战线运动要拥抱人民大众在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下，那末就应当研究领导的心理学，第一是为了选择适当的领袖，第二是为了唤起那把民众与领袖们结合起来的感情态度。马克思说过（我前面也已引证过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那缺点已经影响了革命政党的政治策略，使它们太不注意人类生活的主观方面。假如革命者要除掉那种缺点，作为这主观方面之科学研究的精神分析学便是十分重要的了。假如它们要影响人类的行为，它

们就应当知道一些决定大部分人类行为的不合理的倾向。不合理的倾向的活动方式,及其影响革命者的工作的方式,有一些例子可以在这儿举出来。

马克思主义者在日常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都是与无意识的倾向在意识的行为上所操演的势力有关的。他必须克制偏见,嫉妒,阶级利益的盲目、国家的、种族的,和宗教的信仰,这些都是不易屈服于逻辑的论据的。事实是这样:一种主张的逻辑不会为人接受,假如有拒绝它的潜伏的无意识动机存在。并且,反过来说,一种很合逻辑的主张也许隐藏有用合理化作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一种感情态度。关于这一点,在勃拿尔·哈特博士(Dr. Bernard Hart)所著的《疯狂心理学》一书中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值得举在下面:

“我的病人中有一个,过去是主日学校的教师,后来变成了坚决的无神论者。他说,他在达到这观点以前,曾经对于无神论的著作下过很久的很认真的研究,而事实上呢,他却对于宗教的护教学(apologetics)获得一种惊人广博的知识。他详细地述说《创世纪》的证据,以非常的技巧排列他的论据,制成一篇连贯周密的主张。不过,精神分析后来揭露了造成他那无神论的真的错综却是这样的:同他订了婚的那女子与他的主日学校的最热心的同事私逃了。我们在这个病人身上看出,示因错综(causal complex)——对于他那成功的情敌的愤慨——借了反对过去成为他们中间主要的连结的那信仰发泄出来。一切辩论、研究和引证都不过是一种修饰的合理化作用。”

不过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大概要算资产阶级的心理了，一切社会主义逻辑的锋芒都无法穿透它。安逸的思想习惯（在它下面的是无意识的感情倾向）的用途便在于保护那种心理，使它不受侵扰，社会主义的主张仿佛透过预先存在的介于中间的感情的思想习惯，而这习惯便把社会主义者所发表的一切观念的意义都加以歪曲。任何本来不关重要的细节，只要它能供给一种反驳的根据，便被急切地抓住并加以过分的夸张。于是我们就遇到社会主义者实在无法忍受的说词，如分配污秽工作的困难啦，人类的天性不适于社会主义啦，等等。社会主义者认真的解说永远不能越过资产阶级心理最表面的那一层，而它却忙着搜索别的防御反应，以代替社会主义的逻辑将要攻破的那一些。

在那些拥护社会主义的有产者中间，最常见的是这样的人：他们所以拥护社会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可以给他们一种借口，使他们能发泄他们那被压制的冲动的怪癖，这种怪癖在守礼法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是不能容许的，于是他自己化装作解放工人阶级的热烈愿望。关于这一点，当然有许多例外。一种使人从事合理行动的适当发展的自我，会引导那样的有产者与工人阶级视为一体，作为进步的势力的代表。此外更有别的必然与一种革命运动联结起来的因素——对于性标准的反抗，对于正统派的艺术和文学的反抗——吸引各式各样的发泄主义者——幻想家和时髦派，他们都在这运动中寻得一个适当的地方来发挥他们的特性。一种革命运动必然是一种反抗运动。它有力地排斥现存的

社会制度，于是一切具有缺望的灵魂的人们，因为现社会某一些特点使他们个人感到一些不满和愤慨，遂在一般的革命反抗中寻得一种慰藉。

我们于是见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不关心马克思主义，也从不曾在一些陈旧的公式之外多所用心，他们喜欢狂喊怒叫，并且，也实在靠了他们那种过度的叫嚣，使他们得以用他们那极端的“热诚”来感动他们的伙伴们，在阶级斗争中建立一个优良战士的声望，以至作了领导人物。

我在前面一章中提到作为革命者的感情生活之一部分的不合理的强制作用。这种强制作用属于对超自我所作无意识的反抗，它们时常引起与客观环境不和谐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就使超自我得以表现它的反抗。列宁以“左派幼稚病”来形容那些以猛烈地攻击议会和工党领袖为主要策略的革命者。

这比方是特别适当的，因为反抗的感情用来向父亲发挥的幼稚的愤怒和脾气，在对抗社会的权威力量时，也同样的滥用出来。

这一类的事实表明一种人类心理学的知识是何等的重要。假如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的运动从危险的和不愿有的因素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我们便应当学习从那种不合理的强制作用中把我们自己解放出来。精神分析学教给我们这事实：无意识的动机在我们所有的人的心中活动，我们的意识的表现把潜伏的心理过程掩蔽起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课程表应把无意识的心的研究列为首要的科目，假如他

愿意使他的行动不背于现实，认识在别人心中活动的无意识的机体，与其防止那决定他的行为的客观情境的事实，不如防止他自己的错综心理。

了解那使人民容易卷入战争的心理过程，了解他们为什么对于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行动之要求，那些以反抗统治阶级之革命热情的爆发为特征的行动之要求所表示出来的漠然无动于衷，了解野心家在他们的感情上面所能有的操纵，是不是重要的呢？

精神分析学也教给我们，对于我们所接触的人们的动机不要忙着作结论——不要把政治意见上与我们不同的个人当作骗子和投机分子来加以轻蔑的排斥，当一种更多地谅解的接触也许能得到他们的合作的时候。

关于心理的防御机制 (defence-mechanism) 的一种知识将教给我们，误指人为意识的诡诈和欺骗，会激怒自我，使它采取自卫的手段——因为并非意识地居心行骗，遂使自我采取并发展一种被攻击的观点。

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两方面的事实都是属于人的。一方面描写主观的生活，另一方面描写客观的生活。马克思主义者，若于人类生活的主观方面一无所知，将永远是片面的；弗洛伊德的信徒，误解了人类主观生活所由以表现的客观环境的性质，也是片面的。这两种研究形成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起来，便能供给关于人类的充分知识。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应该把他的力量用在一种神秘的对象上。他应当知道他正在对之散布反抗的福音的

人类之真实性质。他的全部宣传应当建立在意识行为下面的感情需要的知识上。他的目的是要接触人类活动的主要动机，不过，这样作时，他应当透过意识的表面，直达潜伏的本能，这种本能一旦发动起来，便提供革命以原动力。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重要的。假如现实是马克思主义者借以形成他们的策略和政纲的指南针，那末精神分析学便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引路标。

译 后 记

本书原名 *Freud and Marx, A Dialectical Study*, 直译为汉文, 应当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种辩证法的研究》。在西方, 常把一个人的名字同他的学说混为一谈, 中国目前还不大有这习惯。为要表明本书所研究的是两种学说的关系, 并非两个人的关系, 所以改译为今名。^① 原著者为奥兹本(R. Osborn), 出版者为伦敦 Victor Gollancz Ltd.

原书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同年的九月, 在伦敦出版的《左翼评论》(*Left Review*)上, 载有伽恩(Milton Kahn)介绍林德西(Jack Lindsay)所作《精神之解剖》(*Anatomy of Spirit*)的一篇文章, 联带提到本书。根据这一篇书评来说, 我们知道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间,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至少有三派不同的意见。第一派, 如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在本书引言中所说, 是“把精神分析学看作不值得注意的”。这一派可以书评中提到的杰克生(T. A. Jackson)为代表。他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是互相矛盾的, 极端不能相容的。

① 本书在解放前出版时, 取名为《精神分析与辩证唯物论》, 这次重印, 恢复英文版原名。——三联书店编辑部

据书评作者说，杰克生所以作这样的主张，主要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有人想把这样一种心理的科学提高到一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地位，用个人内在的错综和强制之繁复的迷宫，来解说人类社会和人类关系，以为这其间的问题只有精神分析学可以解决。而弗洛伊德派关于人性(精神——the psyche)的概念主要地是唯心论的，照这样子，从表面上看来，在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当然存在有一种矛盾了。

把以上的责难用两句话总括起来，便是：(1)精神分析学主要的概念是唯心论的，不是唯物论的；(2)若把它看作一种世界观，便与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没有调和的可能。关于这两点，本书已经作过一些答辩。弗洛伊德的基本概念，所谓无意识的心等，“从表面上看来”虽然象是唯心论的，但实际上却有充分的客观的根据。本书第二章罗列了六种理由，足以说明这一点。斯特拉奇称之为“纯实验的”，我相信更合于事实。至于表面上何以象是唯心论的呢？依我推测，这是由于如奥兹本所说使用概念上的困难。若专从这一点上吹求，任何科学都免不掉不切合具体现实的责难。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把这一点解释得很清楚。他说：“你对于价值的法则所作的非难，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可以施于一切概念。虽然一个概念……表面上不能与现实直接相合……但它依然不完全是一种虚构，除非你宣布一切思想的结果都是虚构。”既然不是一种虚构，必有其客观的根据，便不能一笔抹杀，斥之为唯心论的。弗洛伊

德似乎也曾顾虑到这一点，他曾加以辩解道：“对于描摹象人类的心这样不可捉摸的一种东西的尝试，不要责备得太严罢。”

离开这种表面上的观察，进而研究弗洛伊德的根本态度，本书著者提出许多证据，断定弗洛伊德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唯物论者”，不是唯心论者。他引证弗洛伊德的话道：“科学思想在本质上是与常态思想过程没有分别的，……它的目的是要切合实际——那就是说，切合那存在我们以外的，不受我们影响的东西，……这种与真实的外部世界之切合，我们便称为真理。”此外，在本书第十章的开端，也作了类似的但更具体的说明。正为了这缘故，弗洛伊德把依据唯心论的宗教“比作人在进化过程中所经验的一种神经病”。所以仅根据表面上的观察，便断定弗洛伊德的学说主要地是唯心论的，实在算不得公道。

谈到世界观问题，我们首先应当知道弗洛伊德自己的意见。在目前，我们还只能承认弗洛伊德个人的意见能代表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在他的《自叙传》(*Selbstdarstellung*)中，时时强调这一点。他说，若干年来独学无偶，所以精神分析学上的一切重要结论，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至于他的门弟子，虽然不无引伸阐明之功，但多半时离时合，所以我们对于他们的意见还不能加以过分的重视。奥兹本为本书命名时，首先标出弗洛伊德的名字，而不说是精神分析学，大概也是有见于此的罢。弗洛伊德怎样论世界观问题呢？他说道：“依我的见解，精神分析学并不能创造它自

己的一个世界观(Weltanschauung)。它没有这样作的需要，因为它是科学的一个分枝，它可以对于科学的世界观有所贡献。不过，精神分析学却不配有这样一个夸大的名字，因为它并不把一切包括在它的范围之内，它是不完全的，它并不主张它要成为包容一切的，也并不主张它要建立一个体系。……我们同道中，有不满意这种情形的，并且要多有一点什么，使他们的心得到片刻的宁静，他们可以到他们能寻到这东西的地方去寻罢。……不过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也不能为了他们的缘故而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这一番话表明弗洛伊德对于他的学说已具自知之明。所以象杰克生一派人的责难，如果不是把他的“同道”的意见当作他的意见，便由于另外的误解。弗洛伊德说他的学说是不完全的，证以斯特拉奇和奥兹本的意见，我们能得到一种更适当的了解。大致如斯特拉奇所说，“他们〔精神分析学者〕常是单纯地著作，仿佛环境的影响并不存在，或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仿佛人类全部社会的环境，特别是经济的环境，都可以随便写作人类行为的方程式中的定数。”作为一种世界观，这缺点是非常重大的。但若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枝，那就不必加以深责了。一种合理的世界观要结合科学上的各种发见，它的方法应当是辩证唯物论的，只有认真遵守马恩传统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担负这样的任务。马恩两位大师对于任何科学部门的新发见，新材料，都要加以消化，批评和拣选。随意无视事实，抹杀别人研究的成果，断乎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我们既经指出轻率地批评精神分析学之不当，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弗洛伊德及其同道实有应得之咎。精神分析学不仅具有一般科学上常见的偏畸性，它的最大缺陷便在于它所承受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范畴。它对于辩证法的应用只是无意识的。所以，当他留在精神分析的圈子内，在一定问题上，他的态度是纯实验的，科学的，也是辩证法的。但一越过那个圈子，虽然他时时警告他自己和他的同道，不应当滥用他这初步的研究结论，但依然有不少可为反对者借口的地方。如傅吕格的论社会进步，葛娄佛的论战争，以及弗洛伊德本人论唯物史观和布尔什维克革命，都是明显的证据。由此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精神分析学，既不能完全忽视，也不能全盘接受，但应当加以研究和检选。本书著者奥兹本和《精神之解剖》的著者林德西便都是站在这个观点上的。在谈及奥兹本的研究态度以前，让我们先看一看林德西的意见罢。以下便是伽恩在他的书评中的叙述：

“不过林德西先生〔比杰克生〕看得更为清楚。他并不要调和这两种观点。他在《精神之解剖》的叙言中说道：‘本书的宗旨是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基本意见熔合起来的一种尝试。不过并非借助混合两家所发表的意见，期望有一种综合可以出现。因为这书的方法是辩证唯物论的，我必须检选弗洛伊德的意见，除去那潜伏其中的唯心论的假定；因此结果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弗洛伊德的一种批评。’”

“不过，这也并非一种正式的批评，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用语，来解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简

短地来说,本书的发展是依据下列的路线的:

“精神之改变,固然由于生产力之发展(亦即由于生产方法的改变)所造成的环境,而这改变之实际过程的研究却不过刚刚开始。精神分析学便是考察人类精神发展之机制的一种方法。

“氏族联系既因阶级社会的出现而崩溃,精神(psyche)虽用力恢复其固有的统一观,但因生产力发展的不足,阶级的社会还能继续存在,它的受挫折乃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不仅可以被代替,而且必然被代替了。所以,‘精神分析学,倘不对资本主义社会加以连根带叶的排斥,而只作枝枝节节的治疗,便要走上一条绝路。那样,它也就不能了解这以下的事实: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对于初生记忆(birth memory)只有创伤,并无解救;精神分析学无法为遍地受苦难的人们寻得一种纯洁合理的态度这感觉,并非依据一种永久的事实,也并非由于一种抽象的真理,仅只是资本主义没有前途的一种精密的反映。当资本主义的价值日见崩溃的时候,当精神分析学自身已经成为这种解体的主要见证的时候,而精神分析学依然把人当作永远为资本主义的价值所封闭的东西来看待。’”

关于林德西的意见,我们现在只能征引这么多。希望他这部《精神之解剖》不久可以译成汉文,那时大家便可以作更完备的参考。假如他对于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或解释止于如上所说,我可以在奥兹本的书寻出相同的意见,或者比较林德西在这儿所说的更为透辟。在本书第八章叙述过

弗洛伊德和大多数精神分析学著作家对于社会问题所抱的“悲观”，以及傅吕格和葛娄佛那种进步派的精神分析者的意见之荒谬和有害，然后在第十章中作了十分明朗爽利的判断：“假如在目前，有一个阻碍科学发展的过了时的经济制度，那末便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出现，这问题的解决乃是科学向前发展的条件，指明了说，便是除去那种制度的问题。科学家既然知道社会条件使他的研究不易进行，既然知道他必须依赖一个统治阶级的赏赐，而这一阶级除了用科学来毁灭生命和财产之外再不能有别的用处，他就应把他的科学问题与其社会的环境和经济的环境关联起来。要想把这一点作得适当，一种辩证唯物论的研究便是需要的了。……借助辩证唯物论给予科学家的工作的背景，便把他那特殊的问题看作一个总问题的表现，这总问题便是社会的变革。于是他看出一个进步的阶级（工人阶级）的任务，便是把这个新社会由旧社会的子宫中传送出来。他要把他的科学才力提供那一阶级使用，他明了这样作才是推进科学上的利益。”这样，奥兹本不仅指出精神分析学上的弱点，也给了一种补救的方法，那便是，由辩证唯物论的研究，进而把它的发见提供进步的工人阶级使用，以推翻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我要来说一说奥兹本的意见了。这一派的意见，虽然有许多人不同意，但也得到英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斯特拉奇的支持。他主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一种纯实验的科学，在观点上是辩证唯物论的，虽然他们自己

并不曾意识到这事实。因此它能补充并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这意见显然是与杰克生一派的想法不同的。同时他也主张,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形成辩证的对立,统一起来,人类行为才能得到适当的描写。在这一点上也是与林德西的意见不同的。不过后一种不同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换一种说法,奥兹本对于精神分析学的检选,接受的部分似乎多过保留的部分。在本书中一贯地强调精神分析学的辩证唯物论性质。除了作为研究上的逻辑的结论之外,我们更感到一种防御意味。因为,如伽恩所说,他的见解是大为其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所敌视的。精密而正确的了解,有待于细读本书,我在这儿只要作一个类似线索的撮要,使忙于实际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领会书中的大意,不为我这笨拙的译文所妨害;因为这本书原是写来供实际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参考的。

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这两方面的事实都是属于人的,一方面描写主观的生活,另一方面描写客观的生活。倘不把这两者参照起来研究,所得的结论必是偏而不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形成客观环境的经济过程,已经有了空前的发见,并加以极端的重视;但对于形成主观的原动力的心理过程,所知道的还很不充分,也不曾加以适当的注重。但马克思主义者用不着为这缺点难为情。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这缺点并非由于它的创始者见不及此,本书提供许多证据,表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发见许多关于这一方面的指示。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却是由于时代背景和客

观环境的限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不了解这种事实的，遂以为经济的因素是唯一决定历史的因素，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据恩格斯说，所以有这种误解，“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在别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屡次指出主观因素的重要。

此外，本书说明了更重要的一点，那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受客观环境的限制。马克思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正在扩展的时代，经济的因素最占优势。它主宰这时的人类，正如自然环境主宰原始的人类。在这样的情形下，主观的作用是无从发挥的。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已经到了爆炸的时期，革命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这时的人不应当继续被动地反映外部世界，而要主动地创造他自己的历史。依据辩证法的发展，我们应当把注重点逐渐由客观移向主观。所以，斯大林说，“既然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已经为多年的经验所证实，而工人和农民拥护这条路线的决心又是毋庸置疑的，那末所谓客观条件的作用就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我们的组织及其领导者的作用就成为决定性的独一无二的了。……今后我们工作中产生缺陷和缺点的责任十分之九不在‘客观’条件，而在我们自己身上，并且仅仅在我们身上。”固然这过程是渐缓的，是因时因地而不齐的，但由客观转向主观的方向是确定不移的。非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再不能拘守“人的意识为其社会的存在所决定”那一重要发

见，而有继续建设的必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宗教信条，而是一种活的科学。一言以蔽之，我们现在应当对于那与客观环境相交贯，以造成我们可得而认识的人的这主观因素，比从前增加注意。我们应当进一步了解这交互作用的实际机制和详细情形，“这些观念发生的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过去不曾考察过的，却正是精神分析学的主题。

关于观念发生的方式，精神分析学在这问题上已经走了最勇敢的一步，并且也已有了相当的成绩。马克思主义者在改造社会这重大任务上，不能忽视任何科学的成果，所以我们现在要如恩格斯注意达尔文和摩尔根在生物学和考古学上的发见，来注意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发见。用斯特拉奇的话来说，本书便是一种“有理解有效果而且有教益的”一种尝试。说是一种尝试，必然有其不完尽不周密的所在，但他那提出问题的方式和叙述问题的方法，自有应得的功绩，不会为任何局部的瑕疵所掩蔽。同时，因为这是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两者间的关系之一种研究，从精神分析学者的立场上看来，或许是更为有益的，因为它已经为他们指出了一条明路。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在这儿多说了。

依据辩证唯物论的见解，一切科学不仅是天才的闪耀，乃是有才能的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需要所提出的问题之反应。所谓“纯科学”的主张是完全不合实际的。那末，本书所反映的客观问题是什么呢？换一种说法，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精神分析学，希望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详细地征引是不需要的。约略地来说，我们希望能对以下的

问题寻得一种正确的答案：

(1) 我们的社会的存在如何地规定我们的意识？

(2) 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已经或正在成熟，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还安于旧社会那种无理的榨取？

(3) 劳动大众为什么宁愿为压迫者去作炮灰，而不肯参加那解放他们自身的革命？

(4) 社会主义的逻辑虽然锋利无比，但不能很快地为大众所接受，其原因何在？要怎样才能克服这种障碍？

(5) 反动的野心家怎样地操纵人民的感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怎样地取得并巩固其政权？

(6) 一个革命政党的领袖的选定，应当由历史去执行呢，还是需要人力的推动？

(7) 德国革命失败主要地是由于领导作用的不当，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领袖呢？

(8) 无产者的队伍中也可以有有产者参加，这些人的动机和影响是怎样的呢？

(9) 所谓“左派幼稚病”是怎样造成的呢？

(10) 自我批评的危险在于合理化作用，要怎样才能避免呢？

以上所举不过是几个显著的例子，挂一漏万是免不掉的。然总可以看出，这些问题在目前，比在马恩时代，以至比在过去任何时代都迫切得多。得不到适当的解决，会使当前的革命遭受重大的损失和挫折。怎样去解决呢？科学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倘不满足于传统的本能的半意识的知

识体系，那末，对于精神分析学之一种虚心的研究将是十分重要的了。

最后，译者不愿讳言自己在这两种学说上的素养之不充分，专就译事而论，也总算竭尽了绵力。原著者为要说明这两种学说是互相补充的，所以引书甚多，目的在使读者可以自行看出两者中间辩证法的统一。所引的书中，有几种已有中文译本，但在译者手头的也不过三四种。翻译时尽可能地参考别人的长处，但为了保持笔调的一致，而且也很少完全同意的地方，结果还是重新译过。至于采自他书的译名的确是很多的，现在不能一一标出。比较特别的要算用“基力”来译 libido，乃采自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据他说，所以不译作“性力”，为的是适合容戈 (Jung) 的定义。我则另有一种见解，我希望“基力”比“性力”更能表明它那能变的意思。它本身是性的，但可以升华作非性的。还有，把 id 这一个字译音作“爱德”，是由我创始的，因为手头没有别的译文可以采用。这个名词乃是用来代替“无意识”的，目的在表明这所指的不是“一种精神的地域”，而是“精神自身所有的一种性质”。“无意识”这名词，乍看象是不合逻辑的，在中文上更易使人误解；但它也有它的长处，它不象“下意识”那样更多“方向”“地域”的意味。

因为书中提到弗洛伊德的反抗精神，我参考了一下他的《自叙传》。奥兹本把这种反抗精神归因于童年威权的影响，也许是对的；不过我相信，种族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

因为是犹太人，他的祖先从十四世纪起便受迫害，漂泊了五百年来，才定居在奥国。他于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比马克思迟三十八年零一日）生在梅衡（Maehren）。这地方原属奥国。第一次大战后划归捷克，现在又是德国的领土了。爱德既然能保存遗传下来的种族的性质，他的祖先所受的影响，必然也及于他的身上。而更直接地却是他幼年的遭遇，如《自叙传》中所说：“余籍犹太，与有国者立，竟下一等。人卑视我，随向可见。……未同恒人，共受权利。……余初涉世，即逢横逆。每日所接，俱属异己。势惟凭一己胆智，奋竦而往。此药石也，后来稍能自持，不为世屈，未始非得力于是。”对于他那种反抗精神的由来，似乎没有比这几句话更切近的说明了。奥兹本说，这种精神只有在革命斗争的途径上才能得到适当的满足，也诚然是不易之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在宗教的和习俗的见解之反抗上，弗洛伊德对于革命者这称号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如上所引，我所参考的《自叙传》，是章士钊的文言译本，除了具有文言自身免不掉的模糊笼统之外，章氏译书的态度，我也不能赞同。例如，他把 paranoia 译作“华胥狂”，把 free association 译作“自由因及”，把 autoerotic 译作“自适其适”（1）都难免使人莫名其妙。而更荒唐地是把 compromise 译作“龟兹之道”，并加以注解道：“龟兹之道，得半之意，义借《汉书》龟兹王半汉半胡事，谓窟藏之思，不得由正道出，故取旁门，发为症候，是得半也。”这不是译书，简直是开玩笑。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一日译者记

再版题记

这个译本于一九四零年六月出第一版，翻译工作的大部分却完成于一九三九年冬季，便是说，从开译本书到现时，已经过了整整七个年头。这也是我久病之后第一件翻译工作。这工作一直继续到现在，七年之间，很少间断的时候。我在别的地方说过，我对于翻译工作，时时在学习，时时在求进步。以今视昔，究竟有没有进步呢？这要留待读者判断。不过，以现在的我，看七年前的这个译本，不免有多少感想，趁再版之便，在这里谈一谈吧。

我为什么翻译本书，或我对本书的看法如何，大致已见于七年前所写的“译后记”，现时没有多少可增益的。就翻译技巧而论，我可以这样说，假如现在要我译这一本书，我可以译得比过去自由一点，便是说，不再拘守原书的句法，可以把一句译成数句，力求合于国文习惯，使读者易于了解一些。因为，我现时觉得，理论书与文学书不同，至少在翻译这样一本书时，原文风格的保持，不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译本再版时，我对照原书看过一遍，不曾发见整句译错的地方；或许是我的学力在这一方面没有很多进步的缘故吧。若干字词的不妥，已经一一改正。至于其中的欧

化句法,决定不去改动。因为改动起来,需要前后一律,结果等于重译,目前没有那么多时力;书店的纸型也不可以随便作废的。

此外,假如有人读这个译本时,觉得太生硬,恐怕这不仅是在文字的关系。本书的内容,精神分析与辩证唯物论,尤其是前者,离着在中国普及通俗的程度,似乎还远得很呢。译者纵然能把所有句子改得合于国语习惯,至于思想和术语,那是非尽可能保持本来面目不可的。在一定程度之内,内容决定外形。我由此处明白,以鲁迅先生的笔力,翻译起文艺理论来,不但与他平时的写作不类,也与他所译的小说不类。在这种地方,一个译者虽然一心想为读者省力,也是无可如何的。与其圆熟得失真,不如拙笨一点,使认真的读者更能获益。

为本书作叙的约翰·斯特拉奇,本是很有名的左翼理论家,有不少著作已经译成汉文,也有不少人得到他的著作的益处。但是,在战争期间,不知怎样,他右倾起来,最近竟作了本质与保守党相近的工党内阁的部长,显然背弃了他过去的立场。战时消息阻绝,留居上海的人,无从详知他这转变或堕落是怎样弄成的,胜利后也不曾得到可供参考的资料。这在消息灵通的地方或人们,当然以为陈迹,不愿再去提起了。不过,参考到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由杰出的理论家和历史家,堕落为反动派,以至成了“叛徒”,也就不必过分诧异了。但是,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虽然背弃了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早期著作,依旧可供革命后进学习。对

于斯特拉奇过去的著作，我们似乎也有加以批判的接受的必要。为了这个缘故，本书再版，依旧留下他的“引言”。如果他的话有恰当可取之处，我们不应因人废言。可以说，那是与现时作部长的斯特拉奇无关的。因为真理留存天地间，不是任何人可得而私有的呵。

再版本封面插图取自《精神分析引论》。据该书第八章内说明，原图为名画家史外因德(Schwind)所作，藏在慕尼黑的沙克画廊。这里用的是复制品。画名“囚犯的梦”^①。弗洛伊德用这幅画作《精神分析引论》的插图，意在说明梦可由强有力的情境发生。解释“梦的工作”乃是精神分析学一个重要部分，读过本书便知道了。

一九四六、十二、十二，译者记

① 图见本书扉页前。——三联书店编辑部